

MG
2772.55.

51

西行訪問記

目次

(頁碼)

作者序	一
譯者前言	七
第一章 緒論	一三
一 中國革命底歷史階段	一五
二 革命底三個時期	一九
三 革命領袖們底自傳	二三
第二章 七十領袖	二七
一 到蘇區去的訪問	二九
二 革命領袖底發源地	三五
三 七十人底人名錄	四二
四 出身的社會及教育	五〇

(1)



3 2169 4582 8

B

206474



目次

第三章 朱德底生活史……………六七

一 朱德與毛澤東……………六九

二 辛亥革命前後……………七六

三 柏林的中國共產黨……………八三

四 紅軍……………八六

第四章 徐向前……………九五

一 四個蘇區底元老……………九七

二 廣東公社及海陸豐蘇區……………一〇七

三 鄂豫皖蘇維埃……………一二二

四 三次的圍剿……………一二三

五 四川蘇維埃……………一三〇

六 評論……………一三七

第五章 蕭克……………一四三

一 「活的發動機」……………一四五

二	一個黨員的造成	一五五
三	最初的紅軍及紅游擊隊	一六六
四	在井崗山上	一七一
五	紅軍第六軍	一七三
第六章 賀龍		
一	包圍在傳說中的英雄	一八一
二	典型的湘西人	一八五
三	湘鄂蘇維埃	一八九
第七章 羅炳輝		
一	馮玉祥般的「將軍」	一九七
二	雲南府底模範軍人	二〇八
三	在北伐中	二一三
四	在江西剿共	二二一
五	吉安暴動	二二七
六	五次圍剿	二三七

七	長征中的後衛軍	二四五
第八章	項英	二五五
一	「鐵軍」中的純鋼	二五七
二	項英與「新四軍」	二六一
三	項英自傳	二六四
第九章	蔡樹藩	二七七
一	中國勞工運動的元老	二七九
二	漢冶萍礦工運動	二八四
三	黨的創立	二九二
四	中國工人之被解除武裝	二九六
五	長征前後	三〇〇
第十章	中國共產運動年表	三〇五
一	共產運動之抬頭	三〇七
二	一九二五—二七年之「大革命」	三〇八

西行訪問記

三	蘇維埃革命.....	三〇九
四	在統一戰線下.....	三一三
譯者後記.....		三一五

插 圖

1 扉畫：擁護統一戰線·····	裏封
2 朱德毛澤東·····	六五
3 朱德·····	六六
4 朱德像(漫畫)·····	六六
5 朱德毛澤東周恩來博古·····	九一
6 毛澤東像(漫畫)·····	九一
7 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	九二—九三
8 徐向前·····	九四
9 紅軍騎兵·····	一二五
10 彭德懷像(漫畫)·····	一二五
11 徐特立·····	一二六
12 抗日大課室·····	一二六
13 蕭克·····	一六一
14 蕭克賀龍合影·····	一六一
15 賀龍像(素描)·····	一六一
16 羅炳輝·····	一〇一
17 邊章武壽鶴亭何長工·····	一〇一
18 第二方面軍將領·····	一〇二
19 項英·····	一四三
20 鄧發項英毛澤東王稼蓄·····	一四四
21 斯諾與博古李克農·····	一四四
22 徐海東·····	一八七
23 延安全景·····	一八七
24 蔡樹藩·····	一八八
25 延安工人·····	一八八
26 作者近影·····	一

獻辭

獻給：正在爲自由及民族解放，而從事於偉大之歷史鬥爭的，
中國人民底成功！



著者近影

序

自從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一年成立後，這個運動就發展出一個最非常的領導團體，無論在政治上及軍事上。因為他們的革命活動，在一九二七年以後，是在極大的困難之下進行着的緣故，這一領導就須受到最艱鉅的試驗。這兩件事情究竟那一件來得更艱難，是很不容易

斷定的：——在「白色區域裏的祕密革命工作，凡是被捕者通常都要判處死刑；而在蘇區裏的公開領導，却須從最小量的資源中，去創造出一個完全的新世界來。但遭遇並克服此種巨大的不利的淨結果是，訓練出一種絕好而老練的革命人員幹部，一種經驗豐富

的領導人物底精華。當中國和日本作戰時，這一種領導對於全體的中國人民，是如何地有用處，已不待言。中國能在日軍陣線後面——恰恰在敵人底後方——建立起目前這抗戰根據地的，除了他們沒有別的人。今天，第八路軍在華北的活動，以及葉挺項英所率新四軍在華中一帶的活動，是對於粉碎日本圖使中國殖民地化的程序，代表了最大的有力威脅的；因為他們知道怎樣組織並集合人民底力量，而這力量正乃中華民族最偉大的資源。

自從對共產黨區域的新聞封鎖被打破以後，這些驚人的領袖中有幾個人底私生活，纔逐漸為許多國度裏的民衆所知道；而且因為有了這種智識以後，世人遂不禁對於中國民族的潛勢力，發生了空前的欽佩，這種情形實為現代歷史中所從未有過的。這裏的男人們和女人們，男孩們和女孩們，其勇敢堅忍和不屈的精神，革命的決心，實為今日任何其他民族所不能比擬。在這飛速地黑暗起來的世界裏，中國有像這樣的領袖們和追隨他們的民衆們，其勇敢的奮鬥，對於人類之將來，真是一線極光明的希望。

很幸運地，我能在中國對日抗戰剛開始之前，到西北的共產黨區域去走了一趟，并且能在他們再度馳往前線，去負擔起他們的偉大任務之前，從許多領袖們自己那裏，得到關於他們的生活和工作的故事。從五月到九月，在這幾個月裏，我在延安的共產黨領袖們那裏，收

集了歷史的和傳記的資料；而這本書所紀錄的便是，破天荒第一次的，一些著名的紅軍將領如朱德，賀龍，徐向前，蕭克，羅炳輝等底真實的自傳。此外還有一個著名的共產黨領袖，從中國底工業無產階級底中心跳出來的，是蔡樹藩。他那篇自傳講的是中國勞工運動底發展。所有的這些生活故事都是重要的，可是與其說因為它們是個人的歷史，不如說因為它們是偉大的社會運動底真實紀錄，而他們各人正是這些運動底主要的部份。

我並能在本書中刊入了項英底自傳，這是他在一九三七年夏季，告訴我丈夫愛特伽斯諾的。項英底名字雖則不像毛澤東和朱德底名字那樣地著名，但他在中國共產黨運動底歷史中，却差不多是同樣地重要的。有許多年，項英是武漢及上海底最卓越的勞工領袖，在一九三一年曾被選為「中華蘇維埃政府」底副主席，那時毛澤東是主席。朱德是紅軍總司令。他現在是，和葉挺一同在中國中部指揮着新四軍。

妮姆韋爾斯 (Nym Wales)

一九三九年一月

譯者前言

讀過「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的人，都知道除了愛特伽斯諾 (Edgar Snow) 本人外，到西北前蘇區去訪問過的外國作者，還有一位韋爾斯女士 (Miss Nynn Wales)，那部書裏「關於朱德」的一部分，便是採用她所記的資料的。這位韋爾斯女士就是斯諾先生底夫人。

她是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到延安去的，在那裏過了一個夏天，努力搜集關於中國共黨運動底歷史的與傳記的資料，她差不多會見了所有的領袖們，並和每一個人作詳細的長談。結果她寫成了兩部稿子，一部是關於她在蘇區的印象及觀察，原書已在美國出版，中國也有了譯本；還有一部便是這本「訪問記」，是她在會談中的寶貴收穫，也就是中國革命運動中最珍貴最準確的紀錄。要不是爲了這位熱心的中國朋友，這些史料也許是我們至今仍難得到的吧？

現在承作者於本書在美尙未出版以前，先以原稿全文交給譯者，使譯者有這機會先譯出來，以獻與我國的讀者，而使大家「先睹爲快」，作者底慷慨與厚意，真是十分可感的。

這部訪問記是紅軍中許多重要領袖底自傳——親口對她所說的——加上她的印象和觀感。所以這些都是活的故事，活的歷史；同時亦即對於一些重要革命領袖的「第一手」的記載。作者在「七十領袖」裏會說：「當他(愛特伽斯諾)一九三六年在蘇區時，紅軍第二第四方面軍還沒有到達西北的蘇區，所以他不會遇到朱德及羅炳輝，也沒有遇到賀龍，蕭克，和徐向前。」

半爲了要得到這些不可捉摸的將領們底自傳，以及蘇維埃婦女與各政治文化領袖們底自傳，因此我終於一九三七年旅行到蘇區去。

那一年的夏天，她完全住在蘇區裏，「差不多能够遇見了他們中所有的人。……在這四個月之中，我差不多每天和這個人或那個人談話。因爲要把這些會晤的經過，全部都紀錄下來，我的手竟寫成一種永久的痙攣狀態了」。這樣的工作確乎是很艱辛的，尤其是在一個異國人，因爲一字一句都須經過別人的傳譯。可是斯諾夫人化了四個月的苦功夫，終於由一字一句的翻譯，連綴成一段一章的故事，而把她的每一個訪問寫成一篇充實正確、並富有生活情趣的傳記。「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西行漫記」是一部報告文學的鉅著，斯諾夫人底這部「西行訪問記」也可以說是報告文學中的奇葩。這奇葩的生長，不但是經過苦心的灌溉，而且是由於熱情的煦照——這熱情就是，作者夫婦對於中國革命運動的深厚的同情，和對於中國艱苦奮鬥的透澈的了解。作者寫的是革命者底故事；但不是膚淺地寫，是親切地寫。她不是一個平庸的紀錄者，她從客觀的忠實的記錄中，表演了中國革命運動底史的諸貌；這部書的意義是在傳記文學之上的。她知道一個革命者與他那整個革命運動底背景及歷史不能分離，所以她紀錄下來的，雖然都富於人

生的情趣，可以作為最好的故事讀，却並不是以個人為中心的「英雄」傳記。其中所有的祇是集體的英勇，浸潤到每一位個人。而綜合觀之，她所寫的傳記，仍舊是一部聯貫的歷史紀錄。我以為，這是我們讀全書時應認識的一點。

韋爾斯女士自己說：「這一批自傳體的材料，我說了許多好話，耗了不少精力纔得來的，倒是有特殊價值的；因為幾乎在任何的情形裏，這都是初次給人得到的資料。在我所訪問過的人物中，大多數在這十年裏是，甚至沒有功夫去想到他們自己的，更不要說對別人談論他們那飽經變故的生活了。在這些共黨份子中，似乎難得有人知道一些彼此之間的個人歷史，所以就連他們自己，也沒有我這些堅持地探索得來的資料。內中有幾個人，的確要求我，等訪問記寫好了之後，送一份去給他們，以便留給後代的人看哩」。這情形是多麼有意思啊！

一個革命者是把私生活的事情看作無關重要的，就是他們肯談到自己的事情時，也「似乎以為把他們個人的生活加進自傳裏面是反革命的」。可是，在一般的讀者，對於生活中的事蹟却每每最感興趣，因為這些事情不但富於啓發性，而對於歷史之構成，也有重要的關係。這些傳記體的文字，個別地看，是革命運動底橫斷面；綜合地看，便是革命歷史底全景了。

傳記作家底任務，不必使所記人物「神話」化，却至少應使所記人物「情理」化。現在，作者不但能做到這一點，而且能運用她那敏銳的觀察，同情的理會，把生活和歷史交織為融合的一片，寫成了親切生動而又忠實的傳記，這正是一種值得讚許的手法。如果我們現在要找「新傳記文學」代表作的話，我說韋爾斯女士底作品纔真是「新」傳記文學！

以下所譯的若干篇。據作者對她表示，是認為她的「最好的」寫作的，尤其是關於羅炳輝的那一篇，更覺精彩。我認為作者自己的估計一點也不過分，但羅炳輝那篇固然很精采，就是「井崗上二十四個同志」那一篇，也就寫得够好了。不過，這一切還是讓讀者自己去領略吧。

此外，還有兩點應該在此提及。第一點是，毛澤東自傳已見「西行漫記」，故此處對「朱毛」祇記朱一人。第二是，朱德傳在「西行漫記」中也登過一些，但所登者就是韋爾斯女士底一部份初稿，（斯諾在書中說起的），而此處則為全文，故仍照譯。再則，我所譯者都是原稿「足本」，與作者在美出版那部書中之一部份「節本」是不同的，這一點要請讀者注意。

同時，承斯諾先生以新脫稿而尚未發表過的「項英」一章，先交給譯者在本書中發表，使此書底範圍能包括到最近的抗戰動態，實大足為本書生色。斯諾先生底厚意，不但譯者深以

西行訪問記

爲感，即讀者對這十分精采的一章，當亦覺極可寶貴吧。

至於書中人名，雖已設法就正，當仍不免有錯誤，其他如地名等，或更有誤譯之處，如蒙讀者指示，不勝感盼。

譯者，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初記，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日補記。

第一章 緒論

一 中國革命底歷史階段

中國革命是人類歷史中最錯綜的社會運動之一——而且是一個至今還沒有人寫過的英勇的故事。除了這運動本身的領袖們之外，沒有一個人能真確地述說這個故事，而那些握着這故事底真正線索的人，就是中國的共產黨員們，他們是在一九二七年承襲了革命底領導地位的，他們那生活故事所顯示的是：激發這偉大的歷史運動的那種精神，以及給予這運動以權力及持久力的那些社會勢力。

中國革命底性質是什麼呢，它底歷史的階段是什麼呢；還有，它底內心的歷史是什麼呢？——這些便是在一九三七年，向延安的共黨領袖們所提出的問題。

毛澤東回答道：『中國的社會是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因為這些都是中國社會底特性，所以中國革命底性質問題，就很容易回答了：它是反帝國主義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民族革命」……而且我們可以說，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底部隊合在一起時，雖然數目上很

小，在中國却是最精壯最堅強的革命武力。幸運的是，中國無產階級還有着位極強大的革命盟友，就是，農民階級。農民們包括中國人口底百分之八十以上，而且正因為他們是在中國封建份子及帝國主義者底雙重壓迫之下，他們的革命性格是非常強烈的。」

當我問洛甫——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底全國總書記——，關於中國革命底歷史的階段時，他回答道：

『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前奏曲是一八九八年的「維新運動」，但是革命運動却直到一九一一年纔開始。在我們所稱爲「大革命」的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的時期中，這個資產階級革命的領導權，是由無產階級握着的。』

『十九世紀中葉太平天國底反叛，正發生於資產階級革命之前，是一種農民底暴動。：：這個叛亂是失敗了，因爲它根本是一種農民運動，中國在那時候並沒有一個工業的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來給它以領導。這種農民底反叛是祇有在兩個條件之下纔能成功的：①在資產階級底領導之下，如同像在法國的情形；或者②在無產階級底領導之下，如同像在蘇聯的情形。』

『太平天國失敗後，尤其是在，一八九四——九五年的中日戰爭以後，智識階級開始瞭

解到國家被征服的危險了。這種意識反映在光緒皇帝一八九八年的維新計劃中，這是想從上頭直到底層都革新一下，藉以拯救國家命運的嘗試。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已感覺到革新底需要，這就是此項感覺之初次的表現。可是他們並沒有明瞭民衆力量底偉大，而且是沒有民衆底擁護的——因此他們的維新祇繼續了一百天功夫。這種情況可以和俄國一八一二年在「十二月革命派」之下的情況相比擬。資產階級底要求，那時是剛剛開始反映在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底上層中。一八九八年的這維新運動，祇不過是統治階級中資本主義觀念底反映而已。康有爲和梁起超都是官僚政治論者，而且他們的觀念都是半封建的。

「在一八九八年的這政治變動的時候，孫逸仙博士也開始了他的政治活動。他並沒有參加當時的運動，但在一封寫給康有爲的信裏，他曾發表了他的政見。

「維新運動之後不久，另一個農民暴動發生了——拳匪之亂。這是反侵略的，但它也僅僅是一個農民運動而已，因爲它既沒有資產階級底領導，並且是被反動的西太后所利用的。因此它失敗了。……

「同時當地的中國資產階級正逐漸在發展着，於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黨就組織起來，這便是「同盟會」。滿州人底統治是衰弱而且墮落的，資產階級就領導了一種聯合的運動，來反

第一章緒論

對君主政體。同盟會將它自己資產階級裏所有的份子，和地主們及官吏們聯合起來，於是這種反對滿清的運動便產生了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

二 革命底三個時期

辛亥革命底性質是資產階級的，但是它失敗了，因為資產階級不但和反清反滿的各階級結成了聯合戰線，而且還和封建的勢力如袁世凱等，結成了聯合戰線。它最先是和各封建勢力妥協下來，其次，因為它盼望從各帝國主義那裏得到幫助來推翻滿清，就和帝國主義也妥協下來。因此，當它成功地推翻了滿清之後，這革命對於摧毀封建勢力就不再有所進行，而且它也沒有發展為反帝的運動。它是太脆弱了，因此不久便被封建的和帝國主義的勢力所壓服。它的那些根本問題，沒有一件得到解決。……

1 革命的初期

「因為當世界大戰的時候，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得很厲害，一九一九年資產階級底」五

四運動」便可能實現了。這個反帝反封建的運動，是由資產階級底智識份子所領導的。然而這些領導份子並未能認識真正的封建勢力及真正的帝國主義勢力……因此，幾個顯著的日本奸細被趕走之後，這個運動就停止了，並沒有實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心工作。

『然而在五四運動中，新的無產階級也發達起來，當共產黨在一九二一年成立時，它便也有政黨了。……』

『爲了要得到它本身的解放，中國的無產階級——以及它的共產黨——就明瞭若要獲得成功，是不能單靠它自己的力量，它必須和別的一些勢力聯合起來，以推翻帝國主義及封建制度；也就是，它必須參加民族的革命。因此，共產黨在一九二三年向孫中山先生提議結成聯合戰線，來反抗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

『在這一聯合戰線之下，中國革命便突飛猛進了，例如五卅運動，在廣東建立的革命統治權，以及國民革命軍底組成。……』

『同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對於革命領導權的鬥爭，已經變得很嚴重了。真正的領導權是在無產階級手裏的，中國的資產階級就利用種種的方法，想從無產階級底手裏把這領導權奪過去。在北伐中，民衆運動底迅速的發展，以及無產階級政黨底領導權之強化，使

得資產階級領袖大爲驚駭起來，結果遂有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事件」，以後資產階級即退出了聯合戰線，並背叛了革命。……這便是中國革命第一階段底結局。

雖然留剩下來的那些革命部隊——士兵們，工人們，以及農民們，都因此而頗受損失，他們却仍試圖恢復革命底形勢。這種的努力表現於士兵們底「南昌暴動」，以及在這以後的若干其他暴動中。「廣東公社」是革命底退却中，最後一次的戰鬥，而結束了這個革命階段。

2 革命底蘇維埃階段

「在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裏，許多的暴動跟在廣東公社之後發生。這些暴動底性質，都是無產階級及農民部隊方面底自衛舉動，目的在於保衛他們本身的利益。游擊集團在各處地方發展起來，而由此成爲游擊戰爭。」

「蘇維埃底口號是在資產階級反動和背叛之後，纔由共產黨決定下來的。組織蘇維埃的目的，是要在民族資產階級背叛了民族資產革命之後，把這革命繼續下去，因爲它的許多工作尚未完成，而孫中山先生底三民主義也尚未實現。……」

『中國底蘇維埃革命，可以分成四個階段：』

『一、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暴動時期及自衛的游擊戰爭時期，從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〇年；』

『二、游擊隊員轉變為紅軍，及游擊區域轉變為蘇區的時期，從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年底；』

『三、從一九三一年年底的「第一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到一九三四年二月的「第二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這時期，接在這時期之後的是由中央蘇區撤退；』

『四、從長征開始時起，到我們的三個方面軍，在一九三六年十月，恰恰「西安事變」之前，集中在西北時的這個時期。』

3 統一戰線

『西安事變發動了中國革命中的新階段。到了這裏，蘇維埃運動底發展結束，而統一戰線底新時期開始了，在對日抗戰中這是將繼續下去的』。

三 革命領袖們底自傳

這個革命運動之內在的歷史，從領袖們底自傳中是可以找得到的，有好幾個人都包括在這本書裏。賀龍和朱德，像董必武和林伯渠一樣，都是同盟會中底最早的領袖，參加過辛亥革命的。當這革命失敗之後，他們仍繼續他們的革命鬥爭，起先在國民黨裏，後來是在共產黨裏。

在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時期」的這幾年裏頭，最有戲劇味的特徵是中國勞工運動之驚人的發展。無產階級底元老領袖，蔡樹藩和項英告訴了我們這運動——在漢冶萍，武漢，以及當「平漢路大罷工」的時期，以後，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他們在上海和武漢都是工人運動底領袖。

差不多所有的共產黨領袖們，都參加過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羅炳輝，雲南府底「模範軍人」，當在南方討伐陳炯明之役，以及後來在北伐中，都和朱培德一同作戰過。

徐向前是黃埔軍官學校第一期的畢業生。曾和馮玉祥一同討伐北方的軍閥。後來在一九二六年教書於武昌的軍事學校。賀龍與蕭克，和葉挺一樣，都是「鐵軍」在勝利的征戰中的將領，而以後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領導了「南昌暴動」，和朱德及別的幾個人一同，這一次的暴動便是建立了紅軍的。

朱德和毛澤東後來在湖南及江西，領導了紅軍及農民運動，而徐向前則參加了「廣東公社」及在海陸豐的第一個蘇維埃，這蘇區後來是被殲滅了的。

蕭克和羅炳輝所講的是，南方對於那裏的紅軍所進行的五次圍剿。蕭克參加了一九二八年的「湘南暴動」，後來就前往那著名的山林根據地，江西的井崗山；此後他便和「朱毛」縱隊一同作戰，直到一九三四年，那時他和賀龍會合了。羅炳輝在一九二九年領導了民團底「吉安暴動」，加入了紅軍，率領着「人騎兵」，身經南方五次圍剿的戰役，然後講了一篇關於「長征」的，異常動人的故事；在「長征」中他是指揮着危險的掩護部隊的。

在同一個時候，賀龍正組織着「湘鄂蘇區」，並指揮着第二方面紅軍；而徐向前則在河南安徽湖北區域，組織了「鄂豫皖蘇區」，以後並前往四川，創立了「四川蘇維埃」。徐向前本人關於這兩個蘇區的敘述是極有價值而且極獨特的，因為這一故事之被敘述出來，這還是第一

次哩。

當毛澤東及朱德所率的第一方面紅軍，作長征而到西北方面去時，項英是留下在南方的，他所講的便是他那為生存而戰鬥的英勇故事，因為他是剩餘下來的農民游擊隊及紅軍部隊指揮者。

因此，從本書所載各領袖底生活史中，我們就可以得到，從一九一一年直到西安事變以後，整個中國革命運動底各種姿態的全貌了。

— N · W ·

第二章 七十領袖

一 到蘇區去的訪問

在過去十年間，只有少數共黨領袖名字在報章上露過，但這些名字在中國已變成家喻戶曉的了。其中大約有幾個名字，是這樣地連串在一起而為大眾所咸知的：

「朱毛」、或朱德與毛澤東，

彭德懷與林彪，

賀龍與蕭克，

還有「三狼」，那便是：

徐向前，

徐海東，

羅炳輝。

這幾個人已成爲通國皆知的，四個邊遠蘇區底光輝的保衛者，他們是紅色戰線主力軍底

高級指揮 多數中央蘇維埃與紅軍第一方面軍的將領，已經由愛特西斯諾在他新近一本（註）書裏介紹給外國的讀者，上面諸人如毛澤東，彭德懷，林彪以及由鄂豫皖蘇區來的徐海東，都包括在內。當斯諾一九三六年在蘇區時，紅軍第二第四方面軍還沒有到達西北蘇區，所以他不曾遇到朱德及羅炳輝（羅炳輝是和紅軍第四方面軍一起在西藏過冬的），也沒有遇到賀龍蕭克和徐向前，雖則他在書裏加入了朱德與賀龍生活的記載。一半爲了要得到其他的這些不可捉摸的將領們底自傳，以及蘇維埃婦女與各政治文化領袖們底自傳，因此我才於一九三七年旅行到蘇維埃區域去。

我同時對於共黨中那些年青的領袖，以及更爲少人知道的天才們，也感到非常的興趣，因爲這些次級的領袖們是構成執行權力的基礎；在年青的政治委員等身上，情形尤其是如此。

除了上述九個著名人物底名字之外，過去一年間所發生的事情，又使其他若干名字在報章上刊布出來，那就是與西安事變，及與中央政府作聯合戰線的談判有關的。他們是：周恩來，博古，葉劍英，林伯渠與王明（出席共產國際的中國代表）；在這一聯合戰線裏，他們是

（註）▶即「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

共黨方面的政治聯絡員。另外還有一個新近爲大眾所共知的人物底名字，是項英。這是一位老練的軍事與政治的領袖。他迄今爲止曾統率着那枝留在南方的孤立的紅軍，當紅軍主力全數開拔去作長征以後；而那枝軍隊現在已改編爲新第四軍，在葉挺項英自己統率之下，作戰於江南各地了。

然而，在「共黨中國底內部」，還有其他同樣重要而資格甚老的黨底領袖們，諸如：

洛甫，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

王稼蕃，政治局及革命軍事會議委員；

張國燾（註）他和徐向前同是四川蘇區底領袖；

劉少奇，工會領袖；

鄧發，特務局長；

任弼時，湘鄂蘇區政治領袖；

羅邁，共產黨學校校長；

劉伯承及陳伯鈞，兩個新近擢升的高級紅軍將領。

▲註：張國燾已開除了共產黨黨籍。

此外還有女領袖們：

蔡暢，康克清，鄧穎超，劉羣先，丁玲，李均健及其他等人。

隱藏在這三十個名字後面的是怎樣的人物呢？而且，其餘的那些領袖是什麼人呢？他們構成了這一個非常的領導團體，其英勇的成就已使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爲之驚奇的。

我編成了他們之中七十個人底人名錄，而企圖分析這一小集團底源流與性質，因此發生了絕大的興趣；這一羣人物已使中國的歷史在過去十年中推動得這麼迅速。很幸運，我在蘇維埃首都的四月逗留中，差不多能夠遇見了他們中所有的人物。五月份在延安是專供各代表開會之用的，開會時，大多數的重要領袖都要出席，其餘的人在夏季中也要來到這個城。所有的共黨領袖們能够聚集在一起，這在他們歷史上還是第一次，所以對於一個將做傳記作者的我，這情景是很合理想的。在這年底夏天，我寫下了約莫二十五篇的傳記，並且攝取了所有那些不反對給大眾知道的人底照片。而當我一查對我那七十個人名錄時，我發覺在這七十人之中，除了賀龍，何畏，（因爲差了四小時，沒有看見他），劉伯承，任弼時（在前線我也錯過了，因爲那晚我回來了），葉劍英（我只在西安的玻璃窗裏見過他一面，因爲「衛隊」在側，使我不能有進一步的認識），鄧發，王稼祥，李克農（他們都在「白色的區域」，左權

，和張國燾之外，其餘那些人我全都見過。自然，我沒有遇見項英，那時他正在華南；也沒有遇見王明，那時他是在莫斯科。

在這四個月之中，我差不多每天都和這個人或那個人談話。因為要把這些會晤的經過，全部都紀錄下來，我的手竟寫成一種永久的痙攣狀態了。我抓住每一個到延安來的人——他們是在這夏天從他們那老遠的甘肅，寧夏，或其他的駐軍地點，而到這裏來的。這一切都要經過一個譯員，所以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多數場合中，我不得不順便詢問無數的問題，以便製造成一個故事；而且當我的對象有興趣於討論戰爭，地理或一般的歷史時，我還得設法去從這裏頭抽出一些生活的興趣來，他們似乎以為把他們個人的生活加進自傳裏面是反革命的，我所能做到的便祇是使他們肯坐着做完這件事而已。我想起來，只有羅炳輝，劉羣先女士，和丁玲女士等三人，是對於詳述他們生活的故事，感到興味的。不幸得很，這一種對於自我的否決，就一個自認為傳記作者的人而論，却是不合於她的職務的。他們在實際上，已經把他們的個人浸潤到革命運動中去了。

這種自傳體的材料，我說了許多好話，耗了不少的精力纔搜集得來的，倒是具有特殊價值的，因為幾乎在任何情形裏，這都是初次給人得到的資料。在我所訪問過的人物中，大多

數是，在這十年裏頭，甚至沒有工夫去想到他們自己的，更不要說對別人談論他們那飽經事故的生活了。在這些共黨份子中，似乎難得有人知道一些彼此之間的個人歷史，所以齊連他們自己，也沒有我這些堅持地探索得來的材料。內中有幾個人的確要求過我，等訪問記寫好了之後，送一份去給他們，以便傳給後代的人看哩。

我覺得這些個人歷史是動人的，不僅因為它們敘述了中國革命內在的故事，而且因為它們是第一流的社會文獻，對中國一般的生活與歷史底錯綜性，提供了一種極有價值的透視。

在和這些歷史的人物晤談四個月以後，我對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物底品質，無論集體的地及個人的地確得了許多明確的——與無限量的——印象。

二 革命領袖底發源地

我演繹的地開始紀錄這些印象，從一般紀到特殊，而第一件使我全然驚奇的事是，作爲中國革命領袖們底發源地的湖南省，是非常重要的。在這一章裏已經提到過的三十個最重要的共黨領袖當中，有十個就是中國人所謂「善戰的湖南」種。計爲：

賀龍 林伯渠 毛澤東 蔡暢 劉少奇 彭德懷 任弼時 羅邁 丁玲

而且在我那七十個首領底人名錄中，我再發現了十五個湖南人。這一來，中國底七十個共黨領袖當中，就有二十五個是湖南人，或者說是三分之一強，——而正確地說便是百分之三十六。湖南省素被認爲中國最好的戰將的發源地，但在這二十五個共黨之中，有二十個都是政治的，而不是軍事的領袖。讀者也不要忘記，那早已爲革命而犧牲的，幾個光輝的湖南人底名字——黃公略，第三路紅軍的學者與指揮，當他在一九二二年被殺的時候，他的名字是和朱德、毛澤東、彭德懷並列的；夏曦，在一九三六年戰死以前，他是湖南湖北蘇區的政

治領袖。還有那兩個著名的共產黨，他們都是在一九二七年之後被判處死刑的，就是蔡和森及他的夫人向警予，「中國革命底祖母」；在創立共黨之時，他們倆都是毛澤東底親密的伙伴。

我也發覺湖南的姊妹省湖北，是第一流領袖們底第二發源地。這兩個省份也叫做「兩湖」，湖南的意義就是在湖之南，湖北的意義就是在湖之北。湖北，包括了那武漢三鎮的工業城市——漢口、武昌，與漢陽，是一九二七年武漢革命政府底所在地，曾經誕生了好幾個極重要的共產黨員。其中包括着最重要的無產階級領袖之中的四個人，即：項英、蔡樹藩、徐海東，及李立三（現已不活動），以及栢彪與董必武。所以，湖南湖北這兩個姊妹省，共同供給了三十一個領袖，或者說在我的七十個人名錄中，有百分之四十四的共黨領袖是產生於這兩個省的。

我並且發現，南方的三個省份中，產生了我這七十個領袖底半數以上，湖南，二十五；湖北，六；廣東，五。這三個數目共為三十六人或百分之五十一。

在我這七十個領袖之中，共有六十二人，或百分之八十八，查出是南方人；除了上述三十六人之外，再加上七個四川人，四個江蘇人，五個安徽人，三個江西人，四個浙江人，還

有雲南的羅炳輝，福建的富連璋醫生，以及台灣的蔡前。

這七十個人中，只有八個是北方人（其中有五個原籍安徽）——三個山西人，兩個河北人，兩個河南人，一個東北人——關向應。

在中國本部十八行省中，有四省在我這七十人名錄中沒有人代表。這便是：廣西，貴州，山東，與陝西。不過，陝西（已故著名的劉志丹底故鄉）在它的蘇維埃運動中，現在有着許多第二級的領袖，山東也是如此；但是我却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廣西的共產黨。當我們想到事實上廣西是善戰的廣東的姊妹省，這情形就似乎很奇怪了。這兩省是被稱為中國底「兩廣」的，所謂兩廣，即是廣東與廣西。

華南是革命底發源地。廣東（它的省城就是廣州）是太平天國和孫中山及其國民黨革命底搖籃（它也是所有出國的廣東洗衣人，和移殖到南海及其他地方最多的華僑發祥地。）這是很自然的，革命的廣東應該有它的共產黨部份，而湖北（武漢）江蘇（上海與無錫）底工業城市也應該有它們的無產階級的領袖。但是我們要問：湖南又為什麼是我們這七十個雜種中三分之一底母親呢？而且更進一步，在我們這二十個湖南人中，為什麼特別在湖南底西部會誕生其中的多數呢？這問題之不容易解答，竟比俄亥俄州為什麼會產生四分之一的美國總統，

還要加甚，但我以為試試看是不妨事的。讓我們來開善戰好鬥的湖南人自己吧：

根據毛澤東底見解（他是連麵包裏甚至也要塗紅辣椒的），這是因為：『所有吃辣椒的人都是反叛者，而湖南人的吃辣，比較別地方的中國人吃得更多。』

丁玲女士底家鄉，和她的親戚林伯渠一樣，是在湘西那著名的臨醴縣，當我問她的時候，她回答道：

「沅江流域底上游是和苗族區域接近的，在湘西原有許多苗人底混合種，——這就是爲什麼湘西人會這樣厲害和勇敢的緣故……湖南省有許多的大家族，雖則中國北部並沒有那麼多。要支撐這些極龐大的家族和那些家族中的寄生者，自然是需要對平民大大地剝削的，這就是爲什麼湘西是中國以反叛的農民階級最著名的地方。臨醴底附近一帶，歷來就被認爲中國最強悍的、最勇敢的兵士底產地。連那裏的女人有時都會用刀子來互相廝殺哩！事實上，湘西的女人，在裹腿裏或腰帶裏都帶着刀，如果有什麼人敢和她們爲難，她們就會拔出刀來拚的。」

註：生在湘西（湘江之西）各縣的共黨重要領袖爲：蕭克（嘉禾）；成仿吾（新化）；丁玲女士（與林伯渠 臨醴）；謝覺哉（寧鄉）；蔡暢女士（湘鄉）；向警予女士（溆浦）；賀龍（辰溪）

等。臨澧縣與辰谿縣，都以產生第一流的兵士著名，而賀龍便是當地的模範英雄。

蔡暢女士，出生於湘鄉縣，她說是「因為湖南底土地分配問題非常之尖銳化，階級鬥爭因此也就嚴重了。」

但我所得到的最好的理由，是從「善戰的湖南人」之紅軍第二方面軍中，兩位政治委員那裏得。他們兩個都是北方人，對這問題也許有一種較好的局外觀察。關向應，從關外來的一位東北方，賀龍底政治委員，曾對我這樣說：「賀龍從他父親身上遺傳了若干湘西——中國反叛的中心——地方的特別稟賦，就是：絕無畏懼，機警，而且有自信力。……在大革命時期（一九二六——二七）湖南湖北這一區域的人民（洪湖地帶，賀龍蘇維埃區最初是在那裏成立的）曾經很艱苦地奮鬥着，而土地革命那時早已開始了。農民們都是渴求着土地的，而且因為他們以前的鬥爭經驗與強烈情緒，於是都欣然加入了這新的（共產黨）革命。」

柳紹文，出身河南的，肅克底政治委員，用他那很好的英語對我說：

「我以為湖南為什麼是中國革命中心的理由是：湖南在華南與華北之間是一個接壤的或緩衝的省份，而且是鬥爭與內戰不絕的場所，兩方軍隊底前進和後退都得經過這裏，並且也處於幾種衝突的政治傾向底中間。人民即使沒有暴躁的性子和前進的稟賦，也絕不能停滯不

動的。」

但是，湖南底革命天才和它那壓制革命的天才相等。我們必須記得，曾國藩（蔡暢女士和他的哥哥蔡和森，恰巧都是曾氏親戚）和他的那批湖南驍將們，就是在一八五〇年的時候，那麼殘忍地爲滿洲人摧毀了太平天國底土地大革命的。曾國藩是，蔣介石將軍和其他國民黨將領們所崇拜的一位人物。

袁倫仁在他的「月門漫談」一欄中這樣說：

「因了這些軍隊底成立（當太平天國時代，曾國藩底軍隊在湖南，李鴻章底軍隊在安徽）湖南與皖北便成了中國職業的兵士底主要發源地。在中國近數十年的許多次內戰中，湖南人和安徽人在各部軍隊中當兵的，比任何其他省份的人多。也許就是因爲這個緣故，中國政府今天纔特地揀湖南省來招募及訓練新兵，以作對日抗戰之用。安徽省西北部的人民是被認爲和湖南人一般地善戰的。」

皖西是鄂豫皖蘇區之皖省部份的發源地。當共產黨在湘皖建立了蘇區的時候，共黨彷彿是自然而然地襲有了這中國最善戰的兩個區域。

無論如何，湖南人不僅是中國最優良的兵士，最善戰的農民，最好鬥的學生，而且他們

也是最民族主義的排外者與充滿鄉土觀念的。一個從外省來的中國人，在他到湖南開始一種新事業之前，他是需要三思而後行的。

在一九三七年高呼民族主義口號最認真的，是湖南的兵士；而當南京事件的時候，真要想逐出南京外國人的也就是他們。在成立蘇區的時候，對於俘捉外國教士的反帝國主義的兼職最感到興味的，就是賀龍手下的湖南紅軍。至於這些教士爲什麼敢於留在如此排外的地方，那就祇能解釋爲一種樂於殉道的精神了。

三 七十個人底人名錄

可是我們必須觀察明白，創立蘇區的是上頭的領袖們，而不是地方性的蘇區創造了領袖；因為我所有的這七十人中，除了四個人之外，（邊章武與吉鵬飛是在一九三一年寧都叛變時才加入；羅炳輝是一九二九年加入紅軍；以及丁玲女士），其餘在一九二七年蘇維埃時期以前都已經是共產黨了。蘇區的民衆只有在江西，福建，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河南，陝西，以及浙江的邊界等處。

中國每一個省份都有它的特質，而且是向來歷史的地，幾乎像歐洲各國底每一個國家似的，自成一帶的，每一個特殊縣份的人，也正同「考爾克人」，烏爾斯脫人，或約克郡人，一樣地易於識別。

但還是讓我們從湖南的角度轉過方向來，進一步地去分析共產黨底領袖們吧。爲了要便若干事實更加明晰一些，我應該在這裏發表我那七十個共產黨領袖底人名錄底大綱，這些領袖在

過去十年中都是最顯著的人物；而且我已經把在那時期中逝世的幾個最重要的領袖名字加了進去，雖則並沒有把他們計算在現今這七十個領袖之內。

這裏便是一張簡單的表：

政治領袖(五十三人) 軍事領袖(十七人)

▼★留學生及大學生

(留學法國者)

周恩來

傅忠

▼★何長工

★徐特立

★李富春

李立三

★羅邁

聶榮臻

第二十七章：領袖

★蔡暢女士

(留學莫斯科者)

張國燾

王明(陳紹禹)

徐夢秋

王觀瀾

★任弼時

吳亮平

★凱豐

楊尙昆

李伯釗

洛甫(張聞天)

陸定一

博古(秦邦憲)

王稼齋

(留學日本者)

★成仿吾(並到過德法)

★林伯渠(並到過莫斯科)

何柳華即(廖承志並到過莫斯科)

董必武(並到過莫斯科)

(在中國者)

鄧穎超女士(北京國立師範大學) 蔡前(滬江大學)

▼師範學校畢業生

程子華(太原國民師範學校)

★賀子貞女士(湖南師範大學)

★毛澤東(湖南師範學校，並曾在北京大學受李大釗底特別指導)

★丁玲女士(上海平民女子學校，並在滬江大學一年)

★王守道

▼醫學校畢業生

吉鵬飛醫士(西安陸軍醫院)

傅連璋醫士(福建汀州教會醫院)

▼中學教育

★張文彬

▼李克農

★甘泗淇(並到過莫斯科)

★劉少奇(並到過莫斯科)

柳紹文(並到過莫斯科)

★毛澤氏

危拱之女士(並到過巴黎與莫斯科)

▼特殊教育

謝覺哉(秀才)(古文家)

▼關向應(自學的，後來在莫斯科受過訓練)

▼劉羣先女士(在小學讀過一年，在莫斯科受訓練過三年)

▼鄧發(黃埔軍官學校，並在莫斯科受過訓練)

▼蔡樹藩(在小學讀過二年，在莫斯科受過訓練)

▼小學教育並在中國紅軍大學受訓

▼周興(小學讀過六年)

▼黃文彬(小學讀過二年)

▼王震(小學讀過六年)

▼自學的及在中國紅軍大學受訓的

▼項英

康克清女士

李均健女士

▼被捕處死的及已故的

趙士炎

彭湃

瞿秋白

★蔡和森

★向警予女士

張太雷(在「廣州公社」之役被殺)

向忠發

★夏曦(死於戰爭)

李大釗

顧作霖(病死)

▼被共產黨除名的

陳獨秀

譚平山

▼軍官學校畢業生

(莫斯科紅軍大學)

★蕭勁光，八年(並在黃埔軍官學校受過訓練)

劉伯承，四年

★左權，四年(並在黃埔軍官學校受過訓練)

葉劍英，二年(並在雲南講武堂受過訓練)

(廣東黃埔軍官學校)

★陳賡(並在莫斯科一年)

林彪

陳伯鈞

聶鶴亭

徐向前

(湖南軍官學校)

★彭德懷

(保定軍官學校)

邊章五

(雲南講武堂)

朱德(並在德國四年)

(由行伍中擢升的)

★賀龍 ▼何畏

▼徐海東 羅炳輝

蕭克(師範學校學生)

(在戰爭中戰死的)

方志敏(被俘後處死)

★黃公略 劉志丹

董振堂

(出國的)

葉挺(一九二七年起出國)

說明：上表中人名上有★記者表示均湖南人，名字上有▼記者，表示出身於無產階級。

四 出身的社會及教育

至於這七十個人出身的社會，我發現祇有百分之十七是無產階級（表上有▼為記者）。但這十二個人却佔着主要的地位，在勢力上是遠過於他們的數目的。紅軍高級將領中只有項英、徐海東及何畏是出身無產階級的，不過紅軍主力底多數的政治委員（他們控制着軍隊中的政治生命）都是訓練有素的馬克斯主義的工人領袖。關向應，一個從東北來的紡織工人，是賀龍的政治委員；王震，長沙來的鐵路工人，是蕭克的政治委員，何長工，一個工廠裏的工人，在世界大戰之後到法國去，在那邊的學校裏半工半讀的，是羅炳輝的政治委員。鄧發與周興掌有了特務組主任與主任的機要位置，而黃文彬則是共產黨青年團的全國領袖，蔡樹藩是內政部的部長，劉羣先女士是礦務及工廠的監督，李克農是交通部的部長。同時在留學法國諸人中，聶均健，林彪的政治委員，傅忠，徐向前的政治委員，李富春，陝甘寧蘇區CC團

的主席，蔡暢女士，共產黨婦女工作部的部長；在留學的時候，都曾在法國的工廠裏做過工，並且在留法的中國工人中，組織起共產黨的活動。其他還有許多人，雖則並不是出身普羅，在工人運動中却都有着悠久的經驗，最著名的是：李立三，在一九三一年以前，統御了各工會的；與劉少奇，現任的共黨工會部主腦。實際上是，差不多所有的政治領袖們，在一九二二——一九三一年期間，當工人運動尚未在國民黨區域內受到取締時，對於這種運動都是有很深的經驗的。

我發現，祇有百分之十三是職業的兵士。這九個人全是農民底兒子，他們的家族，除了葉劍英和賀龍之外，都不是佃農，葉劍英底父親是一個廣東的商人，賀龍底父親是一個裁縫。其中有幾個人在小孩子時候就離開了家庭，而自動地去投軍，如彭德懷，羅炳輝，陳賡等。都是。（其餘那六個軍事首領，除開那兩個出身於無產階級的之外，全都可以視為「學生」；聶鶴亭，徐向前，林彪，陳伯鈞，以及蕭勁光，在加入黃埔軍官學校受軍事訓練以前，都是中學堂裏的學生領袖，而蕭克在投軍時，却是一個師範學校的學生。）

至於餘下來的百分之七十，除了百分之三——兩個出身農民的婦女，康克清女士與李均健女士——以外，都是中國人所謂的「學生」，屬於受教育的階級的。這就是說，他們若在科

舉時代，都可以有穿讀書人底長衫的資格，在中國，進過大學校或中學校的人是都被當作「學生」的，他們的數目約當四萬萬五千萬人中百分之五。

我這七十人中百分之六十七的「學生」，多數出身於小布爾喬亞，他們的家族差不多全是小農與專門行業者，其中祇有零星的幾個是商人。但是，有一種頗合趣味的現象，很可注意，就是，由那些科舉時代的讀書人——他們的貴族家庭早已破產了的——却產生了許多第一流的革命領袖，而且為數甚大。其中包括着：

蔡暢女士 周恩來 林伯渠 謝覺哉（本人為一秀才）

丁玲女士 徐向前 董必武 徐夢秋

李伯釗女士 蕭克 成仿吾 李富春

從上面這些事實，我們很容易看出，中國蘇維埃運動的領袖，並不是如一般猜想的。由農民人物所構成。百分之八十四是革命的智識份子，或真正的普羅領袖，而百分之十三是職業的兵士。

這些革命人物所吸收的正式教育，其數量是極驚人的。我揭露出下面的統計：

在五十三個政治領袖之中，百分之四十是大學校畢業生。而在這廿八個畢業生之中，除

了兩個之外，都會在外國如法國，日本，或莫斯科留過學——其中有十個人在未出國留學之前，早已在中國的大學裏畢業。有百分之六十六是專門學校或師範學校畢業生。

在十七個軍事領袖之中，四個是莫斯科紅軍陸軍大學畢業生：蕭勁光，左權，葉劍英，劉伯承，而陳賡在莫斯科也研究過一年。朱德在德國研究過四年的社會科學，但不是軍事科學。這十七個軍人中底百分之七十（十二人），有的是莫斯科紅軍大學校的畢業生，有的是中國的黃埔，雲南，湖南軍官學校，或是保定軍官學校底畢業生。只有賀龍，何畏，徐海東，羅炳輝，和蕭克，纔是出身於行伍的。

七十人中總共有百分之八十六可以說是都會受過「教育」，包括軍官學校與中學校底畢業生，以及那些在莫斯科受過「特別教育」的。可是，餘下來的百分之十四，差不多都在蘇區底「共產黨學校」和「紅軍大學」裏受過高深的訓練。

自然，學校裏的教育對於這些首領們是沒有多大的重要的。他們真正的教育是從閱讀書本得來，是從政治與社會活動中活生生的經驗裏得來。而且他們彼此互相學習——因此一個人在外國大學裏學習了四年才得到的學問，對於他所有的伙伴們却成爲共同的知識了。

除了上表中十三個政治的與四個軍事的領袖，曾在莫斯科受過大學教育之外，還有許多

其他的人會在那裏的孫中山大學，或「東方勞動大學」裏受過訓練。雖則這七十八中的三十七人，或者說是百分之五十三，在莫斯科受過訓練（包括所有在法國受過教育的，除了何長工之外）但還有幾百個中國學生也在那兩個大學裏受過訓練，其中有許多人都是國民黨員而不是共產黨員。因為共產黨員底名字都給國民黨員知道了，所以當一九二七年以後，無數由莫斯科回來的學生，都很容易被捕及被處死了。同樣，一九二五——二七時期的多數普羅領袖們，也多在一九二七年以後，在變亂中被殺或被處死，尤其是在李立三時期；這就是今日中國共黨行伍中祇有這末少數的人留存的理由了。沒有一個人能够正確地告訴我，在一九二七年以後，究竟有多少個共產黨員被殺掉，不過他們一致同意十萬人還是一個最小的數目。

中國共產黨員們對於傳統的英雄，已經具有他們的標準了。自然，任何人跟着紅軍作了極長期的鬥爭之後，他本身是非成爲一個英雄不可的；在過去這十年中單單能够不死，固然已是一種成就，然而老戰士羣裏却要分爲：

①黨的創立者。

②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時期的老戰士。

③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暴動——創立紅軍——的老戰士。

④廣東公社與海陸豐的老戰士。

⑤井崗山上的老戰士。

⑥一九三一年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老戰士（正當「蘇維埃共和國」創立時期）。

⑦長征中的老戰士。

在上列這些人中，死傷底數目實在是可怕的，舉例來說，廣東公社暴動的老戰士就十分地稀少，而那些在海陸豐一役中的，實際上已沒有一個生存的了。

但是讓我們來看看這些人所遭遇到的是什麼吧：

當我在蘇區的時候，共黨最初創立者的七個人中只有兩個人在那裏——毛澤東與張國燾（註）。促成中國共產黨之建立的活動精神，是在國立北京大學裏的一個小小的核心，包括兩個教授——陳獨秀與李大釗，和兩個學生——毛澤東與張國燾。

（註）現在只有一個人留存了，因為張國燾已經在一九三八年被開除了黨籍。在最初的幾個創立者中，毛澤東現在是仍居高位的僅存者了。

五 創立者和老戰士們

這個黨是在一九二一年五月裏，由十二個人——全是學生或教授——在上海組織成功的，在我所遇到的人裏，沒有一個人能夠告訴我，正確的日期是哪一天。祇有兩個人，毛澤東和張國燾，加入了蘇維埃革命，但是兩個人都成了重要的政治首領，毛澤東於一九三一年被選為「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主席，張國燾則是四川蘇維埃與紅軍第四方面軍的政治首領，到一九三七年他被任為「陝甘寧邊區政府」的主席。這陝甘寧邊區政府就是代替蘇維埃政府的。

陳獨秀，新青年雜誌的主筆，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的領袖，統治着共產黨一直到一九二七年為止，那時他以右傾的機會主義被黨除名，在一九三一年為國民黨所幽禁。

李大釗於一九二七年在北平被處死。

李漢俊於一九二七年在武漢被處死。

李達辭職，現在北平當教授。

但是，其中却有四人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就轉向了國民黨，而變爲國民黨中高級的官吏，計有：

邵力子（後來任陝西省政府主席及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

戴季陶（考試院院長）

周佛海（蔣介石秘書）

陳公博（實業部部長）

差不多在同一個時候，中國共產黨底巴黎支部也成立了，就是由我這表中幾個在法國的留學生與其他幾個後來被處死的人所創立的，其中包括趙士炎，一九二七年在上海被處死的黨書記。

其他各支部的創立者，就是五位「中國蘇維埃底老大哥」之中的三個：朱德，現年五十歲（德國）；董必武，五十一歲（湖北）；奧林伯渠，五十五歲（廣東）。年老的徐特立（現在六十一歲）是到一九二七年纔入黨的，而年老的謝覺哉（現在五十六歲），則於一九二五年滙黨。這五位「老大哥」，被年青的共產黨員們深深地愛戴着的，都是長征中健旺的老戰士們。他們在延安是常見的景物，把他們的臂膀彼此摟挽着，在可敬的伙伴精神中漫步街道上。

還有，兩個早期的黨書記，後來被捕而處死的，是瞿秋白（一個著名的馬克斯主義的作家，一九三四年在福建被捕處死），與向忠發（一九三二年在上海被捕處死）。自從有黨以來，一共只有五個書記，其中陳獨秀，第一任，已被捕下獄，只有其他兩個現在仍活着——洛甫與博古。

除了這五位「老大哥」之外，所有其他活着的黨的創立者現在都不過四十歲光景。在他們以下的是一大羣「大革命」期的老戰士們，年紀差不多都在三十歲以下。所有我這七十個人名錄中的人，除了丁玲女士，吉鵬飛醫生，羅炳輝，與邊章武之外，都是大革命期的共黨老戰士。除了那幾個黨的創立者和六個年長的軍事首領之外，這七十人中差不多每一個人都是九〇七或一九〇八年誕生的。

因此，中國共產黨底過半數的領導權都握在年紀約摸二十歲的青年人手中。譬如說，幾個最高首領底年青是極可注意的。其中誕生於一九〇七年者是：博古，王明，程子華，劉羣先女士，與李均健女士。

誕生於一九〇八年者是：林彪，聶鶴亭，王鵬瀾，周興與蔡前。

誕生於一九〇九年者是：王震與蕭克——陳伯鈞，最年輕的紅軍將領，是一九一〇年生

的，而吳亮平，宣傳部的部長，也是這一年生的。

在軍事領域裏，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暴動的老戰士，手創了紅軍的，是第一等的英雄。這一次的暴動是由朱德，賀龍，葉挺——他後來出了洋，林彪，陳賡，聶鶴亭，蕭克，劉伯承，林伯渠等領導，差不多所有參加這次暴動的兩萬至兩萬五千個兵士，是都在一九二七年戰鬥中被殲滅的了。當一九二六年時，一部份在海陸豐被殲滅了以後，餘存下來的就祇有一千二百人。到如今還生存的，差不多只有寥寥數人了。這些都集中在紅軍最好的一師裏，和廣東公社的老戰士們在一起——即紅軍第一方面軍第一軍團的第一師，這一師，在陳賡統率之下，是從來沒有打過敗仗的。

南昌暴動以後，第一個蘇維埃區在海陸豐成立，後來廣東公社暴動發動於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在廣東的領袖張太雷戰死。廣東公社暴動中的生存者是聶榮臻，葉劍英，聶鶴亭，程子華，與徐向前。

廣東公社失敗之後，作為廣東公社後盾的教導團就開往海陸豐蘇區。在那兒他們被殲滅到幾於祇剩了一個人。祇有徐向前，程子華，與袁愈（譯音，前線紅軍軍官學校的政治委員）仍作為海陸豐的老戰士而生存着。彭湃，海陸豐蘇區的主席與創立者，也逃走了，可是於一

九二九年在上海被捕鎗決。

井崗山時期是「鍛鍊人們靈魂的時期」。毛澤東率領了他那一千個叛變農民與工人的小隊伍，在一九二七年的冬天攀上了江西這座難以攻陷的山區。到了一九二八年的五月，朱德帶了他那一千二百個南昌暴動與廣東公社的老戰士的小隊伍，還有一九二八年一月他在湘南叛變時招募來的一萬個新農民黨員，上井崗山來和毛澤東會合了。他們被封鎖起來，但他們守住他們的根據地至一年之久，然後以不顧一切的大決心，衝出來去征取並建立蘇維埃共和國，到了一九三一年他們竟然達到這個目的。

井崗山的老戰士們，現在留存的不過少數幾個人而已。首領們至今仍生存的是朱德，毛澤東和他們的夫人康克清（現在祇有二十五歲）與賀子貞；陳伯鈞，蕭克，張文彬，傅連璋醫生，林彪，周興，鄧發，何長工及其他幾個人。

一九二七年廣東公社失敗後，許多共產黨員都逃到莫斯科去。一到蘇維埃共和國在一九三一年組織成立之後，他們開始溜了回來，經過那條危險的祕密路線，從汕頭越過土匪盤踞的羣山而進入福建的蘇區，再由那裏到達江西瑞金的紅色首都。在這個時期，許多婦女領袖與智識份子們，以及那些軍事專家們，都一同來參加了這南方的蘇維埃運動。第一屆蘇維埃

政府的老前輩領袖就是中央執行委員會裏的七個委員。

毛澤東 任弼時

朱德 項英

鄧發 王稼蓀

(顧作霖，「共產黨青年同盟」的書記，因辛勞過度於一九三三年病死)。

在我這人名錄裏的七十個人，都是一九三四——三五年間「長征」的老戰士，除了丁玲女士，她是一九三六年纔入蘇區，李立三與王明，他們都在莫斯科。在這次長征中有三十個女共產黨員同行，其中沒有一人死亡。

湘鄂蘇區幾個老資格的領袖是賀龍(紅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和他的政治委員關向應；蕭克，(紅軍第六軍軍長)和他的政治委員王震；陳伯鈞(後來被任為紅軍第六軍軍長)，以及在任弼時，蘇區政府主席，甘泗淇，第二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和柳紹文，宣傳部主任。在這蘇區中，毛澤東的親密朋友夏曦，任弼時以前的第一個領袖，是在一九三六年戰死於貴州的。

鄂豫皖蘇區中幾個老資格的領袖是徐海東(駐在那裏的第二十五路紅軍軍長，後來任第十五軍團的總指揮)與他的政治委員程子華，以及政治部裏的成仿吾，何柳華等。

四川蘇區中幾個老資格的領袖，他們也就是鄂豫皖的老戰士，是在一九三二年由鄂豫皖將根據地移轉到四川的）是徐向前（紅軍第四方面軍的總指揮）和他的政治委員傅忠，連同張國燾，四川蘇區的政治首腦，和李伯釗女士，戲劇部部长。

在蘇維埃時期中，有四個高級將領都已戰死，計爲方志敏，於一九三五年被俘處死；黃公路，第三路紅軍軍長，於一九三二年戰死；劉志丹，陝西蘇區的創立者，於一九三六年戰死；董振堂，著名的第五軍團的指揮，於一九三七年在甘肅戰死。

目前支配共產運動的幾個領袖是誰，從政治局與軍事會議的會員錄上可以看得出來。

共產運動的最高權威是政治局，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所選舉出來，洛甫就是這會的書記。政治局的幾個委員，當我在延安時是：

毛澤東 周恩來 博古 王稼祥 朱德（註） 張國燾 洛甫

註：中國有許多革命者都把他們的姓名，截作兩個字，因爲他們認爲名字中的第一部分是完全不需要的。他們排行名字中的第一個字，祇不過是給一個家族的子孫所取的傳代名字，其作用頗像數目字一樣。因此假如毛澤東要這麼做的話，他就可以叫做「毛東」，毛是他的姓，而東是他個人的名字。他的弟弟也就不是毛澤民，而是毛民了。

第二個最重要的最高機關是革命軍事會議。計有：

毛澤東，主席 周恩來，副主席

張國燾，副主席 項英，副主席

劉伯承，軍事會議參謀長 王稼蕃，副主席

朱德，紅軍總司令 葉劍英，參謀長

彭德懷，紅軍第一方面軍司令

賀龍，紅軍第二方面軍司令

徐向前，紅軍第四方面軍司令

徐海東，紅軍第十五軍團司令

陝甘寧蘇區政府——這僅有的蘇維埃——底人員，當我在延安時是：

董必武，臨時主席 謝覺哉，書記

蔡樹藩，內政部部长 博古，外交部部长

徐特立，教育部部长 王觀瀾，土地部部长

毛澤民，人民經濟部部长 林伯渠，財政部部长

劉少奇，勞工部部长

但現在還是讓我們來詳盡地介紹幾個更有聲有色的紅軍領袖吧，他們就是我去訪問時所遇到的。在我這二十五篇自傳之中，我已選擇了紅軍中的四個英雄——朱德，總司令；蕭克，這出身行伍的二十八歲的司令，是和那久經戰陣的高級指揮羅炳輝一樣地著名的；羅炳輝，是被稱為孤獨的狼，而老是在戰爭中據守那最危險的重要點的；以及徐向前，他們之中的一個最難捉摸的人物……

• 東澤毛與德朱





• 前向徐

第三章 朱德底生活史

一 朱德與毛澤東

我一到延安之後，「朱毛」就來訪問我。他們坐在院子裏的一張檯子邊，兩人對面坐着，很快地接連喝了幾杯咖啡。我却端坐着看他們，心裏在揣測，不知道這創立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兩大天才，性情究竟是怎樣的。

兩人立刻都採取了一種特殊的姿態。毛澤東拉下他那戴在頭上算是一頂帽子的軟布頭，交叉起了膝頭，目光炯炯地視察着周圍，聳起了眉毛，顯出一副和善嘻笑的神氣。朱德呢，謙虛地坐在凳上——顯明地是個堅強而沉默的行動家，同時也是個和善及富於同情的人。

我認爲毛澤東是那冷靜的政治頭腦，而朱德則是這門爭底熱烈的心臟，使他們的鬥爭得到實際行動的。他們彼此顯然是辯證的地相反，却又是相同的。他們是同一個有機體底分化的兩部份，具有完全諧調；可是純然不同的機能。

毛澤東是冷靜的，高傲的，奧林匹亞式的，出色地而且智慧地堅強的。他拉着他的民主

主義·宛如一塊未琢的寶玉，藏在璞石裏一樣。他那長而散亂的頭髮和不平整的衣服，正顯露出一種卓越的自信心，這自信心就是全部人類歷史中，學術與藝術天才底特徵。高高的身材而兩肩微俯，他那聳起的顴骨和特異的容貌，立刻使一個美國人想到亞伯拉罕林肯。而且他也像林肯似地，充滿着樸實的風趣，並且是個態度真摯富有吸引力的演說家。他是個民衆的「人」，但是就個人而論，他却是高特於他的同伴們之上，而和他們分開的。毛氏是個錯綜的人物，直覺而且敏感，但是具有哲學的頭腦和廣大的眼光，而不是拘於瑣細的認識的。

朱德是熱心快腸，慈厚而言語沉靜；尤其是謙虛，甚至謙虛到抹殺自己的程度——這恰恰和一般人對他的想像完全相反，人們以爲他總是一個凶猛的戰士，揮動着紅纓鬚的大刀，率領了他的軍隊衝鋒陷陣哩。他具有那種不可多得的富於魔力的個性，能够立刻而且普遍地使得幾乎每個人都被其所吸引。在外表上，朱德是普通的身材，長得很結實，很強壯。最特異的一個特點是，他那水汪汪的棕色眼睛，似乎是含有無限的憐憫。我便有這樣的一個印象，就是：他在心底裏實在是一個人道主義者。而這樣的人在中國却是很難得的；而且，更難得的是，他雖是一個軍人，他却不把戰爭當作一種事務，而當作一種終止痛苦的方法。他無疑地是一個富於情感且極寬大的人。

朱總司令是一位頭髮已經灰白的五十歲的老將。他那一半的歲月都消磨在實際的戰鬥中。在他臉上許多深深的皺紋裏，似乎是寫下了中國不斷的內戰中一切戰役底悲慘故事。他的嘴是成爲習慣地帶着一種頗爲憂鬱而嚴肅的神情，可是當他微笑的時候，他的臉兒却頓然有一種驚人地有趣的愉快之色，這種神情我碰巧拍着了一張照片。他是毫無武人底流俗習氣的，我們不能想像他掛着一把鍍金的指揮刀，盪在腿旁邊，正如我們不能想像與登堡著了朱德底一件沒有換過的褪色棉軍裝，腳上穿着網球鞋和裹着綁腿布一樣。他的舉動並不粗率，而是溫和從容及審慎的，他似乎沉着鎮靜得彷彿像一位深思的菩薩。

朱德與其說是一位威嚴的司令官，不如說是一位民衆的領袖；他在本性上及習慣上，那是毫無做作地民主化的。當我問他的夫人，康克清女士，在她看來什麼是朱德最特殊的性格時，她想了一會兒，就說道：

「他的第一個特點，我想，是他那非常溫和的天性。第二是，他對於隨便什麼事情，不論大小，都擔負完全的責任。第三是，他喜歡做普通戰鬥員生活中底一部份，而且喜歡在空下來的時候和他們談話。」

「他是真眞地被軍隊的羣衆所愛戴的，因爲他過着普通士兵底簡單生活，而且假如必要

的話，做着同樣的工作。他的綽號叫「火伕頭」，就因為他是像一個平常的戰鬥員一樣。他起先是在一九二七年得到這個綽號。那時他在湖南省南部的茶陵。有一天夜裏，國民黨的軍隊突然來襲擊，這時朱德正在一間小屋子裏，身邊祇有一個衛兵。敵兵衝進來，問他們「朱德在那兒」？朱同志立刻站起身來，向街那邊指着，說道：「他不在這兒，我是廚子。我知道朱德還在街那邊」。當他們趕快地走開，去找尋他的時候，朱德同志却趁這機會逃走了。

「朱德對部下說話是用很淺顯的字句的，他們都明白地了解他。有時候他幫着農夫們種田，假如他不很忙的話。而且他常常從山下將穀子背到山上去。他的身體很強壯很康健，他喜歡打籃球，他喜歡看賽跑。他隨便那一種的東西都吃，除了因為他是四川人，愛吃多量的辣椒之外，他並不要吃什麼特別的口味。他不到夜裏十一二點鐘是不上床睡覺的，可是到了早上五六點鐘總起身了。

「他喜歡運動，但是也用功讀書。他對於政治學經濟學的書籍，常是仔細地列下一張讀書時間表；並且現在每天化一點鐘功夫來溫習他的德文，同時還在陝北公學裏教書。他又喜歡和朋友談天，而且不是常常嚴肅的，雖然他不像毛澤東那樣會說笑。

「他平常沒有脾氣的，我從來不曾和他吵嘴過；但是在戰爭中他却會憤怒起來。在戰鬥

的時候，朱德總是在前線上指揮的，可是從來沒有受過傷。一位戰士對我這樣說。

紅軍是一支非常年青的軍隊，在古老中國底背景裏它是完全嶄新的。對於這個軍隊，朱德是堅定卓絕的象徵，亦是傳統與過去歷史之間的聯繫；因為朱德經歷過整個革命運動底過程，從那清末以來在中國內地的，革命運動底最遲緩可是最基本的形態起。他住在兩個最落伍的省份裏，內地中之最偏遠的——雲南和四川。當沿海各地那些急遽變動的潮流傳到了這種偏僻地方時，它們已是正確而經過試驗的了。朱德底經驗深深地在中國內地的根基裏，他之所以能獲得他部下底完全信任，以及中國軍隊中舊式將軍們底尊敬，這便是一個不小的原因。西南這一帶內地底由北到南的地勢，及其人民習俗等等，大部份都是他所親切地知道的。

朱德曾在雲南的共和派名將蔡鍔之下，受過訓練，進了中國最早的幾所現代軍事學校之一。他在那時候學習了特殊的游擊戰術，這戰術後來對於紅軍是非常有用的。當時他是駐守在滇越的邊界和川滇的山中要塞。在政治方面，他的開始為民主政治而鬥爭，是在一九〇九年，那時他是同盟會的會員之一；以後，他加入了國民黨。後來，完全出於他自己的發動，

他由研究與追求的結果，在一九二二年成爲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朱德爲了追求共產黨而由上海到北京；然後到柏林的遠征，正顯露出他那智識上的創導力和意志上的堅決。這二者便使他成爲三次革命中的領袖。

我們要想到中國共產黨運動底歷史過程而撇開朱毛這一對天才，實在是很困難的，他們兩人的確被許多中國人當作一個人，毛澤東所貢獻的一切，都由朱德用他對於紅軍底控制而加以補足。共產黨之能對紅軍保持那種驚人的紀律，其若干主要的原因之一，無疑地就是朱德對政治統御的忠誠和順從。軍事的勢力與政治的勢力絕無鬥爭，從朱毛起一直到各軍將領以及他們的政治委員，都是如此。這種朱毛的聯合，幸運得很，不是相爭的而是完全相輔助的。朱德無論在任何方面，都不懷有政治野心；他接受命令，因此自己能將命令再傳下去，——要指揮一個錯綜的革命軍隊，像中國的這紅軍似地，這一層確是關係匪輕的因素。朱德是忠於毛澤東的，而且對他的判斷力有信心。朱德既然絕不是一位拿破崙，我們是不能想像他會自擬爲這種誇大的帝王角色的。

可是這個謙恭沉靜的兵士，在中國却早已像「三國志」裏的古英雄似地，成爲大眾傳說裏的人物了。身任行動迅速而不可捉摸的紅軍底總司令，朱德底戰略，在敵軍看來，簡直是像

海市蜃樓一樣地神奇，而較爲迷信的人竟然說他是具有魔法的。中國人本喜歡對他們的民衆英雄，加上許多有聲有色的幻想。朱德便是被包圍在這種幻想裏的一個人物。靴長千尺，眼觀萬里，金剛不壞之身，無論那一種武器都不能損傷他；諸如此類的話。其中有幾個較爲可信的關於他的故事，連帶那些紅軍中的同志們都在說哩。因爲關於他的生活的故事，每一個人所說的都和別一個人所說的，可驚地不一樣。我真是幸運得很，能夠說服了這「傳說」的本人，來把他自己敘述一番。以下這篇簡單的，關於他一生事業的綱要，雖是沒有戲劇性的細節，而且並未十足地表現出一個早已是歷史的人物的朱德，但是它那平淡的真實性，却是非常可以寶貴的。毛澤東底生活史早已發表過了，但這裏却是「朱毛公司」——仿列寧的說法——中「朱」氏個人底歷史。

二 辛亥革命底前後

「我是在一千八百八十六年，生於四川儀隴縣一個名叫馬鞍莊的小村莊裏。我的家庭是貧苦的佃農。爲了維持一家二十人的生存，我們租了二十畝田。我在六歲時，進了地主丁某家裏底書塾去讀書。因此他要我繳束脩，而且待我很壞，彷彿這是做好事似的。我在家裏食宿，每天走三里路去上學，放學後我做着各種的工作，例如挑水看牛等等。在這個家塾裏我讀了三年書。

後來，在地主底壓迫之下，我們這大家庭實在沒法生活下去，因爲經濟的困難，一家人就拆散了。我過繼給一位叔叔，就搬到大環去和他同住，我自己的父親待我並不好，可是這位叔叔却愛我如同他自己的兒子一樣。而且送我進學校去讀古書，讀了約有六七年。我們這一家裏，只有我一個人受過教育，我爲了要達到求學的目的，便不得不進學堂讀書時，兼做各種勞役。

「我在一九〇五年考過科舉，一九〇六年往順慶縣，進了一個高等小學，讀了六個月書，後來又進了一個中學堂，讀了六個月書。到了一九〇七年，我到成都一個體育學校裏讀了一年，後來就回到我故鄉儀隴縣，在那兒的高等小學裏教體操。一九〇九年我到雲南省城雲南府去，進了「雲南講武堂」，直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時纔離開。我的志望向來是要當個軍人，雲南的這個講武堂當時大概是中國最進步最現代化的了。它的章程是很嚴格的，所以我對於能够考取進去讀書，覺得很快活。

「我早已就崇拜現代科學，而且感覺到中國有工業革命的需要。小孩子的時候，織布工人們和遊動工人們所說的太平天國故事，對我的影響也很大，這些人在當時都是新聞的傳播者，一九〇九年我進了講武堂之後，不到幾個星期，因為我早有革命的傾向，就加入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團體——同盟會。

「一九一一年時，我任連長之職，參加了推翻滿清的革命，因為我是雲南都督蔡鍔所統滇軍底一部份。辛亥革命是於十月十日在漢口開始的，二十天後我們雲南也起義了。就在那一年裏，我奉命往四川，去和滿清的總督趙爾豐打仗。我們擊敗了趙，在第二年四五月裏回

到四川。到了一九一二年的下半年，我被任爲雲南講武堂的學員分隊長，同時在講武堂裏教戰術、作戰演習，射擊術和步鎗實習。

「一九一三年我被任爲蔡錕部下的營長。在中法邊境駐守了兩年。一九一五年我升任團長。奉命到四川去，和在那裏的袁世凱部隊作戰，打了六個月之後，我們打勝了。我升任旅長，我的軍隊駐紮在川省南部長江兩岸的瀘州等處。我的部隊就是精銳的第七師第十三混成旅（後來改爲第七混成旅），在當時是頗有點名氣的。可是，我們所受的損失很大。全旅半數以上的人都作戰死亡了。我在這個地帶駐守了五年，不斷地和那些受北京段祺瑞政府命令的變節的舊式軍隊作戰。

「到了一九二〇年底，我回到雲南府，進攻反動的唐繼堯，因爲這時候蔡錕已經死了。蔡錕，南方最進步的青年革命領袖之一，對於我是很有影響的。袁世凱在一九一五年陰謀稱帝時，第一個爲保衛中華民國而揭竿起義的就是他。

「從一九二一年九月到十月，我是雲南省警察局局长。後來唐繼堯陰謀返滇實現，我逃走時祇帶了一連人，雖則唐繼堯追我追了二十天。另外還有一位同志和我一同走的，也帶領一連人，却被唐繼堯捉住了，被他非刑處死。我帶了這一連逃難的人逃到西康，所走的路徑

和後來紅軍在一九三五年「長征」中所走的完全一樣。我們渡過了金沙江。到了打箭鑪附近的雅州，在那裏停一停，後來就進入四川省。我先到嘉定，後來到重慶，劉湘督軍和重慶衛戍司令楊森都款待我，在一九二二年六月，和他們一同看了端午節的龍舟競渡。這兩個四川的軍閥後來自然都是被紅軍所攻擊的，可是在那時候，劉湘却不但沒有懸賞購我的首級，而且還急於要派我做一個師長，但是被我拒絕了，因為我早已決心要替自己尋一條新的革命出路，就是追求共產黨。至於劉湘之所以要取得我的幫助，是因為我的特殊戰術那時早已出名而且爲人所共畏。這種戰術，我用以攻擊清朝的軍隊而獲得大勝的，是一種流動性的游擊隊戰術，大半從我在滇越邊界駐守時和蠻族及土匪作戰的經驗中得來。軍隊中的逃兵流而爲匪後，多結成了流動的集團，我在和他們打仗的時候，就學得了一種艱苦的經驗，這種經驗是特別地有價值的。自然，我是一面把這種游擊戰的經驗，和我在書本上及學校裏所學得的，配合了起來。

我個人對於帶領軍隊的經驗是這樣的：我自己體格強壯，所以我能和弟兄們一同生活，並和他們發生最密切的接觸，因此便能得到他們的信任。在每次出戰之前，不論大戰小戰，我總先察看地理的形勢，很仔細地計劃一切的細節。因為謹慎的處理和親自率領部隊，我

的主要戰術總是正確無誤的。我向來堅持着要先從一切的角度，去弄清楚敵軍的地位。我總是和民衆維持良好的關係，這對於我也大有帮助。蔡鏗指揮軍隊的戰術是很出名的，我受教於他者甚多。自然，那時的滇軍是新式的，現代化的，而且備有德國步鎗。我認爲，對於將領及其部隊的重要因素，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對於政治情勢的了解；有了這種了解，他們纔會具有爲一種主義而堅強地戰鬥的精神。此外便是經驗了——你越戰鬥得多，你就越能把握住當前的情勢。

「脫離開了四川劉湘之後，我就乘船溯江而下，到上海去尋找共黨。當這時候，中國已退回到軍閥封建時期，前途實在黑暗得很，因此我感到十分抑鬱。當我在四川當軍官的最後一年裏，就是一九二〇年，我染上了吸鴉片烟的惡習慣。可是我在一九二〇年年底回到雲南時，就買了點藥，預備給自己戒掉鴉片烟癮，那時是在我逃脫唐繼堯之前；後來在一九二一年初次「長征」到西康去時，我就吃了這戒烟藥，一直到乘船往上海時，我還在繼續戒烟。等我到了上海的時候，我的烟癮差不多都已經戒掉，後來再在上海廣慈醫院裏好好地醫治了一個禮拜，我的烟癮便永久地戒除了。

「當我在一九二二年離開四川去尋求中國共產黨時，我對於怎樣和這個黨發生接觸，是

一點也不知道的，不過我已經決心要和它發生一種關係。實際上是，我後來纔知道，這個黨還祇是前幾個月組織成立的哩。我對於共產主義及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興趣是從我自己所讀的俄國革命史引起的。我所受的唯一另一影響，是和幾個留法返國學生的數次談話。當我駐軍於四川時，我讀了一切我所能覓得的關於世界大戰及俄國革命的書。直到此時為止，我的精力是都用於保衛中華民國的戰鬥，及實現孫中山的民主政治上。我明白，中國的革命是必須更深入更澈底，像俄國的革命一樣的；而俄國革命之繼續成功，更給我以希望。

「我在上海一點也找不到共產黨的痕跡，於是我到北京去，去繼續我的找尋。孫中山先生底機關報「民報」的主筆孫炳文，和我一同去，也是去尋共產黨的。可是我在北京找共產黨的運氣仍舊是不好，便又回到上海。這樣地，在這一年——一九二二年，我由南而北由北而南流浪着，像一個脫羈之馬似的。我對於北京之主要印象是，國會腐敗不堪而且性質可笑。可是，在另一方面，我遇到了許多學生。並且和其中的幾個一同旅行過。他們那活動的情形給我很好的印象。

「我回到上海後，就遇到孫中山、汪精衛、胡漢民，及其他的國民黨領袖們。孫中山給我的印象是一個極其誠摯堅決和明智的領袖。他要我到四川去打陳炯明，可是我拒絕了，孫

氏後來就要我到美國去，但我却一心想到德國去研究軍事學，和親自去看看世界大戰的結果。在九月裏，我就搭船到歐洲去，經過新加坡和馬賽，然後到巴黎。在巴黎我拍了一張由愛弗爾塔俯瞰全城的照相，頗覺得意。

三 柏林的中國共產黨

「在柏林，我遇到了周恩來（現在是紅軍軍事會議的副主席），及其他的同志們。我畢竟找到了中國共產黨——在柏林！我是於一九二二年的十月裏到柏林的，那時大約三十六歲。我找到了共黨之後，即時即地就入了黨，這是在一九二二年的十月裏。

「我在柏林住了一年，學習德文，後來到戈丁根（Göttingen）去，進了個大學。聽了兩學期的社會科學，一半是以此作爲一種掩護的方法，使我自己可以在德國繼續住下去，當我在德國的時候，我專心地進行着黨的工作。在柏林，我們組織了一個國民黨支部，時爲一九二四年。當時還有個「中國青年黨」，是一個國家主義的黨，於是留德的學生便分成了兩個陣營。我同時編輯了一份政治性質的週刊，是用騰寫版印的。鄧演達，後來創立了「第三黨」的，那時也在柏林。我出席過世界學生代表大會，一九二五年因爲參加與張各夫（Chankoff）案有關的活動，被德國警察所捕。張各夫是保加利亞的反動派，有人在禮拜堂裏想擲炸彈炸

死他，因此許多人牽累被捕。被捕的總共三十個人，內中有三四個中國人。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被捕，遭受拘留二十八小時。我第二次及最後一次的被捕是一九二五年在柏林，爲了在一個共產黨所召開的集會裏，參預「五卅」運動。所以，我恐怕，我的革命入獄紀錄是不很神氣的，一共攔總祇有五十八小時。那時候，我和好些在德國的印度人一同工作。在學生代表大會裏，有好些國度的人，我都和他們做了朋友。我最後便因爲從事這些活動，被逐出了德國。於是我到歐洲各地去游歷，並由歐洲往蘇聯，直到我在一九二六年回歸中國的時候。

「回國之後，從上海到漢口去，由漢口再到四川萬縣。我是奉了黨底命令，到四川去領導一個軍事運動的；同時因爲我是楊森將軍底好朋友，派我去煽動楊森底部隊。這些部隊原本是在吳佩孚部下的，楊森就是吳所任命，所以他們一向反對國民黨的北伐。然而我終於做到了幫助改編他們，作爲國民黨底第二十軍。我做了這第二十軍底政治部主任，因此也就是國民黨的黨代表，或是政治委員，但我並不擔任軍職。到了一九二七年，因爲楊森底態度仍舊動搖，而他的軍隊，雖則表面上已改組爲國民革命軍，却仍和北方的敵人暗通聲氣，所以湖南的唐生智便奉命帶了國民黨軍隊來打楊森。這時我離開了萬縣到江西去。」

「一九二七年一月我加入南昌的朱培德軍隊，被任爲南昌軍官訓練學校的校長，兼南昌公安局局長，這兩個職務我一直做到八月一日的「南昌暴動」。我幫着組織了這個暴動，而且是在我公安局長底保護之下計劃着的！暴動之後，我被推爲暴動期間所組的新第九軍的副軍長，這一軍大約有三千人。在這一次的暴動裏，國民黨底第四，第十一，及第二十軍也都參加的。」

「這時候我和周恩來，賀龍，張國燾，林伯渠，林彪，徐特立，葉挺，以及其他的同志們一共工作。毛澤東當時不在南昌，我直到後來纔會到他的。」

「我後來率領軍隊到東江去，就是在廣東海陸豐附近的東江區域，我是擔任我們革命軍底右翼司令。我進攻梅縣的三河壩，葉挺和賀龍進攻潮汕一帶及汕頭。我們兩方面在這些區域都失敗了之後，我就退往福建去，後來再到江西及湖南。那時候在我第九軍裏的弟兄，大多數都犧牲了，我一共祇有千二百人，其中還有賀龍葉挺部隊潰敗之後，許多散退下來的兵」。

四 紅軍

「後來我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帮着組織了「湘南暴動」，我們將軍隊底名稱改爲「工農革命軍第一師」，並揭起紅旗，旗上有斧頭鐮刀，以及紅星。我們在湘南暴動中，第一次在我們的旗幟上用了紅星。六個月之後，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我到江西的井崗山去，所帶的軍隊已增加到一萬人。在這個地方，就在井崗山底山脚下，我初次會見毛澤東。這是個很興奮很快活的聚會。後來我們就在井崗山建立了我們的第一個根據地。」

「在「湘南暴動」之前，毛澤東底軍隊就在一九二七年冬季出發向井崗山去了。我在一九二八年以前和他的唯一關係是，他曾派他的弟弟毛澤丹，來和我聯絡，那時正當我從廣東東江區域退下來之後。一九二八年在井崗山上，毛澤東和我把軍隊合併起來，改組爲「第四軍」，所以要用這名稱者是要保存國民黨第四軍那著名的「鐵軍」名，因爲這一軍在大革命時期中，是我們的革命重鎮。我被任爲第四軍的軍長，毛澤東則任政治委員。我們在井崗山上住

了六個月，擊敗過三次想殲滅我們的進攻。這時候，彭德懷在平江方面暴動之後，也到井崗山上來了。我們留下他來駐守井崗山，而毛澤東及我則於一九二九年率領我們的部隊，到贛南福建廣東及湖南去，繼續進行我們爲蘇維埃的長期鬥爭，自此以後，我的生活就祇是紅軍歷史中的一部分了。

「現在來回答關於我個人生活的詢問：我在加入共黨鬥爭之前，結婚過兩次。我的頭一個老婆已死，但第二個老婆至今還活着。頭一個生了一個兒子，可是我不知道現在在那兒。在一九三五年的長征中，我在報上看到，我的兒子——那時是十八歲——已經從他所住的他母親底故鄉、淑府附近的南溪，逃了出來，以免被害。我這頭一個老婆是師範學校的教員，天足，而且懷有擁護革命的進步思想。我和他結婚的時候，我是二十五歲，她是十八歲。我的第三個老婆，我在一九二八年的湘南暴動中和她同居的，名叫吳玉蘭，她後來被湖南省主席何鍵所捕，殺了頭。我現在的老婆是康克清，我們結婚於一九二八年。

「可是不，關於我有幾百萬家財的傳說是不正確的。我在雲南固然有點家產，但是並不多，此外我的老婆也有一點，然而當我在一九二一年被迫離省時，我的產業都被唐繼堯所充

公了」。

我問朱德，他所認為最好的軍事人才是誰？他的回答是：

「我很佩服德國人——與登堡和毛根森 (Morfensan)，毛根森是德國軍略戰鬥的軍事專家。福煦大將底保衛法國是很出色的。此外，自然，蘇聯陸軍中的紅軍將領們，現在都是經驗豐富的第一流人才，例如加倫 (白魯撤爾) 將軍。」

「就老法而論，拿破崙是不算壞的。當我小孩子的時候，我很喜歡他，而且也喜歡華盛頓。美國大革命中農民義勇軍之成功的故事，往往使我很奮發；而且我知道，將來總有一天，中國底農民們也會同樣地起來為自由獨立而奮鬥。」

「在本國人方面，我一向是佩服雲南的蔡錕，他是現代軍事學的最好最早的專家。至於在政治方面，我對於孫中山先生是極敬重的」。

我接着便想知道，在現今中國的將軍們中，朱德所認為最好的是誰，因為他們大家都打過仗。他說道：

「蔣介石，以及白崇禧和李宗仁，蔡廷楷和張發奎，都是好的。至於在蔣介石直屬的將

領中，何應欽沉着，陳誠，薛岳，胡宗南，羅卓英（陳誠部下），以及朱紹良（甘肅省政府主席，都是最好的。

「真的，使國民黨軍隊達到現在這樣的能力的，可以說是紅軍，在起頭他們簡直不是我們的對手，可是在第四次圍剿之後，蔣介石完全改組過他的軍隊，並且普遍地採用新的戰略及方法，以冀擊敗我們，這就使得中央軍內發生了一種顯著的改進；同時他們對軍隊所用的宣傳也很有效力，尤其是增加了軍官們底士氣」。

當我問他，如果把中國的士兵，人比人地，和別個國度底士兵比較起來時，他以為中國的士兵如何？朱德便堅決地答道：

「不中用而且壞的是中國的軍官們，不是中國的士兵。這些弟兄們祇需要政治的訓練。要是中國底士兵能在紅軍之下受訓練的話，他們必然會成爲世界上最好的戰士。因爲他們能忍受任何性質的艱險，並且能在最困苦的情勢下保持他們的鬥志。然而任何別個種族的兵士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却會在精神上及體力上完全喪失了戰鬥力的——正如中國底苦力在作苦工及忍受上是無比的一樣」。



四巨頭。
自左至右
為博古，
周恩來，
朱德及毛
澤東。一
九三七年
攝於延安



毛澤東。

(石印圖像)

朱德·



朱德（石印圖像）

朱德同志

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 全体出席代表合影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



第四章 徐向前——黃埔出身的蘇維埃老將

一 四個蘇區底元老

徐向前是我此行最巨大的「收穫」。要是我在六月裏離開了延安，像我所計劃的那樣，我就要錯過他了。這位捉摸難定的將領是老遠地駐守在甘肅的，但是這一次我運氣好得很，正當我在那裏的時候，他却到紅色首都來了一趟；因此我對於那三個孤立的蘇區，便能得到了別人所不知道的故事，而且是出於那能說這些故事的唯一的人底口裏。徐向前一向是和中央蘇區隔離的，所以就連共產黨領袖們自己都差不多沒有見過他。我簡直要求過在延安的每一個人，給我一點關於他的傳記的資料，可是沒有人知道他個人的生活背景，祇曉得他是黃埔軍官學校底第一期畢業生。

對於四川的那些廢敗軍閥們及地主們，僅僅「徐向前」三個字就是一個「赤色恐怖」的炎烈火把。我很清楚地記得我初次聽人談起這名字時的情形，一個年老的四川地主，爲了逃避紅

軍而在天津做着難民的，這樣地說：

『我知道中央紅軍是很講理的。但徐向前却太凶猛了。四川的殺人實在殺得太多。否則的話，就連那些地主們都會得歡迎紅軍的，因為我們早就恨透了那些苛捐雜稅和腐化的軍閥統治了。』

因之，少說一點，我所期望見到的也是一個威武的軍人。但徐向前却一點都不像一個軍官，更不要說是像火把了。他是個智識型的人物，有着秀美而敏感的手及臉兒。我注意到他穿着一雙皮鞋——這是我所見到的，紅軍將領中所穿之唯一的一雙外國貨皮鞋！而且他還懂得點英語。他似乎是抑鬱的，沉思的，緘默的，不愛多說話，帶着一種可驚的謙虛的態度，偶爾有一種害羞的孩子似的微笑。他是瘦削的，蒼白的，神經質的，喉嚨間有神經過敏似的痙攣。他現在還祇三十五歲，在他多年的戰鬥中却已受傷過三次；而且似乎沒有逃脫革命生活所給予的心理上的損傷，像其他紅軍將領們所已經做到的那樣。然而他告訴我，在他各次的戰役中，他向來是很康健的，別的人則說他在率領部隊作戰時的異常大膽和勇敢都很出名。不過當我遇見他時，他正有病，而且似乎是很不快活。

醫生囑咐徐向前要好好休息，祇准他每天化一小時左右來和我談話。這種談話在他是

一件頗費力的事，因為他必須用好些功夫及精力，來把他的經歷敘述給我聽，尤其是因為他以前並沒有把這種資料搜集起來過，所以當他談着的時候手頭並沒有札記等等。蕭克總是帶着一本日記的，日記裏有他各次戰役底完全紀錄，徐向前卻不像蕭克這樣，因此對於記憶日期及詳情就感覺困難了。

我在探索紅軍中人物之個人生活底詳情時，總是感到棘手的。但碰到徐向前時，我簡直沒法進行我的工作。他對於自己個人似乎極不感覺興趣，因此我所能從他那裏哄誘出來的談話，一共就祇有五段，真使我失望之至。可是正因為他是個格外地敏感及智識型的人物——他以前甚至當過學校教師——因而是格外地意識到他個人生活經驗底意義的，我總以為他在這許多不同的革命情勢中，他的印象和反應如能讓我們知道，一定是強烈地有意味。但他却固執地不願直告，而且太拘於事實。他能從閉關的山西省的落伍環境中抬頭出來，是應歸功於他那智識的進取性的；在第一級的共黨領袖中，他是唯一的山西人。

徐向前代表了紅軍中的黃埔傳統，這一事實是他自己所意識到的。在我們的會談結束之際，他在他的評論中曾加上了這樣的一句話，就是：作為紅軍之所以優越的理由，還有一個就是如下的事實，紅軍『持續了真正中國革命底傳統精神，而且保存了大革命時期中黃埔軍

官學校底革命精神」。這些理想主義的，而且往往是小資產階級的，革命青年們，都是在廣東底黃埔受過教育，而成爲一九二五——二七年國民黨革命底生命與靈魂的；徐向前便是其中幾個僅存的前輩之一。黃埔畢業生中有很大的百分率是參加共黨的。在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之前或後；當共黨運動開始時，他們便是最早的犧牲者。在不幸的「廣東公社」及海陸豐蘇維埃中，有幾百個人都殺死了，而海陸豐蘇區底基幹便是教導團，是完全由廣東黃埔，及武漢黃埔分校「軍政學院」底學生所編成的一團。在後來的紅軍中，也有好幾十個黃埔生戰死。其他的人則離開了各縣區而加入「第三黨」。因之到今日還和紅軍在一起的祇有幾個人了，如徐向前，林彪，葉劍英，陳賡，聶鶴亭，陳伯鈞，左權，蕭勁光等，此外還有若干不很著名的。周恩來做過黃埔的政治部主任——不是做學生——至於他的革命背景在這以前已經在歐洲開始了。徐向前和蔣委員長部下的有幾個最好的將領，如胡宗南等，是同班生，他的軍事才能是和他們相等的。這些黃埔畢業生對徐向前很欽佩，他們在報章文字中提到紅軍將領時，總是把他的名字和朱德並列。據說有一次在松潘的戰鬥中，胡宗南曾派了一個使者到徐向前那裏去，傳達一位黃埔同學對另一位同學的問候。

自一九二四年國民黨革命開始以後，徐向前即轉戰於南北各地，差不多遍歷中國諸省。

他任從事於純粹的軍事工作之前，開頭是做政治部主任的。我以為在蘇維埃運動中，他有着最繁多的經驗，因為他是四個不同的蘇維埃運動底元老領袖。

他那經歷底大綱所告訴我們的，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民族革命」底故事：從這一革命在國民黨下的開始，至轉變成在共黨下為蘇維埃的鬥爭，而直到一九三六年之放棄那最幼小的四川蘇區。

徐氏是一九二四年廣東黃埔軍官學校第一期的畢業生，在國民革命的第一時期中，曾在北方和閻錫山及張作霖等作戰。對於特別訓練團之組成，他是努力參加的，而該團便是軍隊中的革命幹部。在一九二六年的武漢政府時期，他在那兒當着黃埔分校的講師，就加入了共產黨。到了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之後，他任職於著名的「鐵軍」中，後來在「廣東公社」中領導了一隊的工人。這次事變失敗後，他就隨同那命運不濟的教導團去保衛海陸豐蘇區，當時是中國底頭一個蘇區，後來却終於被毀滅了。他逃往上海，在一九二九年加入武漢附近的鄂豫皖蘇區。這一個剛強的小蘇區也許可以說是蘇維埃時期，最艱苦之階級鬥爭的場合，一共有着二百萬的人口。到了一九二二年，徐向前就率領了他的紅軍第四方面軍，到四川去建立一個新的蘇維埃了。

第一方面軍在江西打了敗仗，就在一九三四年開始了「長征」，在一九三五年六月到達四川，然後由四川前赴西北。徐向前和朱德在西藏度過一九三六年的冬季，並且在那兒組織了一個「少數民族特別獨立政府」；後來當賀龍及蕭克所率的第二方面紅軍，從湖南的長征中在六月裏到達西藏時，紅軍第四方面軍就加入了到西北的長征，於十月間在甘肅會合了紅軍底其他各部隊。

主要的蘇維埃區域一共計有五個，即：江西的中央蘇區，武漢及揚子江附近的鄂豫皖蘇區，湘鄂黔蘇區，川陝蘇區，以及陝甘密蘇區。徐向前是其中兩個蘇區的領袖，同時在兩次最早的嘗試裏，悲慘地在廣州及海陸豐失敗了的，徐向前也是領袖之一。鄂豫皖及四川蘇區底歷史，素來不大人知道，徐向前確是唯一的握有這種資料的人。我能得到這一個故事，在如此完整的一種形式之下，而且還有那幾已被人忘却的海陸豐底故事——海陸豐之役的參加者現在是沒有幾個人還活着的了——我真覺得自己運氣很好。

在敘述完了的時候，徐向前對於紅軍成功之理由，自動地表示了他的意見，並且分析那種戰略之發展底過程，這戰略便是他那第四方面紅軍在奮鬥中所採用的。當它最盛的時候差不多擁有十萬之衆，雖則後來於一九三六年及一九三七年，在西北和回教徒作戰時，這枝軍

隊曾受到慘重的損失。

以下就是徐向前所說的故事：

「我的家是在山西五台山，山西的督辦閻錫山也是生在那地方的。我的父親的一個秀才，教書度日。他又是一個小地主，有三四十畝田。我家中有兩個姊姊一個妹妹，哥哥嫂子，以及我的父母。」

「我生於一九〇二年，孩童時我在私塾裏讀過三年書，後來進高等小學讀了三年。高小出來之後，我在一家書舖子裏做了一些時候的夥計，然後進了太原師範學校。師範畢業之後，我在小學校裏教書，是五台山專志中學的附屬小學，這個中學就是閻錫山辦的。到了一九二四年，我跑到廣州去，進了國民黨的黃埔軍官學校。」

「山西省是很落伍的，無論在社會方面或政治方面。要想得到那些新的進步書籍來閱讀，事實上很困難。然而我已經對於革命極感興趣了。遠在一九一五年，當日本乘世界大戰的機會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件時，我便是反對二十一條的學生運動底領袖，在街上對民衆們演

註：五台山是中國底數大名山之一，現在是第八路軍底總司令部，同時也是冀察晉邊區「底中心。」

講着。國民黨底成立後來對我有很大的影響，並且我要想到廣東去，因為廣東那時候是革命底中心。我在一九二四年一到廣東之後，就加入了國民黨，當時我是二十二歲。

『我的父親是守舊的，他反對我的見解，我逃跑到廣東去是不給他知道的，祇有我的哥哥知道我想到黃埔去當軍人的意思。這時我早已結了婚，而且有了一個女孩子。當我到黃埔去時，我的老婆死了，後來我就不知道我那女兒怎樣了。』

『我是一九二四年黃埔第一期底畢業生。當時一共有六連人——大約七百個畢業生。我們受了六個月的訓練。黃埔那時有兩個蘇聯的講師，鮑羅廷和考洛夫，他們常對學員們演講，對我是頗有影響的。然而在那時候我是站在中間的，介乎右派的「孫文學會」與左派的共產黨之間，但加入共黨的人很多。』

『畢業後我被任為排長，參加討伐陳炯明之役的東征。我們開拔到東江（海陸豐）以及平山淡水。後來我被蔣委員長派往北方各省，奉命在國民黨底國民軍第二軍，河南胡景翼部下工作。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慘案發生時，我是在河南省城開封。那一天因為不容易從上海得到消息，我們不知道事實的真相如何，祇看見學生們在街上示威，可是我覺得很興奮。在胡景

翼底軍隊裏我是一個政治工作人員，就着手組織一個「教導營」，或稱「特別訓練班」，來訓練那些青年軍官們。我致力於這工作約有四個月時，進攻張作霖的戰事開始了。那時馮玉祥是國民第二軍底總司令，胡景翼是第二軍底總司令。馮底部隊中很少黃埔學生，但在第二軍中却很多。我們進攻山東的德州。我是在某一旅底參謀部裏，而這一旅却被打敗了，退往北京附近的保定。我們在門頭溝休息，後來開往宣化府，即現在之察哈爾，在馮玉祥底直接指揮之下。從那兒我們出發去打閻錫山，攻擊山西底榆州。這是一九二六年的事情，我在那時是當副團長。

『在山西我們也攻擊過廣靈和平型關，馮玉祥佔領過南口，後來馮打敗了，我們這一旅便派去幫助他，可是我自己病了，因此被留下在後方。王用賓——現在是在南京做着司法行政部長——當時是山西省政府的秘書長，就派我到安陽去組織一個特別訓練班，這一班是在第二軍底某一旅裏的。當時胡景翼已死，第二軍是在岳維峻底統率之下。過了不久，我不得不離開山西，到北京去休息。後來國民軍佔領了武漢，我便在一九二六年到那裏去。在武漢我起先是做南湖學生軍團底政治部主任，後來把我的工作改爲武昌中央政治董事學校底第一連連長，這個學校是黃埔軍官學校底分校。』

「我的加入共產黨便是在一九二六年的這個時候。黨那時剛在武漢公開及合法，所以我能够讀了許多的馬克斯主義書籍，這些書立刻對我發生了極大的影響。同時我有幾個山西同鄉是已經入了黨的，我在和他們談話的時候，也很受他們的影響。」

「當共產黨在一九二七年和國民黨分裂時，黨便派我到張發奎部隊裏去工作。我是在他的參謀總部裏。張發奎到了江西底曲江時，發表了一篇演說，在演說中他問他軍隊裏的人誰是共產黨，說是假使我們肯承認，並且脫離了共產黨，我們就不會受到一點點的麻煩。我因此逃了出來，到武漢去，後來再往上海。我在上海被黨派往廣州去指導工人運動，並幫助準備廣州暴動」。

二 廣東公社及海陸豐蘇區

「我對廣州的工人們教着軍事學，這是做得很祕密的。我們有六百個工人受訓練，可是每次祇能在一間房子裏訓練十個人，他們非常喜歡這種訓練，並且對於暴動很熱心。我自己是不會說廣東話的，祇好用一個翻譯的人！」

「在剛要暴動之前，我們把工人們分作六連，我是第六連底連長。這一連約有六百個工人，但是其中沒有幾個是受過訓練的。暴動開始的時候，第六連祇有六支槍和六個炸彈，但是當工人們佔領了警察總局之後，我們得到了許多鎗，而且這班人都會用它們，雖則他們並沒受過什麼訓練。」廣東公社的暴動是在一九二七年的十二月十一日開始的，工人們戰鬥了三天之後纔失敗。我是帶了我的一連人參加在戰鬥中的。在作戰時我的弟兄們祇死了三十個人，但是有多少人被捕和後來被處死，我却不清楚，許多工人都從廣州逃了出去。我自己跑往「海陸豐蘇區」。

「公社中的主力部隊是教導團（特別訓練團）。教導團裏都是從武昌中央政治軍事學校畢業出來的學生，這學校是黃埔軍官學校底分校，教導團則是歸張發奎統率的。他們從武昌調往廣州，大家都是學生，多數是共產黨，而且有許多是黃埔畢業生。他們便是這次暴動底基幹。教導團先從廣州逃了出來，後來我也和其他的軍官們一同跟着逃了出去。我們在黃花崗找不到這一團人，但是後來在花縣追上了他們，於是我們做了團部底官長。在到花縣的途間，我們是一路和民團打仗打出來的。我們離開花縣之後，就到從化縣，紫金縣，後來到龍窩墟，在那裏我們遇見了海陸豐的黨員們——一看見我們的同志們，大家都是不勝歡喜的。

「當教導團退出廣州城時，工人們還在固守着廣州。很少有人離開。武裝隊伍之從城裏逃出來的，祇有這一團人。當我趕上它時，團裏約有一千二百個人，都配備着鎗。這一團不久便改組爲紅軍第四師，葉仁任師長，袁愈任黨代表，王剛夫（譯音）任政治部主任。我是這第四師中第十團底黨代表，就是現在的政治委員。

「這一團從龍窩到海陸豐蘇維埃去，這個蘇區的建立者是彭湃。當我們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到那裏時，農民們召開了一個熱烈的羣衆大會來歡迎我們。他們帶着打鳥用的老式火槍，

除了這些老古董之外，別的東西是一樣也沒有，但是紅軍黨員中有幾個人却有一些新式的槍械。

「我不久被任爲我們這第四師底參謀主任，和彭湃密切地合作着。這位了不得的人物對於農民羣衆是有着巨大的勢力的，他們崇拜他簡直像崇拜菩薩一樣。海陸豐失敗之後，他就到上海去。有一天夜裏，在上海某人底家裏開過會之後，彭湃被一個奸細出賣，國民黨便欣然地抓住了他，處以死刑，這是在一九二九年。

「我們不久就完全佔領了陸豐縣和海豐縣底一部份。我不知道海陸豐蘇區人口底正確數目有多少，但至少總有幾十萬人吧。海陸豐蘇區另外還有一支軍隊，是第二師，共計士兵八百人。這些都是在南昌暴動後，從江西逃到海陸豐的武裝同志們。第二師的師長是鄧南（譯音），政治部主任是楊昌義（譯音）。一共算起來，海陸豐祇有二千個正規軍，——包括第四師及第二師。

「我們進攻甲子灣和惠來縣。後來白軍反攻，李濟琛所率的粵軍奪去了海豐。在海豐的戰鬥中；我們擊潰了陳銘樞部下兩團人，並且擊斃兩個團長。我們俘獲了許多人，可是在那時候我們是行着「關門政策」的，並沒有收他們到紅軍機構裏來，祇是釋放了他們。

『我們在苦戰之後又到了海豐底北部，想去克復這個城，但是失敗了，因此就逃到鄉間去，開始作游擊戰爭。我們雖然失去了海豐城，城外附近的區域却都在我們游擊隊底掌握中。那時我們的蘇維埃首都是在道安潭（譯音）和綠水潭（譯音）。有一次當白軍來進攻時，我們的第四師師長葉仁正在生病，當我們的部隊逃入山裏時，葉被留下在後頭，因此便被捕而遭槍決了。當他被捕之後，他們要他投降，但是他拒絕了，就被他們祕密地弄死。』

『我們天天和白軍交戰，當第四師回師去收復海豐時，我們這一千二百個人中，祇剩下四百個人了，本地的鄉農不願意加入到正規紅軍裏來，因為他們不懂我們的方言，我們也不懂他們的方言。我對於進行海陸豐的工作感到極大的困難，因為我直到這時候還是不會說廣東話。在山間的艱苦戰鬥中，我們的弟兄許多都犧牲了，可是我們找不到補充的新兵，因此這枝軍隊就逐漸地人數減少起來。而且，部隊裏的人差不多個個都有病，因為山裏的生活太困苦，而氣候又太熱，他們都不是這地方底土著，而且受不慣這可怕的濕熱，因此有許多人病死了。還有一些人是被白軍俘擄了去。我們最好的革命幹部，就都在海陸豐中犧牲掉。教導團是由國民黨時期中最優秀的軍校共產黨學生組成的，現在幾乎沒有一個還活着能說這故事的了。在海豐的戰鬥之後，第二師就和第四師分開，以後第二師底遭遇如何，我便一無所

知，當我離開那地方時，我們這第四師裏祇剩下六十個人！海陸豐一役的生存者現在真是寥寥無幾的了。自從我到這兒加入其他的隊伍之後，我祇看見過一個——袁愈，在紅軍第三軍團底政治部裏，他現在是前線軍官學校底政治委員。

「海陸豐蘇區毀滅了以後，我就到上海去。我是在一九二八年的三月裏離開海陸豐的，靠了共黨底秘密組織之助，纔得逃出那地方。」

三 鄂豫皖蘇維埃

「在上海我休息了二十天左右，接着便到日後成爲「鄂豫皖蘇區」——即湖北河南安徽蘇維埃——的一帶地方去，這個蘇維埃底主要區域是在湖北省底東北部。我在往那兒去的路上，遇到許多麻煩，但是沒有嚴重的危險。我是由黨裏的人介紹去的，並且由幾位和游擊隊員有關係的人引進這區域。當我到那兒時，我發現在鄂省東北部的游擊隊員中，一共祇有二百支鎗。這個蘇區並不大，周圍祇有幾十里路。那兒沒有正規的紅軍，祇有二百名的游擊隊員，大半是湖北十著的鄉農。這便是被稱爲「農工紅軍第三十一師」的。」

「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中，這個區域裏的農民曾在一九二六年間，對地主們起過一次暴動，這是在國共分裂之前。這些自動武裝了的農民們，後來都成爲戰鬥員，而組織了一個蘇維埃區域。這一蘇區是在一九二九年底下半年成立的，可是在幾月裏；我却記不清楚了。暴動是在黃安縣和麻城縣發生的，湖北東北部底這兩縣便成爲蘇區。這整個運動都

由共產黨所主持，而領導的人是鄭位三，後來在紅軍第二十五軍裏；譚紀英（譯音），第二十五軍的；和徐鵬程（譯音），後來背叛了黨的。他們都是湖北的共黨政治領袖。

「這幾個領袖還主持了豫省的運動，是以一九二八年底與一九二九年初在商城縣底暴動開始的。這次的暴動，參加者祇有幾百個人，但是第三十二師却是從這暴動裏產生出來的。這個區域在一九二九年初成立了蘇維埃，後來光山縣底一小部份也加入了蘇維埃。這時候安徽部份的蘇區還沒有組織成立。等到安徽部份加入了之後，我們就把這整個的區域稱為「鄂豫皖蘇維埃」，因為「鄂豫皖」三個字是人民所習用的這三省底古稱，湖北稱為「鄂」，河南稱為「豫」，安徽稱為「皖」。

「至於要在這個特殊區域成立一個蘇區的理由，是因為當大革命的時期中，那裏的農民早已組織了並且武裝了他們自己。還有，共黨在這些縣份裏都有良好的組織。可是，雖則鄂豫皖蘇區很接近武漢三鎮底巨大工業中心，却並沒有工人們入黨。在大革命中，民衆底大多數不但已經奮起而殺了許多的地主，同時使得另外那些地主們都逃走，他們還組織了一個「人民自衛軍」，擁有數千人之衆。他們雖則祇有十支槍，却占領了黃安縣城，並進而攻擊麻城。地主們也都有鎗的，就率領了他們的民團來反抗共黨所組織的「自衛軍」。紅槍會是反動

的，也在地主們底領導之下，來和自衛軍作戰。

（從開頭的時候起，這就是一個共黨領導的運動。而在國共兩黨分裂以後，「白」軍就開始壓迫農民了。他們摧毀了農民們底武力。有許多都被殺死或被迫逃亡。後來在一九二九年的春天，占據湖北的那支軍隊撤退了，於是農民們立刻又起來了。那一區域的人口有好幾十萬，但其中一部份是在反動勢力底控制之下。

『當我在一九二九年六月到了那裏時，我被任爲那支軍隊卽第三十一師底副師長；這一師底師長吳廣候（譯音），在我尚未到時已經作戰陣亡了。吳是湖北人，而且是一個黃埔生，他領導着現在的這支游擊軍，和王汝省（譯音）及李志良（譯音）等同。李也是黃埔生，王則是一個湖北人，生長於地主的家庭裏，是一個僅在高等小學畢業的學生。王現在服務於黃河西岸的紅軍裏。第三十一師的政治委員是戴全（譯音），這人後來背叛了黨，加入汪精衛底團體，我不知道他現今在那裏。那時候任渭城（譯音）——他後來也叛了黨的——是在河南的第三十二師師長，以及齊德惠（譯音），他後來被黨派遣到上海去。

『在我到湖北的時候，鄂北祇有一旅的國民黨軍隊，由陸陵（譯音）率領，向紅軍進攻。此外鄂北還有許多的土匪，及紅槍會，向我們作戰，紅軍就向北移動，消滅了許多的土匪。

紅鎗會那時是在白山關（按在黃安北，豫南邊境內）一帶。他們雖受國民黨指揮，却祇有二百支鎗，但他們有一千個民兵，裝備着舊式的紅鎗。過了不久，紅鎗會底隊伍會發生了裂痕，起先他們雖然都反對我們，可是經過一番宣傳和激請他們加入我們的「紅」軍之後，其中有一部份就來擁護我們了。我們於是一同去攻打「白」紅鎗會，而擊潰了他們。這些紅鎗會和湖南省的紅鎗會不同，彼此並沒有密切的關係。我們於是在光山的西南部組織了一個新的蘇區。白軍開始對河南商城的蘇區作大規模進攻。那地方的階級鬭爭是猛烈的，因為農民們在較早的時候曾殺死過一些地主，所以這批紳董們都很殘酷而趕欲報仇。當白軍占領了商城時，地主們都回來了，民衆及第三十二師則離開了那地方，到湖北底麻城去。麻城底紅軍以槍械供給第三十二師，這一師便回到商城，去和白軍作戰，以奪回他們的故鄉。

「這時候湖北紅軍底主力開拔到麻城底西北部，趕出了地主們和民團，重新建立了蘇區。」

第一次圍剿

「因為蘇區及紅軍底發展，白軍便開始了一次「圍剿」，由國民黨第十三師師長夏斗寅及

第四十八師師長徐源泉率領，紅軍退到了老君山，然後向夏斗寅攻擊。我們很幸運的是，別個戰事發生了，白軍底大部份撤退到別處去，剩下來的一些部隊也改變過它們的地點，離開了我們蘇區底中心。

「剛在這時候之前，白軍是除了一些山之外，把所有的地方都佔領了的。當他們來時，人民都逃入山裏去，但是那些被俘獲的都被殺死，他們的房屋也被白軍所焚燬；至於被殺害人數之衆，我簡直說不清一共有多少。然而農民們以前早已有過許多經驗，知道怎樣逃避侵略者，所以這一次沒有成爲普遍的屠殺。」

「白軍正在黃安縣南部焚屋殺人，紅軍三十一師底主力就開往該處去防衛。這是在一九二九年底冬季。我們擊敗了夏斗寅，他率軍退入黃安城內。我們俘虜了許多敵方的紅槍會，予以優待，並且加以良好的宣傳，因此當他們被釋放之後，他們總是反叛了白軍的。」

「紅軍直趨黃安縣底西南部份及黃坡縣底北部，並進入了孝感縣，而在這些縣份裏進行着游擊戰。我們消滅了許多反動紅槍會及民團底部隊，然後出發到羅山縣底南部，名叫宜化店的地方。這些區域的羣衆，一到紅軍經過他們的地方之後，就都起來參加鬪爭。我們把地主們底農具分配給人民，但那時並沒有重新分配土地。這是在一九三〇年底一月裏。」

「到了一九三〇年三月，紅軍第一軍由共產黨底中央執委會組織成立了，這一軍是歸徐濟成指揮的，徐是黃埔生，後來叛了黨，加入鄧演達的「第三黨」。趙大鈞（譯音）也是負責指揮的。這一軍底第一師及第二師是在商城編成，一共有一千個人。三十一師便改名爲第一師，包含九團，共有九百支槍，都是由白軍那裏俘獲來的。第二師及第三師則由武裝民衆們自己去組織，第三師底一部份從前是土匪。

「一九三〇年蔣閻馮戰爭時，紅軍第一軍總部率領第二第三兩師開往皖西，佔領了麻埠，霍山，延山及洛川，擊潰了白軍兩旅。第一師沿平漢線向西進，攻擊楊家寨車站，殲滅白軍一旅；然後回師攻擊楊亭口，殲滅白軍一團。我們於是從羣衆中組織了兩團新兵，用着在這些戰亂中所奪獲的槍。從這時候起，我們就採取了優待俘虜的新政策，有幾個後來在紅軍裏做了下級軍官。

「紅軍攻擊楊亭口以後，地主們就率領了反動的軍隊來攻擊黃安縣南部的八里邱，所以第一師就回師去防衛，後來再進攻平漢線上的花園。

「我們攻擊花園時，擊潰了駐守該地的第五團，俘獲了八支機關槍和四尊砲。這是我們頭一次得到這些重兵器。那時大約和一九三〇年的克復長沙是同一個時候。我們當時並沒有

無線電或者電話。我們雖然得到了這些利器，可是沒有一個人知道怎樣使用它，所以總是將它毀壞掉。起先我們的士兵們不知道怎樣用機關槍及大砲，亦不懂得怎樣將它們拆開來，以便看看裏面的構造如何。後來，他們纔強迫被俘的白軍教導他們。

『這時候我們的經濟情況很好，我們有上好的灰布制服穿，像紅軍現在所穿的一樣。紅軍在買東西時總是付錢的，——錢自然是從地主那裏充公得來。當時我們的帽子上面並沒有紅星，祇有一條紅布臂章。上面有一顆星和兩句口號，右面的一句是「擁護第三國際」，左面的一句是「實行土地革命」。

『第一師回師到小河溪時，我們開始招收新兵補充，以加強紅軍底實力。第一師那時有九團人，每團有九連。這時我們佔領了平漢鐵路西首的雲夢縣，祇守了三天，就又回到小河溪，從那裏再到慈姑店，和第二第三兩師會合，這兩師是由第一軍總部底參謀部人員率領的。那時紅軍一共大約有六千名部隊，其中第一師有三千名，第二師及第三師共二千五百名。我們這三師然後合併起來，到小河溪去，擊敗了彭紀標（譯音）所統率的軍隊。

『到這時節，我們已經把我們的區域擴成一個巨大的蘇區，在平漢鐵路東首建立了一個很堅強的蘇維埃。在一九三〇年的這個秋季，我們把十個縣份都分爲蘇區，不過每縣都祇是

一部份地方。

「紅軍在佔領了小河溪以後，就開始向平漢線上之廣水前進，加以攻擊，然後佔領了廣水北面的信陽車站，但是沒有佔領信陽縣城。我們因為不能夠佔領縣城，就從東北部份進抵陡溝，和正陽方面的游擊隊員會合，他們共計二百多人。那時的游擊隊都是穿便衣的，因為他們沒有制服。他們曾在信陽西南的子望山有過一次暴動，失敗後祇逃出了這幾個人。我們回轉去佔領了光山縣，擊潰了那地方的白軍二營，然後續進而佔領了羅山。在這個區域裏祇有一種很脆弱的羣衆基礎，所以我們又回到蘇維埃區域去，攻擊姚家寨和黃安城，可是，我們不能獲得一次的勝利，那裏的白軍始終很堅決。於是我們到夏店去，擊潰了夏斗寅第十三師底兩營人。以後，我們在料棚包圍了夏底部隊，向南前進佔領了休橋。我們也佔領了湖北境內的羅田，由羅田往河南境內的商城，克復了金家寨（按在皖西邊境），再度佔領這個曾被白軍所佔據的蘇區，擊潰了在那裏的民團底大部份。

「紅軍進了金家寨後，這些弟兄們都大為憤怒起來，因為他們找到許多被殺的男人女人及兒童底屍體，飄浮在河面上。

「紅軍於是前進到豫皖邊境，開始反攻安徽底六安及霍山，但是並沒有成功，所以就回

轉到麻埠。這是在一九三〇年底冬季，我們的軍隊因為找不到船，祇好從水深及胸的冰冷的河裏渡過去。可是這一次的冒險並沒有一個人死傷，而且弟兄們並不怕洗個冷水浴。這時候陳調元所率領的白軍從三面來圍攻我們，每一面有一旅人。我們却集中了我們的部隊，拚力攻擊他們的中央和右翼。我們的行動是那麽快，竟然有一個團長，剛在他桌子邊寫命令時，被我們俘虜了來。我們在這一次仗中得到二千支槍，和一架無線電機，可是仍舊不懂得怎樣用法。在這次征戰之後，第一師及第二師就開回到鄂省東北部他們的原防地去。在二道河我們遇到吉鴻昌所率的軍隊底一部份，擊敗了這支軍隊，俘獲了二千支槍和一尊過山砲。（這位吉鴻昌將軍就是後來轉變到很同情於我們，在大約一九三三年，被認為共產黨而處死的。）紅軍第一軍於是在麻城會合了紅軍第十五軍，這一軍是由一個姓蔡的黃埔生率領的。

『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黨的中央委員會命令第一軍把番號改為紅軍第四軍，任曠紀勛為軍長，我為參謀長。』

『我們攻擊馬可落（譯音），殲滅了夏斗寅軍四團，然後占領了新集，這是反動軍隊底根據地。紅軍第四軍進攻平漢線上的宣小村（譯音），和姚維鈞（譯音）的白軍戰作。我們俘捉了姚，除了兩連人之外，擊潰了他整個的三十四師，姚被送往湖北省的「蘇維埃軍事委員會」，』

監禁起來。雖然他在那裏所受的待遇是好的，他却秘密做着反革命的工作，計劃着鼓吹暴動，因此蘇維埃舉行了一個羣衆大會來公開審判他。人民要求，他對於他殺害的人及焚燬的房屋，須受應得的懲罰，並且請求當局處他以死刑，於是將他執行了死刑。可是，在此次之後，就沒有一個俘虜會被處死。他們都被送往後方，從事作工，在夜間出發看守疏忽時有許多都逃走了。因爲生病及生活艱苦，死了的也有幾個。我們會俘獲一個飛行員，後來被他逃走了。我們還奪獲一架飛機，並加以修理，我們祇用過一次，是飛去轟炸白軍，我們自己祇有一個紅色飛行士，那一次是我們強迫被俘的飛機師，在我們武裝監視下，執行我們的轟炸任務。

「在一個較後的時期中，當我擔任紅軍第四軍總指揮之職時，我們擊毀過十架飛機，都是用來復槍射擊下來的。我們從不用機關槍來擊飛機，因爲機關槍子彈實在太寶貴了，而飛機對於我們的重要性，却不值得化這麼大的代價去對付。」

「對於特殊的英勇行爲，我們是頒給一塊小的紅綢子，上面沒有字的。我們紅軍裏從來沒有勳章，當某一集團得到勝利時，軍事會議就送一面特殊的紅旗給它。」

「以上所述都是說明我們對於統治階級底第一次「圍剿」加以摧毀的第一階段。這一階段

的工作是成功了，而鄂豫皖蘇區也已堅強地建立。

「在那時候，鄂豫皖或「湖北湖南安徽」蘇維埃，是包括十縣以上的地方，共有人口一百餘萬。我們已擴大紅軍第四軍，使之包含三個師，即第四，第十，第十一等三師。此外，我們還有三團的警備部隊」。

四 三次的圍剿

『白軍底第二次圍剿不久開始了，於是在一九三一年五月，我們紅軍全體就向東進，開抵安徽底東部，擊潰了在那裏的白軍。後來吉鴻昌底軍隊由黃安及光山來進攻蘇區底中央部份。我們立刻對他加以攻擊，擊潰了他軍隊底一小部份。他退往羅山。我們紅軍的第四軍就回師向西。在潁皮河擊潰了那裏的軍隊。以後紅軍包圍了一個叫做道化的小地方，擊潰了黃安白軍第四十四師。二次圍剿於是又被我們擊敗了。』

『同時江西中央蘇維埃底軍隊也擊破了派去進攻他們的白軍。爲應付第三次圍剿起見，我們的鄂豫皖紅軍就計劃向南進發，以便與中央蘇區底紅軍配合起來，實行共同的防衛計劃。』

『我們鄂豫皖軍底第四紅軍開始向南行進，並且佔領了三個縣份——廣濟，英山和蘄水。在一九三一年七月，鄂豫皖紅軍底前鋒已抵達揚子江北岸了。』

「這時候，在紅軍底隊伍裏發現了反動的，反革命的工作。紅軍第四軍就回到麻埠，開始肅清反革命的工作。這次反動的首領是徐濟生（譯音）。在這時候我們底隊伍裏有了許多的背叛者。因為我們的情況很壞，而白軍的攻擊很厲害。同時在這時候，鄧演達的第三黨已經組織起來，許多黃埔生都不情願再繼續為蘇維埃而鬥爭。徐濟生就是這些反叛的黃埔生之一。以後在四川，當我擔任第四方面紅軍總指揮，而徐濟生在我部下做第十二師師長時，我發覺蔣委員長寫給他的一封信，信裏要他反叛我們。這是因為紅軍及蘇區擴張得很迅速之後，白軍就不但用軍事的力量來攻擊我們，還運用政治的手段，並且派了許多奸細到紅軍裏來。在紅軍發展底過程中，生活是不安定的，有時候好，有時候壞，因此在艱苦的時期中，有些份子就動搖了，而加入反革命者底工作。可是當幾個反動的領袖被捕後，其他的人都承認他們的錯誤了。這些反動份子底肅清，使紅軍底力量比以前更堅強得多。

「肅清了反革命以後，紅軍就回轉去強化鄂豫皖的蘇區。我們經過仁和集，然後通過和封橋（譯音），此後我們的軍隊便再向南進發，其中的主力是紅軍第四軍。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第四方面紅軍在鄂豫皖蘇區中央部底七里坪成立了。這是包括以前的紅軍第四軍，和紅軍第二十五軍底第七十三師的。我被任為總指揮，曾山被任為



紅軍中之騎兵。

彭德懷（石印圖像）



彭德懷同志



徐特立。

抗大
課室



政府委員。(會現在仍在江西附近某地工作)。

「第四方面紅軍於是向南前進，將黃安縣城包圍了二十七天。最後終於攻下了這個白軍底要塞！我們繼續經過南姚前(譯音)、陶府店(譯音)及固始縣。我們擊敗了六師白軍，即第七十五、第七十六師，第二，第十二師，以及第四十五師，第五十八師。在這次的勝利後，紅軍即佔領了商城縣。這樣便把這兩處蘇維埃底疆域，凝結成一個整個的單位了；以前在這兩個蘇區底中間是總有一個白區阻隔着的。那時紅軍第四軍底第二師到了廣濟，和紅軍第七十三師會合，這次白軍與紅軍之間的大鬥爭，繼續了四十八天之久。

「白軍會四次增調援軍，這些援軍都被我們所擊敗。他們派來第七師，第十二師，第十五師，第五十七師，以及他們的警備部隊底第一第二兩旅，所有的軍隊都被我們打回去了。

「我們於是擴充紅軍第二十五軍，加上了第十四師及七十五師，以前這一軍是祇有一師的。此外我們並在安徽西部編了一個獨立師。

「紅軍底主力這時便向西前進，經過潢川及光山，在這兩個地方我們打了好幾仗。我們擊敗了三師白軍，第七十五師，七十六師，及第二十師。在這次的戰鬥之後，我們前進到平

漢鐵路。紅軍第四軍和第七十三師轉向南進，包圍麻城縣，肅清了縣城附近的許多白軍。

「我們已經擊破第三次圍剿。在一九三一年，正當這第三次圍剿失敗之後，鄂豫皖蘇區達到了最盛大的時期。那時候，在我們控制之下的人口，大約有二百萬。」

「蔣委員長那時準備作第四次的圍剿了。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一日，紅軍前鋒到達黃安，和在那兒的軍隊作戰，擊潰其中的一部份，並使他們被迫退回，可是白軍底左翼，由著名的衛立煌將軍及陳繼承率領的，這時來進攻七里坪了，因此紅軍底主力便回轉到七里坪，和他們激戰了三天，擊潰了他們的第二師。然而此次的戰爭，這時已陷入僵持狀態。於是白軍認定這一方面實在太難攻擊了，就改變了他們的戰術，對金集採取側面運動。我們的主力便轉往河上岩。」

「這時候白軍將領們採用了一種新的戰略。他們不再攻擊我們的主力，却專揀我們的弱點來攻擊。同時，在皖西一帶戰事甚烈，紅軍正和梁冠英徐庭瑤所率的白軍激戰。因此我們的主力便轉向皖西，援助那面的戰鬥。……」

「這時候我們決定把第四方面紅軍抽調到別的地方去，這一支部隊是包含紅軍第四軍及

第七十三師。當經決定，這支軍隊應該到四川去，去組織一個新的蘇區；因為這個省份對於我們是一個很好的地方，物產既較為富饒，人口也稠密得多。我們便離開了鄂豫皖蘇區，把這蘇區交給別的部隊去保衛。我們經過了湖北，河南，陝西，向四川省進發，在一九三二年底十二月到了那裏。我們先佔據了川北底通江，南江和巴州（即巴中）。

五 四川蘇維埃

「在紅軍到達四川以前，統治階級底壓迫已經很厲害，因此當我們來到時，民衆們很興奮，立刻就開始了反對他們的壓迫者的鬥爭。許多人都亟於要加入紅軍，我們便增加了許多的新兵。可是，他們大多數都有鴉片烟癮，所以直到我們的紅軍士兵給他們許多的勸導，並在他們中間實施了教育工作後，他們纔戒絕了烟癮。結果是，所有的這些抽鴉片烟的人都自動地戒除了這種習慣，而成爲健壯優良的士兵。」

「我們化了一個月的時間來休息及補充部隊。於是四川的軍閥田頌堯就集中他的兵力，來攻擊我們紅軍了，打了三個月之後，他們都疲倦不堪，我們便集中我們的主力部隊，在千山（譯音）一舉而擊潰了他們。田頌堯共有四十團人，我們殲滅了它的一半，另外的都加入了紅軍。這是在一九三三年底五月十一日。一星期之後我們便組織了「通南巴蘇區」，即「通江南江巴州蘇維埃」。我們的前鋒到了嘉陵江底東岸，而我們的後衛却在巴州。」

「在巴州我們召開了一次蘇維埃全體代表大會，到會者有代表三千人，他們所代表的民衆有一百萬人，計巴州有五十萬人，通江有二十多萬人，南江也約有二十多萬人。」

「在全代表會之後，紅軍第四方面軍增長很快。原來的第十師擴張爲第四軍，十一師擴張爲第三十軍，第十二師擴張爲第九軍，七十三師擴張爲第三十一軍。」

「我們接着就和楊森底軍隊作戰，在八月裏佔領了營山；並在和劉鎮華（譯音）軍隊交戰以後，佔領了綏定（達縣）和宣漢縣，因此四川蘇維埃不久就包含了以下的十四縣：通江，南江，巴州，廣元，昭化，蒼溪，閬中，儀隴，營山，渠縣，宣漢，達縣，城口，及萬源，不過，這些縣份中有幾縣是僅祇一部份蘇維埃化的。」

「我們稱這蘇維埃爲「川陝」或「四川陝西蘇維埃區域」。蘇區政府的主席是熊國炳，是一個對羣衆有很大方量的四川土著，他以前曾經做過苦力工人，但已學會了讀書寫字。我不知道他現在是在那兒，大概是在西江區域吧。第四方面軍底政治部主任是傅忠。我仍舊擔任這支軍隊底總指揮，但最高的軍事組織則爲「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張國燾是這個委員會底主席。」

「這時候我們組織了新的紅軍第三十三軍，於是我們整個部隊就共有三十八團或六萬人。」

了。而白軍對這三十八團人則動員了大約一百七十團兵力，包括楊森，劉湘，田頌堯，鄧錫侯，李家鈺，和羅才佐（譯音）底部隊。這些都是四川本省的軍隊——其中沒有中央軍。劉文輝並不和我們作戰。四川白軍底總數，據我們那時候的估計，是共達二十五萬人。

『因為紅軍底戰鬥力量很堅強，四川省主席劉湘是非常畏懼我們的。四川的軍閥們布置了六條路線來攻擊紅軍；第一路是劉湘，第二路是楊森，第三路是李家鈺，第四路是羅才佐，第五路是田頌堯，第六路是鄧錫侯。我們抵抗這六路圍攻，達十個月之久，最後終擊敗了他們全體。在這十個月內，我們所擊斃擊傷者至少有十萬白軍士兵。我們自己祇有一萬傷兵在各醫院中；至於戰死者有多少人，則我並無統計。』

『在四川的軍隊中，劉湘底部隊戰鬥力最強，因此紅軍用它的主力來攻擊這支軍隊。紅軍便集中起來，並且縮小蘇區，實行大舉反攻的軍事策略，因此到最後我們所有的祇是，通江及萬源兩縣底一個小小的蘇區。』

『現在，我要把我們在四川和劉湘鬥爭的詳情，告訴給你聽：』

『當我們擊潰了上面提過的楊森和劉鎮華底部隊，並且將蘇區擴大到包括十四縣之後，我們的經濟情況大見好轉。在組織新的第三十三軍時，我們同時也擴充了舊的第四軍，第九』

軍，第三十軍，和第三十一軍，使每一軍都包含七團或八團人。自然，紅軍底勝利，是使得四川統治階級底根基，大起動搖了。直到我們紅軍到達時，四川底軍閥部隊一向是互相爭鬪，並且在永久的內戰中的，然而現在他們都聯合起來，來攻擊他們的公敵——紅軍了。因此在劉湘指揮之下的四川各部軍隊，纔能聯合起來而實行他們的「六路圍剿」，共計動員兵力達一百七十團之多。

「這就使得我們的地位困難起來了，尤其是因爲新蘇維埃根基未固，還沒有時間來使其堅強，同時羣衆們也沒有澈底澈明瞭革命底意義，因此他們不能爲搶救他們的蘇維埃而鬥爭，甚至不能爲保衛他們的切身利益而鬪爭，即使到了最後關頭的時候。羣衆們都是輕易地被反動軍隊們所壓服，而退入於順從的狀態。因此，在我們的處境中，第一件困難的事情就是，蘇區底基礎脆弱，同時羣衆們不知道革命底意義。

「我們的第二件困難是，雖則我們的武裝隊伍已經擴大了許多，可是補充的新兵對於作戰既無經驗，又未受過訓練。再則，我們的防線很長，大約有一千里路，因此紅軍不能夠集中全力在第一線上，而對敵軍加以殲滅；因爲這個緣故，我們在對方底攻擊之下就祇能退却了；除此之外我們便沒有其他可能的方法，來創造一個復原的機會，和運用以「少數消滅多

數」的戰術。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我們被迫作戰了十個月。我們總是集中我們的主力部隊來攻擊劉湘個人的軍隊，特別是在我們放棄通江縣城以後。在萬源附近的一個地方，我們會和劉湘底軍隊有過很激烈的戰鬥。對方底每一個部隊都受到重大的損失，但劉底部隊損失尤其大。到這時候，劉湘底部隊中，已經有三分之一以上，在有些地方甚至達三分之一，都受傷，戰死，或為紅軍所俘獲了。

〔因為白軍進攻之失敗，我們纔能在鎮龍關地方，找到了他們陣線中的一個弱點，便把我們的主力部隊集中於此，猛烈加以攻擊，於是得到一個形勢很好的陣地。我們接着就追擊白軍，不斷地加以攻擊，他們從東面的陣線退却，我們便克復了官達蘇區底大部份土地。因為他們的右翼這時候仍有堅強的部隊，我們就停止了我們的追擊，把我們主力之一部向西移動，在九月一日到達通江底南部。我們集中我們的軍隊於前線各陣地，從陣線底那個中央點擊潰了楊森，李家鈺，和羅才佐底軍隊，再度攻克了巴州。我們擊潰了田頌堯軍底兩旅兵，並且擊敗了鄧錫侯底部隊，直追他到嘉陵江之東岸。從我們集中主力於鎮龍關前線的時候起，到我們追擊鄧錫侯的時候止，一共大約是一個月。

『在這次的戰爭之後，紅軍和白軍都疲乏已極，實力均各大損，休養補充，勢所必需，

因此有相當時候沒有重要的戰鬥發生。

『因為要補充我們的兵員數，我們便前進到閬中，在那裏將我們的部隊擴充了許多。』

『當我們在一九三五年開始長征時，我們先於極危險中渡過了嘉陵江，然後擊敗了田頌堯和鄧錫侯底軍隊。我們接着便佔領了閬中，劍門關，劍閣，梓潼，彰明，然後渡過涪江，包圍江油城。』

『我們軍隊底大部份是集中在涪江區域，許多新兵都欣然來加入紅軍。例如，我記得在我的電話隊裏當時是共有一百二十人，可是在三天之內，一百名新的電話員都要求加入這軍隊裏工作，我祇好把這些工人送去補充軍隊。我們有那麼多的新兵來補充紅軍，因此在一個月之內，我們的部隊就增加了五分之二。這時候第四方面紅軍就擁有八萬以上的部隊了。』

『從江西方面來的紅軍第一方面軍，在他們的長征中，已渡過了四川的金沙江，因此我們派了第四方面軍底一部份去佔據了理番，並由理番前往懋功，去迎接第一方面軍。六月裏，我們在懋功縣境底大惠會見了第一方面軍。中國統治階級企圖消滅紅軍的一切圍攻，到這時候是都失敗了！』

『在懋功會合了第一方面軍之後，我們部隊底一部份留下在懋功北部的山裏，主力部隊則分爲兩路，繼續向北進發，一路前進到包州（譯音）左紀壩（譯音）。此後，爲了要分散白軍底部隊，紅軍第一和第三集團軍，均向陝西甘肅北進，同時，第四方面紅軍和紅軍第三十二軍（在羅炳輝指揮之下）都轉往「田奴」區域，在那裏擊敗了劉湘和鄧錫侯底部隊，並且增加了一萬名的新兵。這時候四川省城成都的情勢，對於劉湘很不利，因此他被排斥於「討共圍剿」之外，蔣委員長調薛岳底部隊來做援軍，這批軍隊到達了永愾（譯音）。』

『在一九三六年二月，我們把部隊集中在西康底道孚，鹽源，甘孜，雅江，康定，及其他的幾縣。我們組成了「少數民族特別獨立政府」。那時候第二方面紅軍已經開始了他們從湖南的長征，並且渡過了雲南省內的金沙江。他們經過了巴塘，在六月底這些部隊就到達甘孜，和我們的第四方面紅軍會合在一起。在七月初頭，我們一同開始了向北進發的長征，經過大草原，走了一個月之久。在八月的上旬，我們到了甘肅南部，岷縣，渭源，隴西，武山，臨潭一帶的地區。』

『在一九三六年十月，我們在甘肅底會寧地界會合了紅軍第一方面軍』。

六 評論

「最後，讓我們來討論，中國底紅軍爲什麼不會被擊敗，以及它具有怎樣的威力。中國研究政治及軍事情勢的人，不論他們是擁護我們或是反對我們，都不能不認識並承認以下這幾點事實：

「㊶中國人民底紅軍是由共產黨領導的，它是擁護無產階級底廣泛路線，並且實行謀被壓迫民族及全人類底解放的。

「㊷紅軍來自農工大衆，而且一部份來自白軍中之革命的士兵與官長，他們是在起而反抗白軍底高級將領之後，加入了紅軍底隊伍的。

「㊸紅軍有嚴密的紀律及組織。

「㊹紅軍有它的階級意識，而且它的將領們及指揮的參謀人員，都具有自我犧牲的決心，和奮鬥到底的精神。我們對於最後勝利必屬於我，具有堅決的信念。

『(四)因爲紅軍是代表人民大衆底利益的，所以它得到，且能繼續得到，民衆底擁護。』

『(六)紅軍在中國是澈底解救民族及社會的忠實軍隊，並且它決心實行這使命到底。』

『(七)紅軍有自我批判的精神，隨時改正它在鬥爭過程中的任何錯誤。因此，由於它的幹部人員底豐富的集體經驗，每一個人都有機會來表現並發展他的創造天才。』

『(八)紅軍持續了真正的中國革命底傳統精神，並且保持了大革命時期中黃埔軍官學校底革命精神。』

『我們也可以談談那在紅軍第四方面軍底鬥爭中，作爲一種進化步驟的戰術。這鬥爭中的一些階段是如下面所述：』

『第一階段是開始於一九二七年共產黨與國民黨底分裂。湖北河南安徽底農民，爲了要反對統治階級底壓迫，是不得不武裝起來而從事鬥爭的。這就是游擊運動底基礎。因爲在這個區域裏有許多的游擊隊員，徐源泉和夏斗寅底軍隊就對他們進行了第一次的圍剿。在這一個時期中，戰事是由游擊隊員們所主持，他們的一切戰術及戰略，也都是游擊性質的。』

『至於這種的戰術及戰略，我們對於這個問題有專書論及，我現在不必來詳細談它。可』

是，我不妨指出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每次我們從事於游擊戰爭，都是由於羣衆對統治階級的深切厭恨。不管敵軍底力量如何，環境底好壞如何，羣衆們總是請求紅軍向前進，爲他們而戰鬥，因爲他們對統治階級的厭恨是那麼地深切。

「假如我們的戰略地位是優良的，同時我們的實力是充足的，紅軍總肯接受了羣衆底要求，去和白軍作戰。但有時羣衆祇是爲他們自身底直接利益打算，不顧慮到紅軍底艱難環境或弱點，於是紅軍便不得不無謂地去和白軍作戰了。假使紅軍底將領不能夠聰明地處理這種情勢，我們總是遭到失敗的。」

「在每次這樣的戰事失敗之後，許多不良的結果都產生出來，例如戰鬥員士氣之低落，彈藥之浪費，以及羣衆們自身情緒之低落等。爲了要提高人民及戰鬥員底士氣，並補充我們的軍火起見，唯一的方法祇有找出一些實力薄弱的白軍來，而從他們那裏去獲得一次的勝利。祇有在這樣之後，我們才能再和白軍底主力部隊交戰，——否則的話，紅軍會再度失敗的。」

「從統治階級在鄂豫皖區域作第一次圍剿的時候起，到我們擊敗第二次圍剿的時候止，這一個時期中游擊運動有着很大的開展。游擊的戰術和戰略，都進步了許多，而且正規紅軍

組織成立了。這件事情，結果自然是，引起了白軍底動員向我們進攻。紅軍所採取的戰略是不斷地移動，殲滅白軍於某一點，然後敏捷地前進而殲滅白軍於另一點。

『我記得有一次，當我們在鮮花林和陳調元底軍隊作戰時，我們的右翼運動得那麼迅速和祕密，它竟然直搗白軍底團司令部，而發覺那團長正在書桌邊寫命令哩。』

『另外還有一次，我們是在仙橋鎮，和白軍底三十四師激戰中。我們包圍白軍，截斷了他們的後路。白軍的師長這時還正在對他的部下發號施令，一點也不知道周圍發生了什麼事情。他的衛兵甚至在他覺察情勢不妙之前，先搶了他的馬騎着逃了。到那時候他已經是我們的俘虜。這兩個例子就可以表示，白軍將領們在當時的一般昏聩情形，以及他們部隊底動搖的士氣。這種事情在紅軍是決不會發生的。』

『在第三次圍剿的時期中，白軍遭受了那麼多的敗績，他們最後也懂得改正他們的錯誤了。他們的戰術多少是有了進步。他們學會了站在陣地戰的位置，一步也不敢移動。因此，我們的戰略是要用許多的部隊，來包圍白軍陣地中的若干重要據點，以便截斷他們一切增援與接濟的路線。總之，紅軍底戰略是一種流動的「機動戰」。而這種戰略常能獲得良好的效果，例如在攻取黃安，張城（譯音）及徐家埠（譯音）時，我們都用過這樣的戰術。』

「在我們到達四川省之後，紅軍因為地理環境的關係，採取長戰鬪線的陣地。我們然後利用「夜襲」和「中央殲滅」的戰略，擊破了白軍底陣地。紅軍底戰略總是隨着經驗而進步的，並且跟着客觀的物質環境底變動而發展。雖然我們在這十年來的戰鬪中得到許多經驗，可是紅軍底將領們和參謀人員們，還是覺得這樣的經驗並不够。我們必須從理論上及行動上，繼續學習，以增進我們的智識。」

「現在中國底政治情勢已經變動了。我們的黨向全民族提出了這個口號：『停止一切內戰，實現和平統一，集中我們的力量，聯合起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族之和平統一，不久就可實現了，我們準備在任何時候上前線去，聯合一切的友軍，和他們合作，把日本帝國主義驅逐出中國。我們從開頭的時候就下了決心，要為解救社會及民族而戰鬪，直到最後一滴血。」

「我們要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我們對日抗戰；並且希望一切反日的友軍，給我們以寶貴的忠告，使我們能充分地為民族利益而効力——」

第五章 蕭克——英勇的神童

一 「活的發動機」

紅軍是充滿了神童的——但蕭克却是其中之最神奇的。他的神奇，是在於他的天才，不在於他的體格，因為他現在仍舊像是一個十七歲的中學生，和在一九二六年投入蔣委員長憲兵隊時一樣。（羅炳輝是紅軍中體格最奇偉的，雖則他所率領的却是紅軍最富於機動性的「人騎兵」；和他比起來時，「最輕量級」的戰士蕭克，就簡直像一隻小麻雀了。）

一向有許多年，蕭克是紅軍中最年輕的將領——直到一九三七年纔來了個漂亮年輕的陳伯鈞，年紀二十七歲的，不但拿去了他這頭銜，而且還拿去了他的軍隊。一九三二年時，蕭克被任為紅軍著名第六軍底軍長，那時他是二十三歲。他以好多次英勇的魯莽，和驚奇的勝利，立下了戰功，於是他的名字不久就和其他四五個紅軍老將底名字一樣，著聞於全中國了。在湖南湖北的蘇區中，賀龍蕭克這枝游擊軍底結合，是比較地帶點浪漫性的，但他們却在江西的「朱毛」軍一樣地可畏。蕭賀兩人率領了他們那善戰的湖南兵，在他們的區域裏，做下

了許多轉捩歷史的事蹟——輔佐他們的是兩位政治委員：王震，湖南籍的鐵道工人；關向應，東北人，一九二七年上海暴動中的領袖；此外還有一位任弼時，是他們那蘇維埃政府底主席。

蕭克，在那永遠機動的紅軍中，無疑地是一個最最機動的單位。他是處於一種繼續不斷的，短期機動演習底狀況中。當他說話的時候，他一會兒順着板凳溜，一會兒擱起腳來坐，一會兒繞着房間跑，一會兒解下他的皮腰帶，在膝頭上拍打着；一會兒衝到房門口，吐一口痰，好像預備敵軍來奇襲似的；一會兒握起了拳頭，在桌子上猛擊，或是無緣無故地，突然爆發出一大串的抒情口號來。他使我想起一架小的驅逐機，永遠是發動機開着，準備着起飛。可是，他是受過十三次傷的，所以這一點的神經過敏現象實在不足為異。

當我問這架「活發動機」，他為什麼不偶或靜坐一會兒呢？他便向空中躡身一跳，吶喊般地宣佈道：

『我喜歡自由，就是這個緣故！當我在學堂裏的時候，我們都得像念經的和尙似地，一點兒也不能動。在家裏也是這麼一套，——我向來是在孔老夫子底那種陳腐觀念之下，做了個犧牲者。孔夫子叫人沉默寡言，裝傻，從小盤子裏斯斯文文吃東西，而且還要隨時隨地客

氣講規矩，可是我却受够了！我一脫離了家庭之後，就賭咒要從此以後，充分享受自由，不管是大事情還是小的事情。所以你別想我會有什麼封建的，孔老夫子式的客氣」。

蕭克的確是對於古老迂腐的孔教反抗的一個範本。他的習慣是那樣地活潑有生氣和特別，我真不禁以爲他是生着一對大的藍眼睛，具有一副愛爾蘭人底頑皮脾氣。實在，他的眼睛不是斜的，是頂上平而下面圓的，而且他竟然有雀斑和一種紅中帶白的皮膚。但是最奇特而且最外國派的一件事情却是，他不但立刻捲起了他的袖子，他還脫下他的帽子！當我住在陝北蘇區的四個月裏，除了毛澤東之外，紅軍人物中對我除下過這頂寶貴帽子的，祇有他一個人。在我那個院子裏，那幾個衛兵不論吃飯睡覺，都戴着這些有紅星的布東西，而且還告訴我，說紅軍裏頭的人個個都是這樣的哩。這頂帽子簡直像是一種崇拜物似的。但是他們解釋給我聽，說是假使不戴帽子睡覺，他們的光頭就太冷了。

身材頗高，但是瘦瘦的——我想他的體重不會超過一百三十磅吧——蕭克在我看來，似乎是由充滿電流的筋肉所造成的。當我會見他時，他人很瘦，因此他開始害怕自己會有了肺癆病，像許多別的共產黨一樣。但是有一天他非常高興地向我宣布說，醫生已經驗過他的身體，保證他所恐懼的事情是毫無根據的。他生着一張美秀、坦白、富於表情的臉兒，和一種最

令人悅服的笑容，一笑的時候就顯露出白閃閃的牙齒。

這位神童是在中國所能遇到的，最使人振爽的英傑。因為有兩種主要理由：①因為他簡直混身都是正確的事實，細目，及數字，不像大多數中國人有絕不措意於數學的傾向；②因為對於中國那種虛偽的舊式「謙卑」，他自己本身就是一個完全的革命。他知道他的價值，不辭自加評價，而態度却天真自然。例如，當我欽佩地對他說道：『你有很好的記憶力哩』，他便立刻回答我道：『自然哪，但是我的理論力比我的記憶力還要好得多呢』。（他所具的唯一孔夫子式遺蹟是他寫過第一流的詩句，這是丁玲女士告訴我的，因為她讀過他發表的詩）。

然而，蕭克底合法的驕傲，並沒有超越他自己仔細地估計下來的價值額。當我說，『你有着整個蘇區中最美麗的妻子，和一個相貌完全像你一樣的美麗孩子』，他就譏誚地反詰我，彷彿我犯了一件托派破壞誘騙間諜重案似的：

『美麗是沒有用處的。但是她像我一樣，也是一個革命者。於是，微微地興奮起來，他說道：『可惜你以前沒有看見她。她現在是蒼白有病了，因為她在長征中想打胎，沒有弄成功，就在草原中間生下那個孩子』。

至於他那位公子，在最早的可能時候，便是不可克服的；不但堅持着要出世，還要很堂

皇地經過可怕的西藏草原，而在牛車旅行中活下來；顯然的，蕭克並不以這爲「不肖」。這個著名的「草原嬰孩」，蕭克軍隊裏的寶貝，確實是酷肖他父親的。不但「談吐」無不畢肖，（紅軍將領們常常要嘔吐，所以不是任何孩子都能像他們的孩子那樣善於「吐」的），而且差不多是同樣地機動。上次我看見他時，他正被人背着。參加另一個在雨中兩星期的英勇長征，是因爲他母親帶他到前線去，乘他父親出發赴山西對日抗戰前，向父親去送行。我和這大隊人馬一同旅行。小蕭克有時在路上睜大着眼向我看看，却絕不肯落下一滴眼淚來，因爲那是跡近封建的。

蕭克和賀龍，當他們同在湘鄂蘇區時，與一對姊妹結了婚，所以兩個人是連襟。他們的夫人都是美貌驚人，可是她倆都不肯讓我給她們拍照，也不肯把她們的自傳給我。要是他們的照相能够刊登出來的話，我想國民黨軍隊裏的少年軍官們，必然會大批退出，而紛紛奔到紅軍陣營裏去吧。這兩位年華雙十的少女，她們的勇敢簡直和她們的美貌一樣，並且因爲賀龍及蕭克，不但功績著名，亦且風采出衆，所以他們四個人，在這即使並非絕無却也足夠單調的紅軍戀愛生活中，倒真是一種不可多得的浪漫插曲。

這是蕭克底精細本色：他對於自己所參預過的一百七十次戰役，都完全寫下在一本日裏。同時這也是蕭克的本色：當我問他曾經受過幾次傷時，他立刻在一片紙頭上，寫下他每次受傷的正確日期，——正如，在火線上奔突馳騁，而受到了這些數目驚人的創傷，也同樣地是他的本色。對於這位少年英雄，「差不多」的事情是從來沒有的，——一切事情也都斬釘截鐵地做到盡頭，決不像孔夫子式地中庸而止。

當那兩年最拚命的游擊戰爭中，他單在一九二八年就受傷過三次：一次是三月間，在湖南宜章；一次是六月二十二日，在江西永新；一次是八月二十三日，在湖南桂東。還有一次是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在廣東梅縣。他另外還受過幾次傷，是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四日，在江西樂安；及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在江西東牟（譯音）。

『所有這十三次的傷；都是步鎗或機關槍傷』，他解說道：『有兩次傷勢很重。在一九二八年八月，一顆彈子擊碎了我的鎖骨，從背脊穿出去。還有在一九三二年六月，我在醫部中了兩粒子彈，有五十天不能行動。』

蕭克是中國破產的封建世家底產物，同時也是對於它的一種反動；他繼承了他們的腦力，却沒有繼承他們的頹廢。像毛澤東、徐向前，周恩來及其他智識份子士兵一樣，他可以說

是中國人所謂「儒將」底復生——儒將之模範是曾國藩。而蕭克便是很受曾氏影響的。這些舊日書香人家子弟，如徐向前周恩來蕭克等，都是受了教育準備當學校教師的，——但是結果却都成爲革命的傳道者。蕭克從前曾經發動過他自己的游擊運動。在中國革命中，縣城裏破了的產的書香人家子弟，領導着鄉下的農民起來革命。是一種很普遍的結合。在任何別的國度裏，這種運動總是由資產階級底政黨來領導的，但是在中國它却被吸收到共黨運動中去了。

就蕭克底情形來看，中國家族制度之崩潰是很分明的：兩個兒子加入了紅軍，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婿因「私通匪類」被槍決，還有一個女婿因爲做了農會底首領，而在一九二七年被殺死。此外頗有意味的是：雖則家裏的老孀已經差不多全坍塌了，蕭家却還僱用着長工，來耕種他們租來的田，因爲對於中國古老的城裏紳董人家，做工的事情是「碰都不能碰的」。

以個人而論，蕭克無疑地是一個天才，而且對於他早就得到的聲譽，足以受之無愧。他並且是那種在中國不可多得的人物之一——一個自力成功者。

當我問這位神童，關於他這頗不平常的成功，據他自己看來原因何在呢？他就用一種雖非孔夫子式却是馬克斯主義式的謙虛，答道：

「第一，當我參加了紅軍之後，我受了馬克斯列寧底教育，使我能够有革命的果斷和堅

決，並且發展了我的指揮能力。第二，我是朱德及毛澤東底學生，信從他們的訓練，因為他們是集團戰鬥術的大師。就是在一九三二年以後，當我單獨地在另一個蘇區裏執行我的任務時，我也總是遵照他們的訓示的。

「自然，我對於革命的堅決和熱情是無限量的，並且我能夠經過各種艱困而絕不動搖——但這些優點都是從上述的兩個條件發展出來，就是，我所受的列寧馬克斯底教育，和朱德毛澤東底訓練」。

當我在延安時，蕭克被任為四川第四方面紅軍底三十一軍軍長，去幫助它的改組，而比他年輕一歲的陳伯鈞，則被任為蕭克舊第六軍底軍長。因此，蕭克如今已不是紅軍將領中之最年輕的了。

以下就是蕭克底故事，完全依照他——在他那滿房間機動演習的攻擊之間——對我所說的話：

「我的父親是一個秀才，在清朝這是個最起碼的功名。在一九二一年以前，他所過的是崩潰中的縣城紳董底生活：在那一年他便破產了。我家裏一共有八九個人，兩個是我的哥哥。他們的生涯都並不比我平靜。大哥是在一九二三年四月，因被控與土匪發生關係，為官方

處死。二哥，蕭克榮（譯音），和我感情很好，在一九二五年加入共產黨，後來參加紅軍，作戰陣亡。

「我們的家是在湖南嘉禾縣底蕭克甸，這個村子就是用法家的姓做名字的，我在一九〇九年八月生在那裏。我的全名是蕭克成，但是像大多數的共黨一樣，我去掉了那無謂的末一個字。」

「六歲時我進了一個私塾，讀着孔孟之書——就是我所厭恨的四書五經。到了十一歲，我進高等小學，讀了三年，然後在初級師範學校讀了兩年半，受訓練準備當一個小學教師——對於破產的讀書人子道，這是最通常的生涯。」

「當我大約十七歲時，我停止了學業，在一九二六年到廣州去，加入軍隊。我投入蔣委員長底憲兵隊，當一名普通兵。」

「我之要到廣州去，是因為廣州是革命中心。當我在師範學校讀書時，我有一位表兄，在廣州大學的，寄了一些革命書籍給我，其中有幾本就是孫中山所著的。（湊巧得很，剛在這幾天之前，我接着這表兄寫來的一封信，問我是否真的就是他從前常常寄書去的那個克成，我便回他一封信，說真的就是我。我一看見那信封，就認得他的筆蹟了）。我接到那些書

之後，立刻發生莫大的興趣。尤其是孫中山所著的「心理建設」，和他的「倫敦蒙難記」。可是，就是在這以前，一九二一年的時候，我便曾讀過宋教仁底傳記，早已受到革命思想底影響；宋教仁是著名的國民黨領袖，被反動份子所刺殺的。另外還有一本書對我很有影響的，是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傳」，當我讀這本書時，我流過不少眼淚」。

二 一個黨員的造成

『我的故鄉和家庭都是反動的，頭腦封建的。我讀了這些書籍，而在思想上前進起來，完全是出於自動。』

『我對於軍事學也很有興趣，當我一九二四年在師範學校裏時，我就耽於閱讀中國的兵法古書，如「孫吳兵法」，「七大兵法家韜略」等書。我也讀會國藩所記的「曾胡練兵錄」。我是很受會國藩及胡雲翼底影響的。便是在今天，我仍能逐字不漏的讀完這本書，而且幾乎背誦得出來。我還記得。從前我對於世界大戰中凡爾登戰役的記錄，也很感覺興趣。』

『多數人以爲我是廣州黃埔軍官學校底學生，這是錯誤的。不過，當我在那邊的憲兵隊裏四個月中，我自己學習了一點黃埔的教育。雖然我年紀很輕，我是從來不忘記讀過的東西的，因此我很容易吸收黃埔教官們所有的智識，於是我祇消豎起了耳朵聽，我就能和他們一樣地有學識了。』

「在膠州，我是在蔣委員長部下憲兵第六十五補充團裏。起初我是做警衛兵工廠的下士，後來長官們看出我懂得軍事，就派我當副官，準備升我做連附。可是，過了幾個月之後，我就離開了憲兵隊，在一九二七年裏加入了著名的第二十四師，這一師是由共產黨葉挺所統率的，爲張發奎部「鐵軍」第四軍中最好的一師。我擔任連部政治主任。」

「我雖然祇是一個政治主任，可是當北伐的時候，却常常在前線率領兵士們作戰，和他的軍官們一樣。營長察覺出我的才能，因此當我們在河南汝南縣作戰，連長恰巧不在時，我便被派指揮這一連人。在這一戰之中，因爲我所表現的能力卓然可見，有若干時候我便被任爲代理連長。」

「當我們回到武漢的時候，我在名義上仍祇是政治主任，但是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暴動時，我却自然而然做了我這一連底連長。」

「我直到一九二七年六月，纔加入了共產黨，是在國民黨底分裂開始之後。在那一年底二月間，就有一個朋友來和我談話，……我便瞭解到，對於完成革命工作的問題，祇有共產黨才有唯一的解決方法，並且士兵農民及工人們，仍會繼續努力。我便領導我這一連人參

加「南昌暴動」。葉挺那一師底弟兄，都萬眾一心地，全部參加了暴動，因為共產黨底組織是從頂上一直到底層的。沒有一個人背離。

「我由國民黨轉變為共產黨是很自然的。因為我的家庭雖然是紳董階級，可是早已失去地位，而且一直到在破產中，到了我父親手裏，就祇有六畝田了。當我進學校讀書時，家裏對於付學費的事是一個大問題，而且我的衣服又舊又破，先生常常打我，對我這個破落戶人家是一點也看不起的。當我一讀到孫中山底三大政策時，我就竭誠地贊同他的主張，尤其是那條聯合農民工人及聯共聯蘇的政策。我對於這最後一個政策信奉得異常深切，因此當資產階級背叛了這政策時，我對於反革命的人就憎恨得很厲害了。

「我不能算是一個智識份子，祇能算是一個讀過書的農民。當我還是六歲的小孩子時，我做着牧童；後來進了私塾，放學回來還是要做工和照管農場裏的事情。我知道怎樣耕田和播種，而且我對於農民們向來有深切同情。在起初，我祇有一種農民意識，對於城市裏的無產階級是毫無所知的，直到我在大革命期中，看見真正的工人階級在武漢活動時，我纔明白了。這是因為，我生長在一個小小的封建鎮市裏，祇有一些木匠泥水匠之類的工人。

「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對於我有兩個主要的內容：一，打倒帝國主義，

以獲得中華民族之獨立與平等；二，打倒紳董階級及地主（包括封建的軍閥在內）。

『在大革命之前四五年，我已經在書裏讀到「不平等條約」、「中日之戰」、「庚子事變」，等等。在那時候，我不但是一個國家主義者，而且是一個帝國主義者，因為當時我有一種狹隘自大的觀念，希望中國將來能够打倒外國各民族，包括日本在內，而一一征服它們。可是漸漸地，我的觀念轉變為祇希望得到中國底獨立自由了。我想，我個人對於革命的主要傾向是反對帝國主義，或者是國家主義。

「然而，我也憎恨地主們。我記得，當我十四五歲的時候，我父親派我送租米去給地主。因為我的家庭是鄉紳，不能自己親手來耕田的，所以必須僱用苦力，並且從地主處租了田來耕種。那一年是荒年，我的父親叫我要求地主，把應付的租米從一千四百斤減少到一千二百斤。我和地主爭論了好些時候，最後他纔答應減少二十斤，我真氣極了。可是，在那時候，我所憎恨的祇是地主一個人，而不是地主這種制度。

「後來，我也憎恨大衙門裏的官吏們，和盤剝重利的人。當我的大哥被捕入獄時，家裏的人借到了五六百塊錢，想設法救他出來，這筆債款就成為我家裏的永久負擔。我家裏再也沒法將他還清。有一次當我十四歲時，官兵在我們附近的村莊裏捉土匪，我被他們錯捕了去

，家裏便又不得不向一個衙門裏的人，告借一百塊錢，纔放我出來。他們沒法付還這筆錢，我父親便不得不叫我二哥到那官吏底家裏，去教一年的書，作爲償還他的這筆款子。

「我的大哥是個小商人，他在土匪中有幾個朋友和主顧。他曾被捕過好幾次，每次在他被捕之前，總先有官兵到屋裏來恐嚇，說是假使家裏的人不拿錢出來給他們，他們就要拘捕他和處決他，因爲他和土匪發生關係。因此接連幾次之後，我家裏一共便又欠了五六百塊錢。到了最後一次我大哥被捕時，他就被他們處死，因爲我們再也沒法借錢去救他了。我那時是十五歲，他是二十七歲。」

「這種索詐，以及我哥哥最後之被處死，大半是由於我們本族裏一個地主底陷害，這人是恨之切齒的。直到我成爲共產黨員之後，我纔知道我的憎恨及報復是不應當對着個人的，應當把腐敗的半封建社會底一般社會問題，整個地合起來看；並且應當了解，我自己家庭和家族底沒落，祇是這種現象底一部份。」

「我那革命傾向底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對於舊式中國家庭制度的懷恨，因爲我所經歷的正是這制度之最崩潰的一面。還是在兒童的時候，我對於家庭生活的印象就很惡劣，巴不得逃出它的束縛。自從我離開家庭以後，我從沒有寫過一封信給家裏。我想我父母現在諒都去

世——當時他們年紀已很大，到現在是要在七十歲以上了。當我離開家裏的時候，我母親就認為我們這份人家是沒法再支持到五年的。她說，那所屋子早已年久失修，十年之內是必定要坍塌的。

「便是我現在談話的時候，我對於我那封建的家庭，也還是覺得很痛心。但是我很愛我妹妹，以及我那個做共產黨的哥哥。自從一九二八年四月，「湖南叛變」失敗以後，我就沒有見過我這位哥哥了。在那次事件之後，他漫遊了一些時候，做着秘密的黨務工作，在湖南常德被捕，但是他逃脫了，加入到國民黨第八十五師裏，做着秘密黨務工作。後來被人發覺，他伴得逃生，就加入了湖北某縣底紅軍。他起先是教授軍事訓練，後來擔任第三獨立師底參謀主任，在一九三三年初作戰陣亡。」

「我還有兩個姊姊。一個姊姊底丈夫被一個腐化的親戚所陷害，因為「私通匪類」而被處死，和我大哥底情形一樣。另一位姊姊底丈夫，因為是農民協會底會員，在一九二七年被殺死。」

「我非常厭惡封建的家庭觀念。我的父親是很威嚴的，他統治着他的家庭，我們一家人都在他的絕對獨裁之下，我也是如此。無論什麼事情，我都毫不遲疑地服從我父親。他命我



· 克 蕭



龍賀(右)克蕭(左)・影合賀蕭



賀龍(素描像)

不要賭博，不要吸烟，不要下棋，我就不。然而同時，他却想用一種守舊的教育來摧毀我的精神。我在家裏是個孝順兒子，但是當我離開家庭底羈絆片刻時，我却總是自在而且大膽的。我還記得，在鄉間的戲院子裏，又開雜又自由，我就很愛那地方。和我父親底嚴厲教訓以及他那些沉悶的孔孟之道比起來，這真是大不相同哩！

「自然，我要想逃脫家庭了。當我在師範學校的時候，學校裏有一位老師，是同情孫中山底革命主張的，我便向他借了七塊錢的本地貨幣，離了學校出亡，不讓我家庭知道。我穿上七件衣裳——我所有者盡於此了——就動身出發。在我離開之前，我寫了一封信給家裏，交給我的一個表妹（她是不識字的），叫她等我離開了之後送去。當他們接到這封信的時候，我早已到了廣東境內了。」

「我在雪中一路步行到廣東邊境的韶關。我所有的一些物件都在我妹妹給我做的一件背心裏。在我準備離開家庭的時候，我事先回家過一次，要求家裏把我所有的衣服都給我，只說是因為學校計劃舉行一次旅行，我在旅行中需要這些衣服。我妹妹便一定要把她那件最好的背心給我，好讓我穿了參與這盛舉！」

我那時的念頭是要找尋冒險事業，和參加革命，以打倒帝國主義及封建軍閥。我曾和

我的同班學生們討論過這事情，但是在所有的這四十八人中，沒有一個人贊成我的主張及願意和我同去。在學校裏的四位教師中，祇有一位並不譏笑我。這位先生問我，我對於此舉之成功有什麼保證，當我回答說我所有者祇是不屈的雄心，可是我知道這事情是決不會失敗的，他便同情地笑笑，不再多說什麼了。我對於我自己，我的才能，以及我的絕不動搖的決心，一向是有十足的信心的。這種信念在十二三年之前就發展起來，從那時候我就毫無畏怯心理了。我一旦信仰着一件事情，或是立下了一個決心，我便絕不動搖地實行到底。

（你知道，我雖則有很好的記憶力，但因為這些事情都是許多年前發生的，我就從來沒想到它們過。有十年之久，我沒功夫想到「我的過去」；不像智識份子和小資產階級的人那樣，把他們自己看得太認真，常愛懷想過去的事情）。

「我現在記得，在我冒險事業第一天，我步行了八十五里路，夜間寄宿在姓蕭的一個地主家裏，這人是我祖父底朋友。他們疑心我是逃脫，就將我扣留起來；但因為正值大雪，沒法差人送信去給我這裏。過了五天，他們終於允許我自由行動了。因為我對他們說，廣州有一位表兄給我找到個職務，所以我要到那裏去，他們居然聽信了我的話。在這五天之中，我被地主底兩個兒子看守着，心裏異常焦急，祇恐我的計劃要全部失敗，連人都急得很瘦

了。

『我被釋放後，就接連步行了五天，一直走到韶關。到這時候，我所借來的七塊錢，一半已經化掉了。到廣州的火車票要六塊錢，我就在韶關街上亂跑，心裏打算不知道要怎樣方能湊齊這筆數目。後來我在街上遇到一個軍官，從他的口音我聽得出，他家裏離我故鄉不遠。我便把我的困難向這位陌生人提出，他就給我飯吃，並且給我一個地方睡。然後帶了我一同到廣州去，在廣州我找到了那常常寄書給我的表兄，此後一切就都好辦了。這位表兄是廣州大學的畢業生。我那要好的哥哥也在那邊，正在完成廣州軍事學校裏他的最後一個學期。』我對於軍事的興趣遠過於政治，一心想進黃埔軍官學校，但是我遲到了兩個月，已經趕不上一九二六年的一期，因此不能夠進黃埔去』。

三 最初的紅軍及紅游擊隊

「國民黨軍隊在一九二七年的「南昌暴動」，是中國革命歷史過程中底一部份，而且是合於邏輯地跟接在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香港大罷工、及武漢政府之後，繼續了這長久的革命鬥爭的。」

「我那一連人是葉挺第二十四師底一部份，和這一師共同參加南昌暴動的，是賀龍部下的兩師，周恩禮（譯音）（現任紅軍第二方面軍參謀主任）部下的兩團——鐵軍底全部——和朱德部下的教導團。」

「南昌暴動失敗以後，我們都跑到廣東省去，進行建立一個新的革命根據地。當這個遠征廣東的計畫也失敗之後，我便流落在廣東，身無分文，而且沒有一個朋友。我從廣州流浪到韶關，及汕頭，過着很困苦的生活。後來我投入蔣委員長底新十三軍，混了一些時候。」

「你問我，我在南昌及廣東失敗之後，是否覺得沮喪；不，我有着鐵樣的戰鬥意志，因

此後來不久，我又在領導着游擊戰爭了。在南昌，我這一連部隊犧牲了幾個人，但是當我們在廣東潭根（譯音）退却時，却死了三十五個人。我們從南昌行進到廣東底潮州，一路戰鬥着。我們在潭根戰敗後，就到海陸豐區域去，部隊也解散了，因此我祇好逃走。在這以後，我之加入國民黨軍隊，祇是爲了解決吃飯問題，因爲那時我窮得不得了。我做一個下級軍官底書記，他不知道我是誰，這時候葉挺已經離開紅軍了。

『在白軍中混了 個月之後，我回到我的故鄉去。我現在是一個軍人了，我的父親就不敢再壓制我。當我在家裏住了兩個星期時，我很高興地聽到一個報告，說是朱德底軍隊已經到湖南來，我知道朱德是南昌暴動中的一個領袖，因此就在陰歷十二月念九日，元旦的前一天，離開了家庭，到從前那個地主底家裏去（這個地主就是曾經扣留我五天的），去探聽關於這支新的紅軍底消息。我不敢直截地打聽，祇是假裝擔心把我的行李丟下在什麼地方，不知道會不會被「匪部」擄掉，問這地主以爲如何。他就斷然地回答說「不會」，於是我知道外傳的消息果然是真的了。

『後來我仍舊回到家裏去。母親看見我久別歸來，覺得新年裏運氣好轉，竟歡喜得哭起來。然而第二天清早我就動身走了，帶了兩個朋友同去，我們去找尋暴動的部隊，在三天之

後到了宜章縣。我雖然沒有在那裏遇到朱德，却看見農民們在鄉村間繼續實行暴動。

『在亦石村(譯音)中，我和一個三百農民的游擊集團發生了關係。他們祇有二十支來復槍，但是我教他們怎樣設立警衛及步哨，並授以軍事訓練，因此我成爲這一游擊隊底指揮者。我們的部隊是小的，可是我們在多次小規模激戰中，結果都能獲勝，我這個支隊在宜章縣便出名起來了。這是個本地的游擊暴動，受本地共黨委員會底指令的，它的最高指揮者是胡嘯海(譯音)，胡氏後來在一九三二年被殺。』

『四月間湖南暴動失敗了。朱德底主力就離開這個區域，因此這些小小的游擊部隊都被切斷了。在我這一隊裏，那時祇有十六七支又舊又老式的來復槍，另外的那些人就祇能用長槍、大刀，以及其他的古老傢伙，來作爲武器了。以後，游擊隊員們爬上了桂東附近的龍石洞(譯音)高山，和毛澤東底部隊結合。那時我便將我的游擊隊員都交給毛，而到井崗山上去。在這離開宜章縣的整個游擊集團裏，一共有四百個人，我自己的那一個支隊則共計一百個人。雖然如此，這仍是一個主要的集團，而且大家都和毛澤東結合在一起。』

『中國的游擊戰術，是從農民反對他們當地敵人的暴動中，所產生出來的。農民們是熱

心而且勇敢的，他們雖不懂戰略，却從經驗中去學習，而創造出有力的游擊戰術來。他們不採用那些古老的書本。因為他們所參預的是一種自然發生的羣衆鬥爭，他們的戰術就沒有什麼特別的規律。中國有許多論軍事學的古書，其中所含的原理，有的是可以運用於游擊戰爭中的，但不能將它們當作確切不移的定律。紅軍現代游擊戰術底組織及綱領，已由朱德和毛澤東在井崗山之後完成。在這之前，我們是沒有組織系統的。不過，自然，像我自己一樣，有許多人都讀過古書，而記住它們。

『關於蔣委員長個人底反游擊戰術，我不甚知道，但是在他那本「剿匪方略」的書裏，他曾引用了好些曾國藩，孫子，以及其他古書裏的話。

『你要求我解釋我在游擊戰略上的成功祕訣，我並未準備來詳盡地回答這個問題，但是我可以隨便地說幾句。我的答語是這樣的：第一，成功是由於如此的事實，即：各游擊集團均從農民暴動所產生，因此戰鬥員底素質都很良好，其紀律自然遠較不革命的人爲佳。第二是，游擊隊員們都非常地勇敢及堅決。譬如，在宜章的某次戰爭中，有一千以上的民團包圍住我們的堡壘之一，而這堡壘便是由我這個游擊集團所守的。我們祇有三十支槍，却在一個清早就直赴敵人底後面，在他們正燒早飯的時候，去突然襲擊他們。在僅僅一次的攻擊中，

我們就擊敗了他們，使他們退後五里，然後我們這一小隊人纔停止追擊。第三是，游擊隊員們能够，而且願意，祕密地迅速地行動，而不給敵人知道。當他們遭受我們閃電般的襲擊時，他們也許以爲我們離開他們還有一百里呢。第四是，游擊戰鬥員底情報工作極好。我們很迅速而且很詳細地，從羣衆那裏得到消息，因爲他們是擁護我們的革命運動的。他們毫不撒謊地把一切事情都告訴我們。中國有句古話說得好，『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第五是，白軍都容易擊敗，因爲他們毫無鬥志。

『在起初，民團和國民黨軍隊，都沒有經驗，因此我們要打敗他們，實在硬當得很。後來，他們乖巧得多了，要擊潰他們就很困難。正規軍喜歡作陣地戰，擊敗他們是都相當地容易的，可是民團也採用和我們相同的游擊戰術，他們就難以消滅了。』

『正規兵比民團情願加入紅軍些，這一半是因爲民團都由地主及其子弟們所統率，對於進行階級鬥爭都很殘忍而且很堅決。他們以爲，他們是爲了自己的家室及財產而與「赤色侵略者」抗戰的』。

四 在井崗山上

「朱，毛，及其他的人都集中在井崗山，並且組織了一個政權，就在這湘贛邊界的洛嘯山（譯音）上。這座山是包括井崗山的。在所有的各政治勢力中，這個政權成爲最強盛最重要的，因爲他們擁有巨大的紅軍武力，以及一個廣大的區域；並且因爲他們第一個實行土地政策。對於中國所有的各革命勢力，這是一個模範。江西及湖南的白軍幾次想撲滅我們，都被我們所擊敗。我們對永新縣執行了四次的攻擊，終於勝利地佔據了這個城。我參加了所有的這些次戰鬥。我在井崗山上被任爲紅軍第四軍底連長。」

「在那一年底秋季及冬季，朱德率領了主力部隊，在江西遂川縣作戰，祇留下四連人在井崗山上，來保衛這地方。我便是在這個後衛軍裏。一天到晚，我們構築着堡壘，並且背運米穀等等到山上去。我自己每天要背三十斤米上山兩次。輸送食糧是一個大問題，同時因爲山裏有很多竹筴，我們就都吃着小竹筴，免得要輸運太多的食糧。在那時候，我是我們這一

團裏的共產黨代表。

『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朱毛和彭德懷在井崗山上開了一個會議，決定留下彭來保衛後方，而其他兩人則出去擴充蘇區。在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我便跟了朱毛離開井崗山，那時我是擔任團長。』

『我們從井崗山開拔，走了二千五百里路，到達江西省內吉安附近的東固，在那裏我們遇見紅軍底第二第四兩團，就休憩了一個星期。我們留下第二團在後面，進發到福建底汀州。一路經過白舍，橫田和廣昌。我們殺死了白軍某旅的旅長，然後佔領了汀州。』

『從一九二九年春初到一九三〇年秋季，我們轉戰於江西福建廣東各地，以組織新的蘇區及擴張紅軍。大部份都是游擊戰爭。在一九三〇年秋季，彭德懷在長沙作戰，佔領了吉安，這樣，他雖則一向是在朱毛指揮之下的，也給他自己建立一個勝利的紀錄了。』

『從一九三〇年年底到一九三一年，蔣委員長對紅區實行了第三次的圍剿。在這個時期裏，我是擔任着師長，並且和軍隊一同作戰。然而，在第三次圍剿中，我却生起病來，可是我仍舊和軍隊一起，騎在馬上積極地指揮着。我是生着厲害的瘧疾，而且睡不着覺。』

五 紅軍第六軍

「在一九三二年的九月裏，我被任爲紅軍第六軍底軍長（這一軍以前爲第八軍，原先是在井崗山的）。在那時候便離開了朱毛，直到兩個星期之前，在延安這裏纔再看見毛澤東！實際上是，我自從一九三一年六月二日和他們分開之後，就沒有看見過朱毛本人，但我們却在同一個區域裏逗留過。直到一九三六年，在西康的蠻子區域裏，我和朱德纔再會面，那已是五年之後了。」

「在一九三三年中，我對五師的湖南省防軍，打了一年的仗，並且也和中央軍底若干部隊打過，我得到許多次的勝利。……」

「一九三四年一月，我由湘贛邊界向北進發，渡過袁水錦水二江，佔領了上枚（譯音）縣城，擊敗了朱耀華——一個國民黨的師長，——及姚琛底一旅，姚也是個師長。然後我渡過修水北淮；從江西的名山廬山到修水，是一天的行程。我越過了湖北邊界，進入湖北底通山

通城二縣，再折而向南。在三月二十二日到達湖南江西的舊蘇區。四十六團人被派來攻擊我們，而我們却祇有六團人，因此我們在交戰了許多次之後祇好退却。

『現在我要告訴你一樁有趣的事情了：』

『在四月間我和白軍交戰，以二團人擊敗了他底八團人，俘虜了一個營長，一個師長，和一個參謀主任。那時候我的弟兄們，因為長征的緣故，都很疲乏而且瘦弱。有一團裏有九架機關槍，可是祇有四十顆槍彈。還有一團有六架機關槍，可是祇有九十發槍彈。但是單單第六軍裏的這幾團，就擊退了八團的白軍。這是因為在那時候，革命精神已經達到最高峯——雖然那是一場很艱苦的戰鬥。當時我是在那裏的唯一指揮者，但是自然，別的將領們對於那一次的勝利，是和我一樣地重要的。』

『從四月裏到六月裏，我們繼續着戰鬥，一共打過三次仗。像上面所說的那樣的大勝利是沒有了，但這三次仗到底也還是勝仗。』

『到了一九三四年八月七日，朱毛給我一個命令，叫我去和賀龍會合，由湘贛邊境出發，渡過湘江及廣西底一部份。我們便又經過湖南底西南部，到達貴州底東部。在沿河縣底一』

個小村莊裏。名叫南姚集的，我會見了賀龍。這是大約在一九三四年底十月廿二日。自從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動之後，這還是我第一次看見賀龍，雖然賀龍在那時候並不知道我。我們在這個貴州的小鄉村裏，一同住了一年，而在距今兩年之前，我們在湖南和兩個姊妹結了婚。

會同賀龍及他的第二方面軍，我率領了我的第六軍，進攻湘西永綏。我們的部隊一同擊敗了十團的白軍，然後佔領了大庸、桑植、桃源，及慈利，就建立起「湘鄂川貴蘇區」來。在這個蘇區裏，我們約有人民一百萬。我們這個蘇維埃底其他領袖是任弼時關向應和王震。

「於是九十團人派了來攻擊我們，由何成濬指揮。我們打了半年的仗，在一九三五年八月底，擊敗了這征討。這是紅軍在一九三五年裏最重要的戰鬥，因為那時朱毛正在長征中。可是，在所有這些時候裏，由於無線電底聯絡，我們是一直和他們保持接觸的。」

「在那時候我們殺了八十五師底師長，以及團長營長等共約十人；而且我們俘住了一個國民黨師長，名叫陳景漢（譯音）的。這人直到最近還在紅軍大學裏教書。他是方纔在前天（五月十日）被釋放的；因為他要回到白區去，所以我們就讓他去了。陳在兩天之前請我們吃飯，我們在第二天夜裏也請他吃飯。如今因為抗日統一戰線已經成立，我們對於國民黨是不念舊惡及報復的了。」

『一九三五年九月裏，我們在東面向國民黨軍隊大舉反攻，佔領了澧州，臨澧，石門，及辰谿，並且擴充了我們的部隊，增加新兵八千人。』

『於是我們自己也開始作「長征」了。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我們從桑植縣出發，接連戰鬥了四天，衝破湖南省防軍底兩道封鎖線，打開一條出路來。我們渡過了兩條江，澧水及沅水，並且在這一步步艱苦地打開出路來的四天中，走了三百五十里的驚人路程。我們佔領了新化，溆浦，辰谿，浦石及藍田，這些地方都是富庶肥沃的縣份；可是不幸得很，我們沿路並沒有功夫將那些地主們底家產充公！』

『於是我們向貴州省城貴陽前進，在離那地方不到三十里之處經過，佔領了黔西底大定及畢節二縣。這次費去我們三星期的功夫，擊敗了許多白軍，其中包括整個的兩師。我們退經四川南部，到達雲南的東部，經過雲南府時祇離開三十里，同在貴陽的情形一樣。我們是動身去和四川徐向前底第四方面紅軍會合。』

『我們前進到雲南底西部，佔領了那裏的許多縣份，如馬龍，尋甸，富民，鹽興，曲靖，姚安，牟定，祥雲，賓川，黎江等，此外還有好些地方，我一時記不起來了。』

『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我們渡過了金沙江，即揚子江底上游，在六月二十三日』

到達西康（西藏），成功地會合了朱德，以及徐向前和張國燾底第四方面紅軍。

「從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我們離開湖南的時候，到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三日，這八個月的時間中，我們在長征裏一共走了一萬里路。這幾個月中，在我們的後方追擊，在我們的正面及側面攻擊的白軍，總數共計一百三十團（十三萬人），我們的軍隊却一共祇有兩萬人。但是他們沒法封鎖我們。我們到處都擊敗了他們，而使他們落在後頭。

「爲什麼我們會勝利？」（蕭克猛拍着檯子，用力地喊道）。「這是——」

「因爲中國共產黨底正確的政治路線！」

「因爲紅軍底勇敢！」

「因爲部隊中弟兄們與長官們底合作！」

「因爲我們是被羣衆所擁護的！」

「我們在西康停留了兩個星期。在七月十四日，法蘭西大革命紀念日，我們在朱德指揮之下，向北進發，準備與日人作戰。有四十天及四十夜，我們在「大草原」中走着。八月裏我

們到達了甘肅底哈達舖和岷州。我們在甘肅南部停留了兩個月，然後在彭德懷指揮之下，再向北前進，和關麟徵及胡宗南所率的主力軍作戰。在桑城舖我們得到了一次大勝仗，就停止了白軍。後來，西安事變在十二月十二日發生了，內戰就此完結。

「因為共產黨底和平政策，我們在西安講和了！現在便有了一個和平統一的中國，成爲準備對日抗戰的第一步。這便保證中國是不會滅亡的。我們有五千年的歷史。我們有一個優秀的種族。我們決不能在日本底東縛之下。我們必須擴大我們光榮的歷史，發揚我們的文化，作爲國共兩黨合作的結果。因此我大聲喊道：

『中華民族萬歲！』

『中國自由萬歲！』

第六章 賀龍——中國的紅色羅賓漢

一 包圍在傳說中的英雄

在所有的中國紅色領袖中，賀龍是最有魔力，同時也是最難捉摸的。或者，也許是距離的緣故使這景象更增加一種魔力吧：因為他率領了那些湖南籍的游擊隊，無論在這兒那兒以及各處，都像是一陣旋風似地，一路走一路就添上了許多傳說。每個在蘇區裏的人，都有不同的故事來講到他，可是沒有一則故事是十分符合的。但是對於有一點，大家底意見都相同，——就是，賀龍具有他們任何人中最驚奇的個人生活。他甚至有一位富有魅力的妹妹，賀英（這是朱德底老婆康克清底偶像），曾經做過軍長，在一九三三年的戰役中戰死。我早就想寫一部長篇傳記，專述最有興味的紅軍領袖之一，而大家關於此事的推薦，都集中在賀龍身上。我在內地之困居兩個月，賀龍是要簡接負責的，因為當我動身回來的時候，我爲了急於要得到這位大名鼎鼎的英雄底傳記，竟致錯過了最後的一部卡車，後來大水季節一到，道路就不能通行了。可是話雖如此，我還是沒有遇見他，因此我可以說的只是，我有一次幾乎

在姚縣附近看見他，祇可惜相差不到四個鐘頭。

不像大多數的紅軍領袖都特意要抹殺自己，賀龍是不反對刻劃出一個豪邁的英勇人物來的。他通常被認為紅軍中最俊美的將領，穿着一套合身的軍裝，帶着一種洋洋的卓越氣概，常常是騎着一匹壯猛的駿馬，像古代傳統中的英雄似地，率領了他部下衆弟兄，殺奔敵陣而去。他並且是快樂的，諷皮的，喜歡在夜間營中火堆旁，圍坐着講故事。在紅軍將領中，祇有他還未革除那一點點的虛榮品——髭鬚；而且，他愛慕美麗的婦人以及美麗的馬。他和蕭克是被認為，有着全蘇區中唯一美貌驚人的老婆的——而她們倆却是姊妹。在蘇維埃底（*蘇維埃*）（傳說）中，賀龍之生活和個性，早已成爲一種浪漫的 *Yehnohri*（主題），而使人想到古英格蘭時，在「綠林」中的羅賓漢及其「快樂弟兄」們。甚至那背景都是相同的，——因爲賀龍部下弟兄們就是從那末馴服之湖南省底綠林深山中奮起的，在那兒的山巒谿谷之間，迄今還有他的族人們潛伏着。

湖南在中國諸省中，是以士兵素質底優良及一種不可征服的戰鬥精神而著稱的唯一省份，爲了某種原因，紅軍領袖們多數來自這一省，而在所有他們這些人之中，賀龍似乎是一個典型的「善戰的湖南人」。他是個天然的領袖，具有一種吸引人的品格，似乎能使所有跟隨他

的人，祇要和他有過一點連帶關係，就會覺得驕傲而且高興。正如朱德是具體表現了中國內地腹部所固有的那種平靜而原始的力量和善良，賀龍也似乎是具體表現了，革命的中國農民階級底熱情和精神。而且他有着坦白勇敢的湖南人之可愛處。

賀龍有悠久的革命紀錄，而且他的故事特別有興趣，因為這故事是講到全中國最富於戰鬥性的農民運動——在湖南底西部——的。這運動是一九一六年，鄧夢輝（譯音）反對袁世凱時，在他領導之下所開始；到了國民黨時期，作為一種土地革命而再度爆發；最後纔成為最重要的蘇區之一底根據地。自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中，賀龍本在最優良的國民黨軍隊裏，擔任着一支軍隊的司令，即張發奎所屬「鐵軍」部隊中的第二十軍。賀龍後來就率領了這部隊，去參加一九二七年共產黨的「南昌暴動」，和葉挺及朱德底部隊一同，雖則他那時候自己並非共產黨。結果這第二十軍是被消滅了，賀龍就回到湘西去，組織了一個完全新的運動，由「十支槍」起頭，不久便成為「湘鄂蘇維埃」。他是紅軍三大主力軍之一，即第二方面紅軍底總指揮；因為它那些驚人的勝利，和「湖南人底戰鬥精神」，賀龍底聲名便到處皆知了。

我雖沒有見過這位紅色羅賓漢的本人，可是我幸而能夠遇見他的政治委員，關向應。關氏是自從一九三二年以後，就和賀龍在一起的；他答應將他頭腦底正確故事，告訴給我聽。

關向應所說的故事雖毫無浪漫的穿插，並且省略了所有的細節，可是比那些花飾多一點的敘述，大概總要正確些吧。關委員他自己就是個有趣的人物。是矮小，黧黑，而且極端地嚴肅的，一邊說話時一邊吸着一根大雪茄烟。他是個東北人；在上海無產階級暴動的時期中，他曾做過領導者。當一九三〇年時，他是上海總工會底領袖，那時正當他投身於紅軍之前。但這一點點便是，我從他口裏所能探誘出來的消息了。他在延安祇逗留了幾天，而且很匆忙地要回到第二方面紅軍去工作，因此不肯多費工夫來談到他自身的事情，

二 典型的湘西人

以下就是關向應所說的，關於賀龍的簡略「短篇小說」：

「賀龍生於湖南桑植縣。他現在四十歲。他的父親是個裁縫，家裏很窮，湘西是中國反叛的中心，賀龍就從他父親那裏遺傳了湘西人底特性；而這些特性就是：不害怕，才智靈敏，以及有自信力。父親很愛他這兒子，並且對於他將來的政治事業，有很大的影響。賀龍底父親從來沒有進過學堂，但是由於自己的用功，曾經得到一點的教育；所以當他兒子開始為國民黨幹着政治工作時，他並不反對。這是個小小的家庭，家裏的人，除了賀龍之外，現在都已死了。他的兩個姊妹和父親，都是在革命中被殺的。」

「當賀龍到了十九歲時，一九一六年湘西發生了一個農民暴動；因為賀龍是同盟會底會員，他便做了這暴動底領袖，同盟會在湘西一帶是很有勢力的。那時候袁世凱正想做皇帝，湖南境內有許多北方來的軍隊，殘暴地壓迫人民，而這就是暴動底原因，暴動將這些北方來

的兵，大約消滅了一師人。當這個反袁運動尚未擴展到湖南時，雲南的蔡鍔就是這運動底首領。

「以後農民們不再有什麼活動了，賀龍覺得社會與政治的前途很黑暗，就開始度着一種流浪的生活。在這以前，他本是個耕種着自己田地的農民，但是還沒有結婚。在長沙時，他計劃暗殺譚延闓，湖南的統治者，可是事情失敗而且被捕了。過了不久他被釋出獄，正如他對我所說的：「這件事情使我得到一種教訓。它告訴我，暗殺是無用的，而且要在中國完成什麼工作，非有武力不行，我那時候便感覺到，我必須動手來創立一個革命的軍隊。」

「賀龍於是回到他的農村裏去，召集了幾個朋友，開始從湘西暴動的參加者中，組織起這支軍隊來。他那時是這一營的營長，從縣長那裏奪取了這一縣底武力。人家常說賀龍在那時候是個土匪，這是不確的；他在他生平的任何時期中，從來沒有做過強盜。他從十九歲的時候起，就是孫中山底革命團體「同盟會」(註)裏的領袖之一。他們每到可能時就沒法去奪取武力，這原是他們的計劃之一，例如賀龍之奪取縣長底兵力便是。」

「賀龍底軍隊是從寥寥數人開始的，但是後來逐漸擴充了，直至他做到旅長。他曾兩次

(註)湖南的「同盟會」就是那個很老的秘密黨會「哥老會」，孫中山底同盟會是以哥老會為基礎的。

率領了這一旅人到四川去打仗。當時他那一旅人就是用的目前國民黨青天白日旗；他的政治顧問是石青陽，一個著名的同盟會會員，後來在南京做了大官的。賀龍底上司那時是熊克武，是四川邊防軍中的一個國民黨將領。賀龍則被任爲當地的衛戍司令。

「當一九二五——二七年之際，大革命在中國底社會及政治情勢中，引起了巨大變動，這個革命潮流就使賀龍受到很大的影響。他離開四川，回到湖南澧州去。廣州的國民政府便派了一個宣傳隊往澧州，去游說他的軍隊。這一隊的隊員都是共產黨。隊長是周逸羣，一個黃埔畢業生，一九三一年在湖北洪湖被殺死的。」

「賀龍這時早已對共產黨有了信仰，而且極其信任周逸羣，因此他不但歡迎這個宣傳隊，還從別的地方去招了好些學生。來對他的軍隊從事政治訓練工作，並且按照新的革命路線，將這支軍隊從新改編過。賀龍和他那約摸一萬人的整個一旅軍隊，就很受到這些宣傳大革命的共產黨員們底影響。」

「當國民革命軍佔領了武漢時，賀龍也到了那裏，而他的那支軍隊——直到那時候還是獨立的，但是和廣東方面有密切關係——便正式改組爲國家軍隊中之一師。」

「在一九二七年，賀龍底部隊奉命開往湖南，去和張作霖底奉軍作戰，對於擊敗奉軍頗

有功勞。可是後來國民黨和共產黨底分裂發生了。當時賀龍是張發奎部「鐵軍」底第二十軍軍長。他並不是個共產黨黨員，但他的政治見解是和他們一致的。他告訴我，他以前曾請求入黨而被拒絕。他不知道他為什麼被拒絕，除非是因為黨那時候要想很小心，密願他做一個左傾的國民黨黨員，而不願他加入到黨內來。他是直到「南昌暴動」之後，纔加入黨的。

『賀龍離開湖南到漢口去，然後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參加了「南昌暴動」，這暴動是由共產黨領導的，而由葉挺、朱德、周恩來、和張國燾指揮的。在這個暴動中，賀龍率領着他的第二十軍。事後所有這些叛變的軍隊，都開往廣東，到那裏去建立一個革命根據地。他們在廣東被擊敗後，賀龍就獨自到上海去。他在上海任了一些時候，然後奉了黨底命令，回到他湖南的故鄉』。

三 湘鄂蘇維埃

「賀龍在湖南湖北邊界的洪湖，由這兩省底農民中，開始組織起一支新的軍隊來。他的第二十軍已經在廣東被消滅了，但是有幾個軍官逃出性命，到湖南來和他聚合。當大革命時期中，湖南湖北這個區域裏的農民們，曾經有過很艱苦的奮鬥，而土地革命也早已開始。這些農民都是「土庫饑荒」的，並且因為他們以前的鬥爭經驗及高昂的情緒，他們都高興地參加了這新的革命。而且，共黨在這些縣份裏的組織又都很堅強。於是由於這種種的因素，紅軍就很快地擴展起來了。」

「起初，在這個「湘鄂蘇區」裏，一共有兩種運動。賀龍是領導了紅軍第六軍，活動於洪湖區域一帶，包括監利，沔陽，江陵，潛江，石首，華容，公安，及石門等縣。另一個運動則在鶴峯，五峯，及松滋等縣，其領導者為周逸羣。指揮着紅軍第二軍。後來這兩軍在洪湖聯合起來。」

「這裏的紅軍機構是在一九二八年開始的，一年之後共有士兵二萬人。在起頭的時候，賀龍底那支軍隊祇有十根槍和十個夥伴。可是，這十個人很快地就擴充成一百人。大家都是農民游擊隊員，在他們之中起初是沒有國民黨部隊的，因此他們不得不從白軍那裏，去設法俘獲一切的武器及軍火。當賀龍和周逸羣聯合了他們的部隊之後，全軍就開往湖北底黃縣。去建立一個新的蘇區，同時也保留住那幾個較老的湖南蘇區。這支聯合的軍隊就稱為「第二方面紅軍」，而賀龍被任為總指揮。共黨派了一個重要的黨員去做政治委員，指揮那兒的黨務。這人就是鄧忠夏（譯音），是一個學生，後來在一九三三年被南京處決的。在那時候，整個區域的黨領導者為夏曦，是一個學生，而且是毛澤東底同學。後來在長征中死於貴州附近的。」

「同時，一個新的紅軍第六軍，約有一萬人的，已經在洪湖創立起來了，另外那一軍便從黃縣回往洪湖，去和這一軍會合。」

「當一九三一年及一九三二年時，洪湖區域發生了水災，許多房屋都被沖毀，農民們就不得不離開那裏。這對於游擊運動是很困難的。於是所有的部隊都從新改組過，成為紅軍第三軍，這一軍那時大約有兩萬人。」

「從開頭的時候起，這個區域裏的紅軍就每天打着劇烈的仗，擊敗了三次對它的圍剿。賀龍同國民黨底將領劉湘徐源泉，以及陝西軍等，都打過仗。」

「在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當第四次封鎖開始時，蘇區底物質情況很不好。然而，就是在此次的戰鬥中，我們也擊潰了白軍底一團人，而且還有一師的川軍也完全被我們擊滅。當白軍打了時，大多數的士兵都加入了紅軍。同時，游擊隊員們也和軍團打得很凶。」

「我（關向應自稱）是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加入賀龍軍中，做他的政治委員。」

「到了一九三二年七月，賀龍軍由洪湖區域撤退，開往湖南，陝南，四川，然後回到湖南。這是賀龍第一次的「長征」。這次長征底實行是因為全軍當大水之後，無法在湖南得到給養，就不得不尋覓新的地方來就食。至於回轉來的目的是否會合蕭克，當我們回到湖南時，在和以前同樣的那些地方，從新建立了蘇區，可是另外還加上巴東及宣恩兩縣。這就是一「湘鄂邊區蘇維埃」區域。」

「一九三四年，賀龍底紅軍第三軍，與蕭克底紅軍第六軍會合了，會合的地點是在湘贛蘇區；並且開始擴展了好些新的蘇區，如桑植，永順，大庸，龍山，慈利等縣。」

「我們佔領了湖南底桃源縣。然後佔領了常德、澧州、石門、臨澧等縣。這一次的戰鬥是很艱苦的。我們的政治部主任本來是夏曦。但這時候已改爲任弼時了。」

「此後我們開始了我們的長征，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裏。我們走過了湖南貴州雲南等省，而到達西康。我們在一九三六年十月裏，在甘肅與其他的各部紅軍會合。」

「當我們在十一月裏，和胡宗南軍在甘肅戰鬥過之後，西安事變發生了，內戰就此終止。這一次的戰事是發生在山城堡的，彭德懷、聶榮臻和陳賡所率的第一方面紅軍，以十三連人（約一千人）埋伏攻擊而打敗了胡宗南底約有萬五千人的著名某師。」

「第二方面紅軍現在是包含三個軍，——紅軍第二、第六、及第三十二軍——而且是在富平休息着。」

「賀龍底兩個姊妹都是著名的革命者。他的妹妹在民衆運動中很活躍，是農民協會的一個領袖。她在一九二八年被捕處死。他的姊姊賀英，我是相識的，是一位將領，親自率領軍隊作戰。她在一九三三年，在湖北和封打仗時，中彈陣亡。賀龍底頭一個老婆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至今還關在那兒的監牢裏。後來他另行結婚了。」

「你問我對於賀龍個性的印象，我可以說：他是非常坦白、大胆、和勇敢的，並且具有

一種特殊的士兵風格。他決斷敏速而精明，並有巨大的自信力。他是一個天然的領袖，而且我以為他可以算是，一個軍事的天才，有着很豐富的經驗。當他打仗時，他定下極仔細的計劃，而且所有的決斷都很準確。在戰鬥中他是冷靜的，善於打算的，並且從來不發脾氣。也對於所有的弟兄們，都顧念週到，但是遇到他們有錯誤時，却加以嚴格的訓練。他的政治理解是良好的，而且對於共黨忠實服從，常常小心地遵行黨底路線。

「就個人而論，賀龍是和善，天真，而且差不多孩子似地坦白的。他身體很康健強壯，愛騎美麗的駿馬。他吸香烟——但是毫無別的惡習慣。」

第七章 羅炳輝——人騎兵的首領

一 馮玉祥般的「將軍」

羅炳輝活像一位「中國將軍」。是最好的馮玉祥派頭。難怪他在十八歲的時候就被稱為雲南府底「模範軍人」了。他是我所見過的最魁梧的中國人。身材高大，有着巨無霸般的腰圍。但是身上每一塊都是鐵樣的筋肉。他的舉止自然是要像一個勝利的搏角者，剛撻下關敗的人在蓆上呻吟時的那種神氣了。

當馮玉祥轉變為基督教徒時，他以救火用的皮帶將他的部隊一古腦兒都受了洗禮。當羅炳輝轉變為共產黨時，他將吉安所有的反赤民團都帶了走，——祇除了十個人。然而地主們所統的民團，却向來是赤黨們仇恨最深的敵人哩。在共黨底歷史中，這樣的事蹟，是祇有陝北的劉志丹可以比擬的。

在和這位快活的老羅談話時，我所感到的愉快，簡直是像他的身體一般地鉅大。他那滾圓的臉兒使我們想到彌勒佛，——或是，再明確點說，使我想到北平紫金城裏那座從印度支那來的玉佛，這座玉佛有着同樣地富於魔力的印度支那眼睛，不是弧形的而是頂上平的。並

且事實上是，羅炳輝生於雲南，雲南正是和印度支那接壤的。再則，雲南是中國風景最美的一省，有許多林木蔭深的高山；羅炳輝在西北的荒涼不毛之地逗留了一些時之後，對於他故鄉的山林是不禁有點懷想的了。當他談到雲南底花草和晶瑩的河流時，他頗有嚮往之色，便像馮玉祥在那首咏東北的心愛詩裏的作風一樣，對我說道『還我山河』。

羅炳輝樂於當兵，樂於談到他打仗的情形，談到他自己，以及談到任何提起的事情。在他那三十八年的歲月中，度過了終身的生活，並在全國各處都打過仗。他是個真正的中國人，這樣的人在中國歷史底任何時期中，都會為中國人民所永念不忘的。是中國人對於民衆英雄所最愛的，那種關帝型的人物，『一個堂堂好漢，聰明男子』。老是以智取勝敵人，他所講的那些誘弄敵軍的故事，簡直好像是從三國志裏抄出來；這些故事總有一天也會成為英雄的民間傳說的（當他來看我時，他手臂下甚至挾着一部詩集——這正是中國人最贊成的風度）。

像朱德和賀龍一樣——還有老馮，學習着簡樸的服裝和簡樸的生活的——羅炳輝是中國某種隱伏着的健全民主傳統之產物，並且是以生而為平民自得的。他蔑視奢華及金錢，樂度艱辛危險的生活，並且樂與他的弟兄們，吃喝一樣的東西，赤着腳一同走路。他度着這樣的生活而身體却這末壯健，即此一端，就可以使他自然而然的做他們的領袖了。

這座「人山」所打過的仗，比別的任何將領都要多些，據他說：「因為我的工作就是要出去尋覓，轉移敵軍對於我們的主力部隊之注意。當這三年的戰爭中，敵軍常是比我的部隊大十倍至二十倍——我的部隊總祇有一個小小的機動單位」。羅炳輝在前線總是對的，我相信他一定樂於做地面上最大的目標。當我問他受傷過幾次時，他祇好停頓一下，想了些時候。

「讓我看」，他皺起了他那平滑和善的眉毛。「我以前從沒有停下來數過我的傷。我想我一共受過六次輕傷一次重傷吧。可是我的衣服打穿過好幾次，因為我常常離開敵軍陣線祇有二十米突的。有一次我剛從一個戰壕裏走開，一顆炸彈就掉下在我纔離開的那地點。還有一次，當我躲在一個岩壁底隙縫中時，一個飛機炸彈恰巧掉下在這隙縫裏，却並沒有炸開來。有許多次，我的身上蓋滿了炸彈所炸起的垃圾和泥土，但是從沒有被它們炸傷過」。

「白軍對於紅軍最大的威脅是什麼呢？」我問。

「白軍沒有一樣東西對我們發生大的威脅」，他回答說。「飛機轟炸對於部隊底心理是有壞影響的，但我們祇是很迅速地衝過去和他們激戰，因此他們就不敢轟炸他們自己的軍隊了。譬如在甘肅南部底漳縣，還是去年的事情，飛機轟炸起來，白軍却退却了。紅軍就追擊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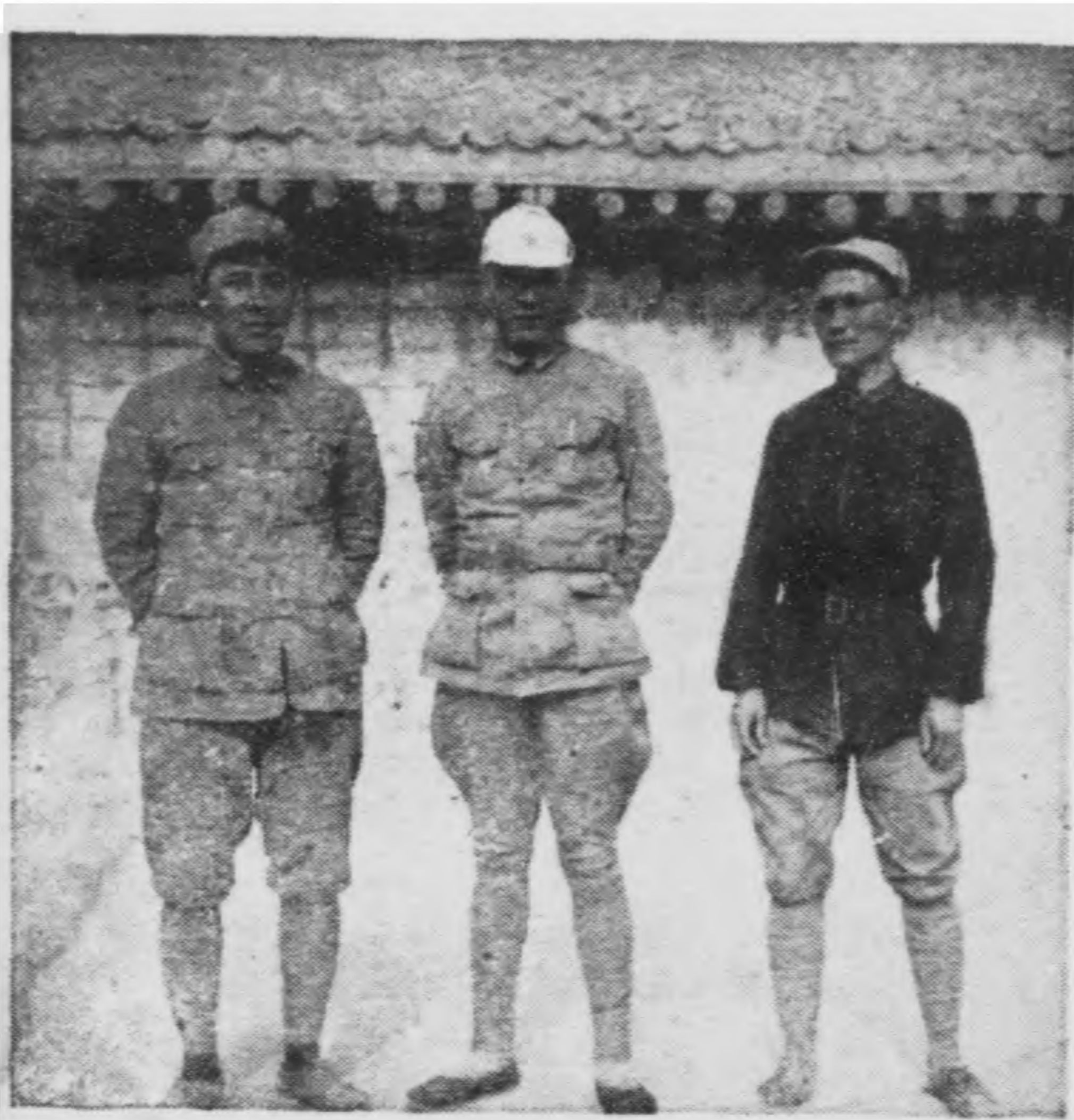
們，飛機反而炸了他們自己的部隊」。

和羅炳輝談話是很有趣的，因為紅軍對於他還是新鮮的，而且他並不官僚政治似地把一切看作當然，却是對於這種現象仍有極大的興趣，並且由於以前的經驗，他的觀察是高瞻遠矚的。我幾乎沒法阻止他在家具上到處都畫着地圖，有一天他幾乎對我講完了一課機動戰術，在我還來不及止住他之前。當他講話的時候，他通常總是用他的手指追趕着敵軍，然後縱身一大跳。跳到桌子底對面那一邊，用手指又將他們追了回來。最後總用力在桌子上一拍，砰然一聲巨響，一面用手抹抹額角，於是便打了勝仗了。他說起話來滔滔不絕，充滿着詳細項目，並且很容易興奮起來，那時他使用一種孩童似的真摯神氣看着我，一面用他那粗糙的喉嚨說着。假如我問他一個政治問題時，他總是嘻嘻一笑地答道，「我的頭腦是有點笨的。我不知道」。當我遇見他時，他正在延安「軍政大學」裏上課唸書。

「你在國民黨軍隊裏和紅軍裏，都有過很多的經驗，你總該知道的」，我問羅，「爲什麼紅軍底力量會優越些呢？」

「第一，我想這是因爲，紅軍是在共產黨底嚴密領導之下；第二，士兵們都有階級意識；第三，政治工作及教育都良好；第四，共黨幹部份子都是值得仿效的模範士兵，而且在紅

羅炳輝



邊章武(左)聶鶴亭(中)何長工(右)



• 影合領將軍面方二第

軍中有完全的民主——長官們底生活是十足和弟兄們一樣的；而第五，我們的戰術是從錯綜的情勢和艱苦的需要中創造出來的，因此我們的戰術是較好的」。

『你是我見到過的人裏，神情最快活的人。你難道從來不厭倦麼？』我問他。

『在紅軍裏，個個人都總是快樂而充滿了精神和毅力的』，他恰當地回答說。『這是因為我們具有堅決的目標，並且大家都知道最後勝利必屬於我們。我們是衣衫襤褸的，有時候我們所吃的東西，竟粗糲得連豬馬都不會要吃的——而且我們也許祇有一雙草鞋——但是一年又一年，我們從沒有沮喪過』。

羅炳輝喜歡小孩子，在他給我的那張照片裏，他像是一座孤島，四周都是「小鬼」們圍着。其中有一個好看的男孩是一個苗子。他的這「小鬼」都穿着好的皮鞋，可是羅却驕傲地穿着一雙其大無比的草鞋。

『這些小鬼現在都在什麼地方？』我問，看着那張照片。

『我帶了五個到延安來』，他答道；一面指指一個袖珍型的人物說：『那個便是我的衛兵，唐子培（譯音）——一個很聰明的江西孩子，年紀祇有十八歲，他已經跟了我五年了。在長征中我有兩三百個「小鬼」跟着我，我所有的戰役他們都經歷過。連在烏江打仗時，有許多小

鬼都跟我在一起哩。他們大多數能跟得上軍隊，但是有的却落在後面而迷失了。他們是從來不逃離軍隊的。有好些都參加作戰，而且他們全都又勇敢又堅決。我曾經有過一個營長，以前本是小鬼，他在十八歲時就給打死了——他是個很勇敢的孩子」。

「我自己有三個孩子在江西」，羅接下去說，憶念地。「但是我不知道他們現在怎樣了。」

——此外還有一個孩子在雲南。……」

羅炳輝對於婦女是具有舊世界底全副禮貌的。（我始終沒法探聽出來，他究竟有過多少老婆——他在十二歲的時候就是個自立的已婚的家主了）。他總是騎士風地謙恭地鞠躬。而且他在分別的時候，帶了一樣極雅緻的禮物送給我。這東西是一塊圓的瑪瑙，可以佩在身邊作為幸運的玉器的。這塊玉器底中間有一根白線，恰恰將它劃為兩半，好像土星底環似地。一藍的頂就是天，黑的底就是地，白的環就是人。他解釋道：「我是從一個西藏喇嘛那裏得到這東西的。他因為感激我對於那裏塘喇嘛寺的保護，就送了這東西給我。這是在拉薩正式受過佛佑的，那喇嘛告訴我，說它是很古老很古老的了。每逢那些蠻子（西藏人）看見這東西時，他們都甘心拿他們所有的塵世財物，來換取這樣一個神奇的佛玉——總之，他們的喜歡珠寶，更勝過喜歡金子。事實上是，我簡直可以這東西來買盡那個區域裏所有的牛油。」

那喇嘛告訴我，說是假如你身上佩着這東西，你就永不會從馬上摔下來的。無論如何，我的身體是太大了，隨便什麼馬也摔我不下來的，——因此我要你受了這東西，算是紅軍送給你的一件友誼紀念品」。

「其他的白軍將領投入紅軍的，多不多？」我問。因為羅炳輝本是國民黨軍隊中，朱培德部下最好的將領之一，當他領導了「吉安暴動」而在一九二九年投入紅軍之前。

「多的，尤其是有許多下級的將領，都脫離了他們的軍隊而帶了鎗過來。「寧都暴動」是最巨大的一次。那一次是由董振堂和趙博生領導的，他們在暴動以後，帶了二萬人和一萬支槍過來。另外還有一個是陳子華，如今是徐海東底政治委員。他本是鄂豫皖區域裏的一個分隊長，他領導他的一個暴動，和別的幾個分隊，來投入了紅軍。但是在一九三二年以後，差不多沒有什麼軍官背離國民黨了。因為他們受到新的法西影響而都反對我們了。」

「國民黨總是想使紅軍底將領們背離，但是這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當我在一九二九年實行暴動以後，白軍肯給五萬塊錢和一個旅長的職位，假使我肯回到白軍那裏去的話。我問我的弟兄們，他們願不願收下這筆錢來，大家回轉去——可是自然，他們都拒絕了。我在一

摩爾會見他們的代表，就正式拒絕了他。於是我在國民黨裏的許多的朋友，就想來勸我回到國民黨去，他們對我提出了種種的引誘。我對他們說：「我們是爲了中國底農民和工人們而戰的，我們深信必能得到最後的勝利。我們不久就要做主人翁了，而地主和紳董們却不會的。你們是沒有東西能給我的」。

『我的朋友們便說：「你們的原則都是對的，但是現在並非實行它們的時候。在中國實行共產主義還太早哩」。

「那麼」，我回答說，「無論如何，我們現在是可以利用我們的時間來爲這主義而戰的」。

『於是他們辯道：「假使你現在回到國民黨來，你就可以穩穩的得到金錢和高位了」。

「等到我死了之後，金錢是沒有用處的，祇好做一口金棺材，可是我却不巴望睜金棺材。並且，假如一個兵士是在爲農民及工人們而戰鬥的話，他便是置身於最高的可能位置了，因爲他是在製造着歷史。你們祇是在自趨埋沒而已」。

『這樣總算解決了這個問題；但是到了一九三三年，我在國民黨裏的有幾個朋友，又寫信來給我了，說是假如我肯回到他們去的話，他們可以給我十萬元，並任我做師長。——但是我把原先說過的話，重複對他們說了一遍』。

羅炳輝在這好幾年來，是紅軍中最出名的十大將領之一。（但我問他，他以爲最能幹的紅軍將領是誰時，他回答說是「彭德懷和黃公略」，黃公略是在一九三二年死於江西東固的）。他和他的「人騎兵」，已經成爲一切紅軍部隊中，最著名的部隊之一了。這麼一位碩大無朋的將領，怎樣能始終率領得住，一支行動飄忽而且專門機動的縱隊，真是一件神祕的事。但是顯然他那一雙腿是像他的性格一樣地靈活的。我化了幾天的功夫，纔弄清楚他是屬於那一方面的主力軍，因爲他似乎到處都打過仗，所以大家都想把他當作是自己部隊裏的。結果是，他和每一方面的紅軍都有過關係。他曾隨第一方面軍一同出發，由江西開始作長征，當時他所指揮的是危險的掩護部隊。當他們到達四川時，他加入了第四方面紅軍，擔任掩護部隊，而在西藏和朱德及徐向前度過冬季。以後呢，他和賀龍第二方面紅軍，旅行通過大草原。在我會見他時，他是指揮着第三十二紅軍。

以下就是羅炳輝底個人歷史，完全照他在延安對我所說的：

二 雲南府的模範軍人

「我的家是在雲南彝良縣，我在一八九九年生於那裏。我父親是屬於中農階級的，但是後來變窮了，這是因為經濟情況惡劣的緣故。我家裏有我雙親，兩位弟兄，一個老婆和一個孩子。」

「我年紀很小的時候，就在農莊裏幫着做工。在我們那粗暴的地主之下，我的生活是艱難而且痛苦的，因此我在十二歲時就逃出了家庭去從軍。我一連步行了兩天，然後折入大路旁邊，躲藏在一家農家裏休息。我家裏派了幾個人來找尋我回去。這一批人搜尋了五天，仍舊找不着我，以為是沒有希望的了，不料我却在他們回轉來時，在路上碰見了他們。我便不得不跟着他們回去，從此以後我家庭裏對於我的感情就很壞了。最後，他們分了家，並且給了我一個老婆，使得我能够和他們分開住。這時候我便成爲一個獨立的家主。雖然我的年齡祇有十二歲，但是我已經成長了。我的父母以為我早就急於想逃脫家庭，有了老婆之後也許

能束縛住我。我是不喜歡這個婚姻的。可是不知道要怎樣逃避纔好。家裏的人對於這個新佈置是都喜歡的，因為我會屢次使他們困窘，和地主反抗並且侮辱他咒罵他。我雖則是長子，我却是個「不肖」的兒子，而我的兄弟，相反地，却是個「孝順」兒子。他是一個反對我的，地主底同盟者，而且我厭惡他那種叩頭服從的態度，彷彿他是個軟虫似地。在雲南底那一帶地方，我們對於土地是不用畝來計算的，祇是照收穫底數量來算。我應得的一部份收穫是七千斤，因為那時收成很好，這個數目對於我和我老婆是足夠的了。

『我和家庭以及地主的關係，從來沒有好過，因此我總是急於想離開家鄉。到了十六歲時，我就又逃走了，往雲南府去從軍。在那時候，軍隊在雲南社會裏的地位很高，是代替着舊式科舉出身的官吏的。當那舊式的科舉制度被廢除以後，一個新的軍事考試制度成立了。這個制度非常嚴格，需要完善的健康及目力等等。但是，我個人要加入軍隊的理由，却大半是爲了我要獲得對地主們施行報復的自由。我這一念頭是從兩個兵那裏得來的，因為他們回到我這縣裏來時，曾經拖住一個地主痛打一頓，結果却毫末受罰。』

『當我逃走了三年之後，我聽說我們家裏所有的財產都已經被那地主「充公」了，因爲他說他們「偷」他的東西。從此以後，我就沒有再聽到我家裏任何人底消息了。最近我會寫過一

封信去打聽他們的消息，但是還沒有接到回音。羅炳輝不是我的真名，祇是我在離開廣東參加北伐時，所取的一個「戰鬪用的別號」。

「我投入了雲南鎮守使署底砲隊（我們祇有六尊砲），鎮守使是唐繼堯。這是在一九一五年。

「我從來沒有進過學校。當我投入砲隊之後，我學習了一點，而以後就是在紅軍裏受教育的。雖然當時交通阻梗，我那一縣裏的人又都是不問世事，可是辛亥革命發生了之後，我就知道了這事情，並且知道有剛成立的現代新軍，而我那時的野心便是要在這新的革命軍裏當一名小兵。

「當了兩年普通兵之後，我升做中士，後來被派管理本連底糧務。我是從行伍裏被擢升出來的，這是因為我對於學科研究得很好並且很熱心。在軍營中我的綽號是「模範軍人」。我們每天都有關於軍事訓練的演講。在所有的考試中，我都考得很好，而且沒有什麼個人底惡習慣，因此上級長官對我的印象很好。過了些時，我就成爲唐繼堯參謀部裏的一個參謀，在一九二〇年，當他被別的軍閥打敗之後，跟了他一同到香港去。我在香港唐宅住了八個月。

唐繼堯是一個年老的封建軍閥，一點也不革命的。他認爲我誠實可靠，非常信任我，因此叫我做他的採辦代表。許多的錢都經過我手裏，我要「揩油」是大可以揩的，但是不知道怎樣，我並不看重金錢。我的正式薪水是每月四十塊錢，我以爲這筆數目已經足夠了。我和唐繼堯在一起的生活是奢侈的，但是我不喜歡這種生活。從心理上說是，我以前所過的安逸生活反而使我叛變起來，我倒是樂於度着艱苦的軍人生涯的。

『唐繼堯做過四五省底督軍，他至少有一千萬至二千萬的家私。他的主要存款戶頭是開在雲南和上海的中法銀行裏的，而當這公司破產了時，唐繼堯竟暈過去了！這一個破產使他損失了一千萬元。後來他一部份的錢，又在一家日本銀行裏損失掉。』

『我因爲既不喜歡香港底那種生活，又不喜歡香港底社會，就離開了唐繼堯回到雲南府去。香港已經使我得到深刻的印象——我看出了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意義是什麼，同時也明白了中國統治階級底腐化已經到什麼程度，因爲我目睹那些軍閥們跑到各商埠去享樂，把他們從勞苦老百姓那裏榨取來的錢，幾百萬幾千萬地亂化着。在雲南我看見了法帝國主義底實施，而當我經過法屬安南前赴香港時，我對於它的意義就了解得更其清楚了。』

『當我到了雲南時，因爲和唐繼堯的關係，我便立刻被捕了，但是過了兩星期之後，有

兩個軍官設法使我被釋出來。我看見那些古老的封建勢力仍舊控制着雲南，因此就到貴州去住了些時。後來我聽說孫中山底那班人在廣西，便到廣西去，加入了朱培德底軍隊，當一個參謀。」。

三 在北伐中

『孫中山所著的書我一本也沒有讀過，但是我一九二〇年在香港時，已經聽到了關於他的一切事情，而對於他那摧毀反動軍閥及反抗帝國主義的見解，尤其感到深刻的印象。我一聽到關於他的消息時，就想到廣州去參加他那團體，可是我沒法和其中的任何人發生關係。』

『那時候孫中山底團體正在廣西計劃着北伐。朱培德底軍隊在一九二二年進攻廣東，加以佔領，並繼續進攻江西。當我們到了萬安縣時（萬安縣是朱德夫人底家鄉），我們知道孫中山在廣州的將領陳炯明反叛了，孫中山被他所圍困。朱培德不得不回師去救廣州的孫先生，他就派我到另外一支軍隊裏去，就是李福林和許崇智所率的廣東省防軍，藉以統制這些部隊，因為朱培德疑心他們和陳炯明底叛變有相當勾結。我被委為朱培德底情報員，視察他們的工作情形。』

『這些廣東軍都打敗了，退往福建去。我們那時候沒有電報也沒有無線電，我便連日連

夜地走了一百九十里路，將這吃敗仗的消息報告了朱培德，纔使他幸免被敵軍所圍。當我報告過之後，朱培德即下令退却，因為一翼已暴露，敵軍早已在攻擊他的後面了。我們從湖南退到廣西。在路上我生病了，朱培德把他自己的馬給我騎，並且總是請我和他一同吃茶點吃飯。朱氏對我頗為敬重，當我病體復原以後，便委任我為連長。和當時別的將領們比較起來，朱培德是個好的將領。他相信中庸之道，不願意和任何人發生惡劣關係，因此總是想法不要得罪人。但他却不是一個好的革命家。

『由廣西我們又對廣東的陳逆炯明進行討伐，終於佔領了廣東。朱培德底部隊成為孫中山底特別衛隊。朱氏那時候祇有實力薄弱的一旅兵，約二千人，他那另外的兩旅兵都叛變了，我被派為廣州兵工廠警衛隊底隊長，以我那一連人作為根基。我另外編了兩連人，來保護兵工廠。不久，北方的軍閥方本仁，是吳佩孚部下的將領之一，來攻打廣州了；因為我們在廣州的兵力薄弱，我被任為代理營長，率領了我這守兵工廠的幾連兵，上敵人進攻的前線去打仗。在這一仗裏我受傷了，但是沒有上後方去養息。過了一會兒，敵軍扯起白旗來，要我們投降。我便命令我的部隊停止戰鬥，帶了一個人，一同到敵營裏，去磋商他們投降的事。當我在敵營裏時，他們忽然接到一個命令，叫他們不要投降，祇要回後退却，他們就帶了

我走，作爲質物，後來將我關入江西贛州底監獄裏，關了九個月，這是在一九二三年。

「起先敵軍底營長要槍斃我，但是別的人反對，因此決定暫時將我監禁起來。我身上已經受了兩處傷，一處在頸上，一處在手上，傷勢都不好，因此我即使要想到逃走也是很困難的。當我在監獄裏關了大約九個月之後，我們的廣東軍隊中，叛變後投往北方的，有一部份駐在贛州。長官是廣東人，姓楊，他認識我，聽說我關在那邊的監獄裏，就設法放了我出來，因爲他敬佩我作戰時的特殊勇敢。」

「在北伐時，我們常常以爲我們有過好些大戰，但是當時的這些戰事和國民黨與紅軍之間的戰鬥比較起來，簡直是算不得什麼的。它們都是軍閥底戰爭，兵士們並不知道他們是爲了什麼在作戰。但是話雖如此，我那一連一百二十人中，除了二十個人以外，也都打死了。可是這祇能算是一個非常的現象，因爲我是以親率全連進攻出名的。我和我部下的弟兄們，向來具有密切的友好關係，並且總是小心地使大家都了解我的意見，同時賞罰嚴明；因此我能在我的部隊裏始終保持良好的秩序和紀律。」

「在北伐中的那些日子裏，北方士兵中的譁變是很多的，但南方軍隊中却沒有。這一半

是由於地方主義以及士兵與長官之間的敵對心理。在贛州，北方的士兵譁變起來了，反對他們南方籍的長官，殺了許多廣東籍的師長，可是仍舊有第二次的暴動在那裏發生，參加者有一千人。這種譁變底主要理由是，士兵們懷恨那些南方的長官，大多是雲南人或廣東人，因為他們都腐化而且「揩油」，將士兵們糧食和衣着的錢都括削了去。經過了幾次戰鬥之後，這些譁變就瓦解了。

「我改名換姓，化裝爲一個農民，從贛州逃了出來。我到廣州的那一天，身無分文，連傍晚時吃飯的錢都沒有。我出去找我的老帥朱培德，但是那天下午沒法找到他。次日早晨，我碰見幾個廣東籍的軍官，以前我曾經給過他們一點好處的，就請求他們帶我去見朱培德。他們却拒絕了，因為看見我衣服破舊，就瞧我不起——他們倒都穿得活像上流紳士了。最後，還是一個警察告訴我，朱培德住在什麼地方。我便尋到這屋子那裏，但是被攔住不准進去。哨兵想當面將門關上，因此我威嚴地對他說道：

「我有特別的信息帶給朱將軍。他派我到江西去幹一件要緊事情的，假使我現在不能夠立刻看見他，我一定要將這情形寫信報告他。要是有什麼延誤，你就得負擔責任」。

「那哨兵聽見這話，就決定帶我到會客室去，給我一張紙，讓我好寫信。正在這時候，

一輛汽車開到門口，載來黔軍底司令，是應約來見朱培德的。哨兵想將我趕出院子，但是當朱培德下來歡迎那貴州的司令時，他看見了我，不禁大為驚異並且對我很親熱。「我們大家都以為你死了哩！」他叫道，不用說，從此以後那個哨兵對於我是非常客氣的了。

「朱培德會完了客之後，他就和我談話，叫我去找一家旅館，並且將地址告訴他。我便說這是辦不到的，因為我沒有行李；而且沒有行李和錢是不能在旅館裏住下的。朱培德便給了我一百塊錢，叫我到一家旅館去。我在這個旅館裏住了幾天之後，有一夜忽然聽見街上有打仗的聲音。我不知道這事情底原因是什麼，祇聽說是蔣介石在驅逐許崇智，許是當地的一個軍閥。我怕走出到街上去，因為我是個陌生人。戰鬥一開始之後，那些廣東人就彼此說道：「我們為什麼要受這些外路人底控制呢？」因此是大家都對於外來人抱敵視態度的。第二天早晨，我就到朱培德底司令部去住了，因為我住在旅館裏是不安全的。調查得很嚴厲，而我却沒有一個保人。

「當我正在和朱培德談天時，忽然得到一個報告，說是廖仲愷被刺了。（這是在一九二五年）朱培德派我做他司令部裏的參謀。

「於是廣東與四川熊克武之間，戰事爆發了。在這次戰事裏打過仗之後，我回到廣州去

，而這時候北伐開始了，我被派爲營長，參加北伐戰爭。

「在從廣東到湖南的北伐中，我打着仗，並且由那裏到江西南昌，經過許多劇烈的戰役。我一共受傷過兩次，當我們到達南昌時，我這一營四百人中，祇剩下八十個人了。」

「我們離開南昌去攻打南京。在南京的一個會議中，我的部隊被派開回江西，作爲朱培德軍底一部份。當時正是武漢和南京分裂的時候。」

「當「南昌暴動」發生時，我們是駐紮在南昌的，那時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我的部隊被葉挺賀龍及朱德繳了械——那時朱培德底軍隊全部都給繳了械。在暴動之後，我遇見了朱德，他請我加入共產黨，但是我拒絕了，因爲我那時候對於政治情勢是不清楚的。」

「我在暴動之前就與朱德認識了，當時他是朱培德部下的南昌公安局長，我們曾經一同吃過幾頓飯。朱德從前是在雲南府當旅長，我那時就認得他，但是他認不得我。他那時候在雲南軍隊裏，因爲勇敢和善於指揮軍隊，就已經很有名氣了，雖然他原籍是四川。朱德底戰術早已著名，在四川討伐袁世凱部隊之役，朱德那一旅的精銳軍隊，非常善於打仗，就出名起來了。後來朱德任雲南憲兵司令，但是因爲當時的督軍不喜歡他，他祇得離開了雲南，到上海去，並由上海往德國，在那裏他成爲共產主義者。在「南昌暴動」的時候，我個人並沒有

什麼共產黨的朋友，但我聽人說起過那些「赤化」的領袖，如周恩來毛澤東賀龍陳獨秀等。我認得郭沫若，曾經在兩次紀念會中遇見過他。

「我在南昌逗留了一些時，等到朱培德來了之後，他便派我做他那殘餘部隊的營長，命令我到福州去「剿匪」。我在福州和紅軍作戰；打了一個勝仗，後來就開拔到江西去，轉戰於吉安永新寧崗泰和一帶。這時候我便是和朱德本人交戰的。」

「我在這些地方都頗受民衆擁護，因為我雖然是對共產黨作戰，我却反對地主們，並且按照原來的國民黨綱領，而對他們加以懲罰。我同時對於部隊，執行嚴格的紀律，因此有一次當兩個別的部隊裏的軍官，到我這區域裏來姦淫搶劫時，我就將他們槍斃掉。這兩入底營長派人來討他們回去，但是他們已經死了。爲了這一件事情，許多高級軍官就聯名上一個呈文給朱培德，要求他懲辦我。後來他們便設法算計我了。有一天，我因爲有一個約會，到江邊一隻小輪船上，去訪一個朋友。我脚剛踏上船面時，那隻船却開動了。我知道事情不妙。果然我被帶往南昌去，那些軍官又呈請朱培德懲辦我。同時我寫了一些聲明書，到我駐紮過的各縣去分發，把這事情告訴當地的民衆。我的部隊早已改編過而分散了，因此留下在當地的祇有民衆們，但是那潯縣底縣長都上呈文來營救我。」

「當我在南昌時，我以前那幾縣裏的許多學生和市民，都送錢來供應我，但是我全拒絕了。在那時候，連有幾個老反動派都來看望我，並且對那些軍隊底行動大為不滿，居然說：革命的時期還比這要好些，中國仍然需要另一個革命。」

「到了南昌，我就去見朱培德。我告訴他，「我並不要向你要求什麼，無論是錢或是工作，我祇因為大家是老朋友，前來問候問候你。我想回到我的故鄉去了」。

「朱培德就對我說：「你並沒有做錯過事情，但是反對你的人太多了。無論怎樣，我總要替你設法的」。

「我在江西住了些時之後，朱培德就給了我一封介紹信，於是我先到上海去，後來再到廣州，在廣州見過了陳銘樞。我和陳銘樞同住了一些時候，直到他在香港那旅館裏，遇着失火跳樓受傷後，我便回到上海及江西去」。

四 在江西剿共

「這時候反革命的種種反動情形，我已經明白了。我回到高安，在家裏住了一些時，和當地的紳董又發生了麻煩。高安縣底縣長，是以前北伐中曾在我手下，做過國民黨的政治主任的。我便友好地去訪問他，不料他看見我那時候既沒有軍隊又沒有錢，就公然蔑視我起來。我離開他屋子時，覺得非常憤怒。」

「後來我想在那裏做琉璃生意，但是本地紳董中有一个人對於琉璃生意是有專賣權的，就來恐嚇我。這事情使得我很氣，我就痛痛快快地打了他一頓。我並沒有什麼錢，可是十年來曾積蓄了大約二千塊錢。這筆錢我早已投資於高安，因此當紳董們逼迫我離開那地方時，一切都犧牲掉了。他們搗毀了我的辦事處，並且恐嚇着要弄死我，所以我祇得回到南昌去。從此以後我就恨透了紳董們，願我有武力在手，能將他們摧毀個乾淨。」

「同時，我從前的軍官們及士兵們，有許多人都來找我，請求我幫助。因此有二三十人

和我一同住着。我們對於國民黨中的變動都很憤慨，因為它不但反對腐化的紳董階級，却反而和他們聯合起來。我和高安紳董階級之發生衝突，這也是原因底一部份。

「當我回到江西之後，我遇見了幾個當軍官的老朋友，如王鈞等，但是我不願意加入軍隊，因為我的老朋友中，有許多人都升任了高級職位，我如果再進軍隊，就要做他們的下屬，這是失面子的。可是，不久，當局召開了一次會議，要組織一個保安隊，我便被任為江西吉安底保安隊司令，去和紅軍打仗。」

「我一到吉安之後，就着手改編那裏的警備部隊。這個警衛隊，即保安隊，是和民團同樣的，本來有一千個人。我就將人數裁減為五百名，因為一個大的部隊祇是浪費金錢而已。紳董們是非常反對的，因為我將他們那階級底代表，大半都踢了出去。他們對我說：「在你統率的時候，這種改編也許是對的，但是如果來了個新的長官不濟事時，那就怎麼辦呢？」在事實上，中國這些民團底編成，是以對於某一紳董階級忠順為基礎的，這樣纔能維持紀律於不墮。」

「這時候，共產黨底區域很接近吉安，我的兵士中就每天有幾個人逃到他們那裏去。我

知道本地的窮人是贊助共產黨的，我不久就明瞭，共黨在牆壁上所寫的標語，是不能用磚火來洗去的。我看出紳董階級底重稅和高壓，迫使人民加入共產黨去，我這時對於民衆與紳董間互相敵視的原因，就看得更明白了。

「當我和紅軍打仗，我俘獲了許多士兵。這些紅軍士兵對我說：『在現制度之下，我們無論怎樣，都是已經判了死刑的。我們沒法活下去。就是爲了要解決生活的問題，我們纔加入紅軍的。』

「我對於他們所說的話是表同情，因爲我知道他們的話都是實在的。農民們除了加入紅軍一同戰鬥之外，是沒法生活的。因爲我和這些紅軍同情的緣故，我便將歷來各次所俘的紅軍，釋放了幾百人。紳董們對於這件事情都憤怒起來，他們之中就有好幾羣的人跟隨着我的部隊，來調查我的行動。每逢我俘獲了幾個「赤匪」時，他們立刻發表了這件新聞，想逼我將這些被捕者判決死刑，但是我不去理睬他們。」

「當紳董們向我抗議時，我說道：『在吉安縣裏，一共有三十萬的農民，你們紳董却祇有兩萬人，你們說除了你們之外，全都是匪徒。要是我將這三十萬人全都殺乾淨時，就沒有來替你們做工了，你們怎樣能夠過生活呢？這些共黨都是農民，不過想解決他們的生活問

題罷了」。

「而當他們談到「民衆」反對共黨時，我就問道：「假使民衆們都受到共黨的威脅，那末爲什麼他們都要加入共黨呢？當然沒有一個人會和他的敵人聯合的。假使你們紳董先生們能够解決了農民們底生活問題，沒有一個人會加入共產黨的」。

「我在南昌遇到過一個北京師範大學的學生，他寫信到吉安來給我，並且解釋中國社會底性質，說是半封建的。他舉出曾國藩來爲例，曾氏是在清朝編練民團而摧殘了民衆運動的。這個學生底名字叫趙醒吾（譯音），他寫過幾封信給我。我猜疑着，不知他預備對我怎樣。後來他親自來看我了。當他到吉安時，起先我不願意見他，但是最後終於見了他。我們談到國際形勢，談到江西的軍閥鬥爭，然後談到當時的反動情形。趙逐漸地談到共產黨和國民黨彼此的兵力，說到國民黨是較爲強大些。我說道：「自然哪，國民黨是強大些，它控制着更多的區域，財政，以及龐大的軍隊，而共產黨却是沒有當政的」。

「但趙說道：「不，這是不確的，因爲中國民衆底大多數是貧苦的，而不是有錢的。……」

「……」

「到了我們談話的第三天下午，趙對我說：『我到這兒來是冒了性命底危險的。假使你願意的話，你從我身上可以弄到許多的錢』。」

「我從來不出賣朋友的。否則我老早就發財了」，我回答說。「我猜你是個共產黨吧，是不是」？

「趙底面色發青了，說道：『是的，這是性命交關的問題，你打算對我怎樣呢』？」

「當然哪，我要盡我的責任，殺了你」，我說，和他開玩笑。於是我們討論着共黨理論及一般的政策。

「趙便告訴我說，共產黨早已調查過我以往的歷史，江西省的委員會便命令他來看看我，以便建立個人的關係。」

「我以為共產黨恨我比恨別的人更厲害呢，因為我和他們打仗打了那麼長久，而且從他們那裏得到過許多次的勝仗」。我說。

「但是趙回答說，共黨很知道我的歷史，而且很欽佩我的勇敢忠實和直爽；他並且告訴我，他們另外還有一個黨員。不久就要來訪問我。」

「趙又逗留了幾天，後來江西共黨委員會底一個委員來看我，我們便繼續討論下去。他

詢問我對於國民黨，共產黨，以及帝國主義者的意見。以後黨裏就發給我一批問題，要我回答。我是由趙，劉，及蔡三希（譯音）（蔡後來任紅軍第四軍軍長）介紹入黨的。這三個人後來都死了。姓趙的學生是在「吉安暴動」之後不久，被捕槍決；蔡是在河南安徽區域作戰陣亡；至於劉是怎樣被殺的，我不甚清楚。

「我至今還保存着趙底一張照片。他才學非常好，人又高大又好看，當他被殺時，還祇有二十八歲」。

五 吉安暴動——一九二九年

「我開始在吉安做起共黨工作來，利用着我保安隊司令的職位。同志們叫我保持「灰色」的色彩，要乖巧些，不要說話太老實，而顯出我是「赤」化。因為吉安是在我指揮之下，黨底組織就迅速地發展起來，但是黨裏的工作者却變得疏忽了，把文件放在桌子下面，床鋪下面，天花板上，到處都放着。我在一九二九年七月裏就正式成爲黨員。」

「一天下午，駐紮吉安的國民黨正規軍旅長，和縣長共同召開了一個會議。這會議是很秘密的，所有的門都上了鎖。我是出席者之一。在會議中這旅長說，「共產黨在吉安很活躍，我們必須要肅清他們」。他於是宣布一個計劃，準備搜查城裏的每一間房間，連保安隊隊部都在內。我們大家都宣誓決不洩漏剛纔所說過的話。」

「會議在八點鐘開完了，兩團（大約二三千人）兵已經調派出去，在搜查中看守每一所屋子。我非常地擔心，而且直到十點鐘纔找着黨裏的書記。「肅清」的工作是在午夜十二點鐘就

要開始的，所以那同志就趕快跑出去，防備有人去搜查。

「在會議席上，那旅長曾經說過，『我們寧願逮捕十個無辜的人，不願放一個共產黨逃脫』。那天夜裏就有一千個人被捕，關在本地的廟裏拘留着。後來命令發下了，說是那些有紳董擔保不會是共產黨員的人，可以放出去。」

「一個同志到我這裏來，對我說道：『我們的同志祇有兩個人被捕，但是他們都知道你的，假使他們供認出來時，事情就很危險了』。我便設法放出了他們。」

「在那一千個被捕者中，祇有一百人得到擔保，因此其餘的人都監禁了長久的時期。在我暴動以後，有許多人一定都被殺了。我不知道他們的遭遇怎樣。除了紳董們底擔保，其他的擔保都是不中用的，而紳董們底擔保自然非窮人們所輕易弄得到。」

「大約在這時候，附近有好幾縣底民團，包括吉安，吉水，泰和，永新，及安福等，都運動着要組織一個聯合的警備部隊，並且要我做司令，因為我是個著名的戰士。我派我舊日的部屬，以及幾個共產黨的同志，到這些縣份去，在民團裏工作，以取得他們的信任。」

「有一次，當我派了三營的兵力去打紅軍時，有幾個熟悉本縣地形的紳董，領導着軍隊。內中有幾個紳董將部隊領得離開了我所指定的路線，使他們自己能够靠了軍隊底保護而回。」

到他們的家裏，因為那地方是紅軍底游擊區域，他們單身是不敢回家的。我發覺了這件事情，覺得正是消滅這些反動派的好機會，因此我就將這幾個紳董槍斃，說他們「私通匪徒」。另外的那些紳董們就都吵起來，說我是在「剿紳，不是剿匪」了。於是本地的地主們上呈文給那旅長，攻擊我，說我和共黨有關係。我就到旅長那裏去，對他說道：「一個忠實地爲國民黨打了十年仗的人，怎麼會和赤匪有關係呢？這些上呈文給你的人顯然是想攆走了我。好讓他們敢派共產黨員，到城裏去暴動。否則他們何必要趕走民國底司令呢？你不要上他們撒謊的當！」這一個控訴嚇住了那些紳董，他們便立刻停止麻煩我了。

『本地的民衆們，因為我過去的軍事紀錄，對我是有信仰的。可是關於我和共黨有關係的謠言，在紳董們中間却傳揚開來了，因為這時候有一個黨底組織已被破獲，關於我的活動的某種消息，同時被揭發了。有些紳董並不相信這個關於我的謠言，祇是請我對於我的下級軍官們，特別加以注意。』

『那時候，要將所有的重要紳董都集中在一個大集會裏，一舉而加以剷除，並將所有的其他部隊都繳了械，同時集中附近的紅軍部隊，而並不費事地佔領了吉安。本來是可能的。這是我的計劃，但是黨對此不贊同，說它是一個「軍事陰謀」，因此我便放棄這計劃了。』

「後來……我和共產黨的關係，被我老婆發覺了。可是，我和她打了一場架之後，就送她回娘家去，並沒有發生什麼困難。但是第二次，黨底一個本地機關也被破獲，我和黨的關係愈加顯明起來。所以我必須斷然行動了。」

「我便率領我的民團到城外一個名叫「集下」（譯音）的地方，在那裏安頓下來，因為我恐怕他們會對我突然攻擊，而將我圍困在城裏。那個旅長和那批紳董就寫信給我，說是：「你必須進城來。我們擔保給你許多新機關槍，增加你的薪俸，並且給你編一營新兵」等等。但是我知道這些話全是騙我的，因為我接到的信不祇一封，却有不同的好幾封，都是不必要地緊急的。」

「這時我控制着大路和郵局及信件等。我便命令檢查一切的郵件，對於私行夾帶一律以軍法懲辦。有一天夜裏我們查出一封信，是一個地主寫給我的一個下級軍官的，說是我早已有了共產思想，假如事屬必要的話，軍官們應該利用任何的機會，設法來「收拾」我——就是逮捕並解除我的武裝。」

「因此我定下了一個計策。大多數的士兵和長官都是受我個人底影響的。就在那一天夜裏，地主寫信給他的那個軍官，在我還沒有抓住他之前，却忽然失蹤了，因此我估量，不到

三小時，國民黨的軍隊就要來繳我這部隊的械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便下令徒手集中。因為我那幾連人裏頭，有一連靠不住，是受紳董影響的。在這個集會中，我告訴我的弟兄們說：

「我們和紅軍打仗，打過好許多時候了。我們過着苦惱的生活，又沒有餉拿，現在本地的紳董還要說我們是共產黨！爲了要洗清這個嫌疑，同時去索討我們的欠餉，我要帶你們回吉安去」。

果然不出我所料，兵士們都自相辯論起來，許多人都說他們寧可加入紅軍，不情願回進城去。我們就將這問題付表決，凡是願意加入到紅軍裏去的，都分開來站着，並給以槍械，而那些不願意加入到紅軍裏去的，則不發槍械給他們。在那一次的大會中，四百個人都加入了紅色暴動中，祇有十個人寧願仍在國民黨方面！（後來大約有二十個人帶了他們的槍械逃走了。總共祇有三十人左右，重行回入國民黨方面。然而從此以後，在其餘那些原來參加暴動的人裏，就沒有一個人逃跑的了）。

我們就離開駐紮的地方，開拔出去，準備和紅軍會合。不久，在我這民團裏發生了新的煽動，有幾個人動搖起來了。可是，他們先派了間諜回去，得知國民黨軍隊早已開到我們紮營的地方，來繳我們的械了。於是其他的人說道：「我們不敢加入到共產黨那裏去，因爲

我們和紅軍打得太久了，他們一定要報仇而殺死我們的。」我便對他們說，我和紅軍打仗的時候，比任何別的人都要長久得多，可是我知道共產黨員們都是誠懇的，他們並不恨白軍個人，祇是恨那些紳董；而且我聲明，我是完全信任他們的。我們便派了一個人送信去給紅軍。

「這地方完全是白區，並且離開紅軍很遠的，但是我率領弟兄們到一個地點去，在那地點黨是有堅強的祕密組織的。當我們到達時，我們就集合在一起，黨代表和我都發表演說。

「弟兄們都扯下了他們所佩的徽章符號，說道：『滾它媽的蛋吧！我們以後要佩帶紅星了！』個個人都興高采烈，十分熱心。

「三天以後，我們開回到集下原駐紮處去。高高地揭起了紅旗！

「吉安大為混亂，城門緊閉，人人都疑心別人陰謀暴動。他們說：『假使連保安隊司令都是共產黨！另外一定不知還有多少人呢？』這區域底民團便都從新改編過，直接置於紳董們的控制之下。軍隊是早已逃進城牆裏頭去了。

「我們在黨代表底指導之下，召集了一個大會，有三千農民來參加。黨代表演說了一遍，接着是我演說。我對民衆們說：『三天之前我是剿共保安隊底司令，現在我帶了紅旗回來

了。我誠心誠意地懺悔，不該在過去受人利用，來和你們窮苦老百姓打仗。我現在很高興地宣佈，我已經加入到你們這邊來，要爲了你們去打仗了」。

「那些聽我演說的農民都極爲快活，大呼道：『現在你是紅軍了！現在你是我們自己的部隊了！讓我們忘掉過去的事情吧！』當我聽見這些話時，我不禁哭起來，連話也說不出了。我覺得爲了這些老百姓們，真該終身盡瘁，方足以補償我過去的罪惡。」

「後來，有兩三百個別的民團和正規軍士兵，都加入到我這裏。民團都是由地主所僱用的可憐傭兵，但紅軍通常是不受民團的，因爲他們在爲地主們服役時，已經失去他們的階級意識了，而且他們中間是沒有多少人願意加入紅軍的。假使你做了一個民團時，就有許多人要對你的行動負責任。不但你自己的家屬和親戚，還有其他的三家人家，都要爲你擔保，而且地主們對於調查他們的民團，通常都有一種完密的制度的。」

「我在吉安暴動時的那些民團，如今還活着的不過幾個人了。後來有二十多人在紅軍裏做了團長或營長，而且都在最劇烈的戰事中，在前線打仗打得極勇敢。」

「此後我們打了一些時的游擊，我的部隊不久就擴充到一千多人。我們那時候和正規紅

軍並沒有關係，因為他們都在很遠的地方；但我們已揭着紅星和斧頭鐮刀的紅旗。有幾個民團動搖了一些時候，而且有一個謠言傳開來，說是我們中間有反革命份子，並說我從紅軍和莫斯科那裏拿到錢！我便叫弟兄們來搜查我的房間，最後他們都相信了：我確是一個銅板也沒有，窮得和他們一樣，因此他們的信念纔沒有動搖。

「在附近本有兩營兵，但是他們因為害怕我們，絕不敢走近我們這區域。那時候我們沒收並逮捕地主們，但是殺掉的並不多，而且這些殺掉的人都全是由本地的民衆，在羣衆大會中正式投票要求的。」

「經過幾個月的獨立游擊戰鬪之後，到了一九三〇年一月，彭德懷和黃公略來會合我們了。一個月後，朱德底部隊也來到吉安底泰和區域，來聯合各部隊。我的部隊那時便擴充到二千人。當我們這三支軍隊聯合之後，我們有過一個會議，決定去攻擊集下的警備旅——我的暴動從前就是在集下起事的。在這一仗中，我們擊潰了兩團，但是一團却逃走了，於是我們到江西底西南部和福建汀州去。」

「我們在汀州官了新的黨誓，然後出發往南昌。這個黨誓是李立三所定的，說的是：『爲與全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合作起見，我們必須爭取湖南民衆底擁護，佔領長沙南昌，然後

進取武漢，最後並沿長江而直抵上海！」

「我對於當時的政治情勢是不很清楚的，可是我看得出，李立三是太樂觀了。李立三說：「無論怎樣，白軍不久就要崩潰的。假如我們戰鬥得厲害，這崩潰就會實現得更早，因此趕快工作吧」。

「在南昌之戰中，我被任爲紅軍第十二軍軍長。這一戰役是沒有成功的，因此我們就離開了南昌，到長沙去，擊潰了一師的湖南白軍。我們想在八月一日占領長沙，來紀念「南昌暴動」。我是和彭德懷、朱德及毛澤東（他那時是政治委員）在一起的。當我們進攻長沙時，我們頭一次經驗到飛機底轟炸。一隊六架的飛機來了，起先紅軍士兵們都不知道飛機是什麼，當他們看見有東西擲下在空中時，都很感興趣地看着。我們的防空那時候的確是很馬虎的！所有的士兵都可以天真他出去看熱鬧。幸而這些飛機都飛得很高，因此所予的損害甚小。

「五隻砲艦向城裏的我們開砲，我們却也有一尊砲，就發砲還擊。我們那時候以爲這些砲艦全是英國的，因爲我們早就預料英國人要開砲了，但是也許其中有幾隻是美國的，我却不清楚。總之那時候在長沙一共有十隻砲艦。

「離開長沙之後，我們在朱毛指揮之下，佔領了吉安，雖然這城是防守得很堅強的。我

的那些舊民團們，對於克復他們的故鄉根據地，都極爲出力。吉安是江西省底經濟中心。它的主要商市大街有二十里路長，而且那裏有許多的富商和資本家。因此一九三〇年九月之佔領吉安，是震驚了全省的，而民衆運動也迅速地發達起來了。紅軍增加了二萬至三萬的新部隊。

六 五次圍剿

「於是南京驚慌起來，派了許多軍隊來攻打紅軍，這就是『第一次圍剿』。我們在十二月三十日俘獲了張輝瓚及其全師的人。張是江西剿匪軍底總指揮！當我們和張作戰時，我是在左翼方面。戰事異常劇烈，而且右翼底一部份動搖了，因此我挺進到白軍後方而擊敗了他們。因為是在他們的後方，我便能為我自己的部隊奪獲了一千支步鎗。我們同時也從張那裏，第一次奪獲了一些無線電機和電話機，就開始訓練一些人來使用他們。在對譚道源作戰時，我是指揮的前鋒，而彭德懷是在我後面。譚是個師長，他有六團人的兩旅兵。我們擊潰了兩團，俘獲了一團。單單我自己的部隊就從譚那裏奪獲了一千支步鎗。這便是『第一次圍剿』底結局！

「這一次的勝利使得整個紅軍都高興異常。士兵們底決心和戰鬥力昇高了許多。從那時起一直到一九三四年，個個人都以為紅軍是決不會被人擊敗的，而部隊中的高昂精神也從

來沒有減低過。我們是一天甚於一天地，爲我們的勝利所沉醉了，而我更是全體中最快活的人。大家都樂於和白軍打仗。我從來沒有計算過，我在這些年頭裏，一共打過多少次的仗。但有時候是一天要打三次的。我想大規模的戰鬥，我至少打過二百次吧。……

『在一九三一年的「二次圍剿」中，我和許多國民黨底將領如上官雲相孫連仲劉和鼎傅作義等，都打過仗。他們的陣線約有八百里長，從江西底吉安一直到福建底建寧。我們運動於敵軍後方，以兩星期的疾行軍遍經這全部陣線，而加以突破。紅軍在席闊的前線推進，一步不停地掃蕩過整個區域。我這部份奪獲了大約一萬支的步槍，以及無線電機，自動步槍，機關槍，軍火，和許多上好的制服等。……』

『在「三次圍剿」中，各蘇區底重要城市都被白軍所佔領了，而且我們不能够在蘇區中運動自如，因此我被派東趨，以轉換白軍底注意，並引誘他們來追蹤我，使得我們的主力部隊可以離開蘇區而向西去攻擊白軍底後方。在夜裏我便率領我的部隊向東前進，由幾個縱隊拿着許多火把，來欺騙白軍，使他們當我們是一支大軍。四師的國民黨軍隊跟着我，包括陳誠和衛立煌底部隊。我於是包圍並佔領了一個名叫「六安」的村莊，他們則到達在附近的「南園」地方。我就被四師兵圍着，包圍圈周圍祇有十里路，但是因爲山嶺和森林的緣故，他們不能

够確切地知道我的軍隊究竟在什麼地點，因為我們是一點也不作聲的。自然，我是處於完全被殲滅的最大危機中，因為我執行這個戰略運動時，祇帶了二千個弟兄，其餘那些人都和主力紅軍在一起。他們是國民黨軍隊中第一流的幾師兵，每師各有九團，約一萬五千人，因此他們底實力是在四萬人以上！

「同時，照着所定的計劃，主力紅軍已經離開蘇區，前進到相反方向底白軍後方去，而在那裏獲得了一次巨大的勝利。」

「然後在有一天夜裏，我的部隊由白軍陣線中溜了出去，襲擊他們的後方，打敗了一師人，奪獲了幾百支槍械，事後就迅速地開回到蘇區去，會着了大勝而還的主力部隊。白軍在第三次圍剿失敗後，早已開始由蘇區各處撤退了。在這次的整個戰略運動中，我祇損失了三百人！」

「一九三三年春季，「四次圍剿」開始了。我是在我們的右翼方面。紅軍擊潰了兩師白軍，俘獲其中的一個師長，擊斃了另一個。我們所得到的一切配備，都是嶄新現代化的，是爲了圍剿而剛從德國買來。然而有些自動步槍，却不是德國貨而是美國貨。」

「在第四次圍剿中，另外還有幾師是被擊敗或一部份被消滅的。這幾次的仗裏我都打過，因為我當時是在主陣線上。到了這一次圍剿結束時，我們已經奪獲幾萬支槍，而且紅軍破天荒第一次，開始用起機關槍和自動步槍來。」

「在四次圍剿中，白軍的飛機比以前厲害得多了，因為他們常常有外國的機師。林彪俘獲過一個德國顧問。是在一九三四年從一個碉堡裏捉住的。我不知道這人後來怎樣了。」

「我的部隊綽號叫『兩腳騎兵隊』，因為我們擅長迅疾祕密的步兵運動。當我們的主力部隊處於困境時，我總是被派遣出去，用一種迅速的戰略運動來引誘敵軍的。劉伯承第一個叫我們『兩腳騎兵隊』，這是因為有一次，我們在早晨攻擊過一旅白軍，佔領了一個城之後，就退往一百二十里外另一個城去，而這個城也給我們出其不意地奪了過來。他們再也沒有想到我的部隊會一天攻打兩次的。我的部隊毫不費事地奪取城市，這是出名的。我們的法子是一樣：假如我們想奪取某一個城子，我們先對它佯攻，然後假裝退却。敵軍以為危險已經過去，就疏忽了幾個鐘頭。於是我們迅如閃電似地回了轉來，便毫不費事地出其不意奪取了這地方。因為我是總指揮，我總是在前線的，而且我喜歡站在前線，以便正確地察看地形，及判

斷戰事底過程。我通常離開敵方陣線，不過一百至二百米突。我的部隊總是安置在側翼或後方的，因為他們行動非常迅速。他們對於迅速的祕密移動，都受過特殊訓練，並長於襲擊敵人的後方，而使他們陣線混亂。他們都是些精選的強壯健康的漢子。

「在一九三四年底「第五次圍剿」中，我又在南團打仗了。我對十師以上的白軍作戰，然後奉命護送「抗日前鋒隊」渡過閩江往福建。當我回轉來時，我被派往東戰線去和六師的閩軍打仗。飛機每天轟炸我們。在打仗的時候，他們每隔兩個鐘頭，就十架一隊的飛來。許多的白軍都打死打傷了——我們的弟兄也死傷了許多。然而我們的部隊，被飛機丟炸彈炸死的，却沒有多少人。我們的死傷大多數是由於砲轟。我們本來是有良好防禦工事的，但是白軍有很大的重砲，而我們却是一尊砲也沒有，因此像這樣子就沒法保衛我們自己了。最壞的一種砲彈是先穿進山裏幾尺深，然後纔爆炸開來的。

「在廣昌大戰中，紅軍和國民黨雙方都集中了軍隊。國民黨在這山岳地帶有十萬以上的部隊，紅軍也差不多是同樣的數目。他們不斷地攻擊着，像麥田裏的麥穗波動似地。這一仗繼續達兩天之久，而仍無決定的勝負，因此最後我們就撤退了。在這個戰役初開始時，我奉

命作第一次的進攻，後來則被派擔任右翼指揮。

「在建甯的一仗中，單單我那一部份的前線上，就有二十多架的飛機，分成三架一隊，在我陣線上空。我那時是在掩護着左翼。建甯之戰以後，我們開往瑞金附近的高府老（譯音），因為彭德懷在那地方已經打了七天的陣地戰。國民黨軍隊共計有十一師。紅軍築有良好的防禦工事，無論飛機和大砲都沒法轟毀。我們的口號那時候是，「與戰壕共存亡！決不退却！」在這七天裏頭，對方在戰場上損失了七千人。他們接連攻擊我們，一陣接一陣的。紅軍士兵始終是藏匿着，等他們走上前來時，就開槍擊倒他們。他們是用的「個人攻擊法」，可是我們自己却不能够用這個方法，因此紅軍祇好退却了。這個之後是文華（譯音）之戰，在這一仗裏我擊潰了李默庵師底一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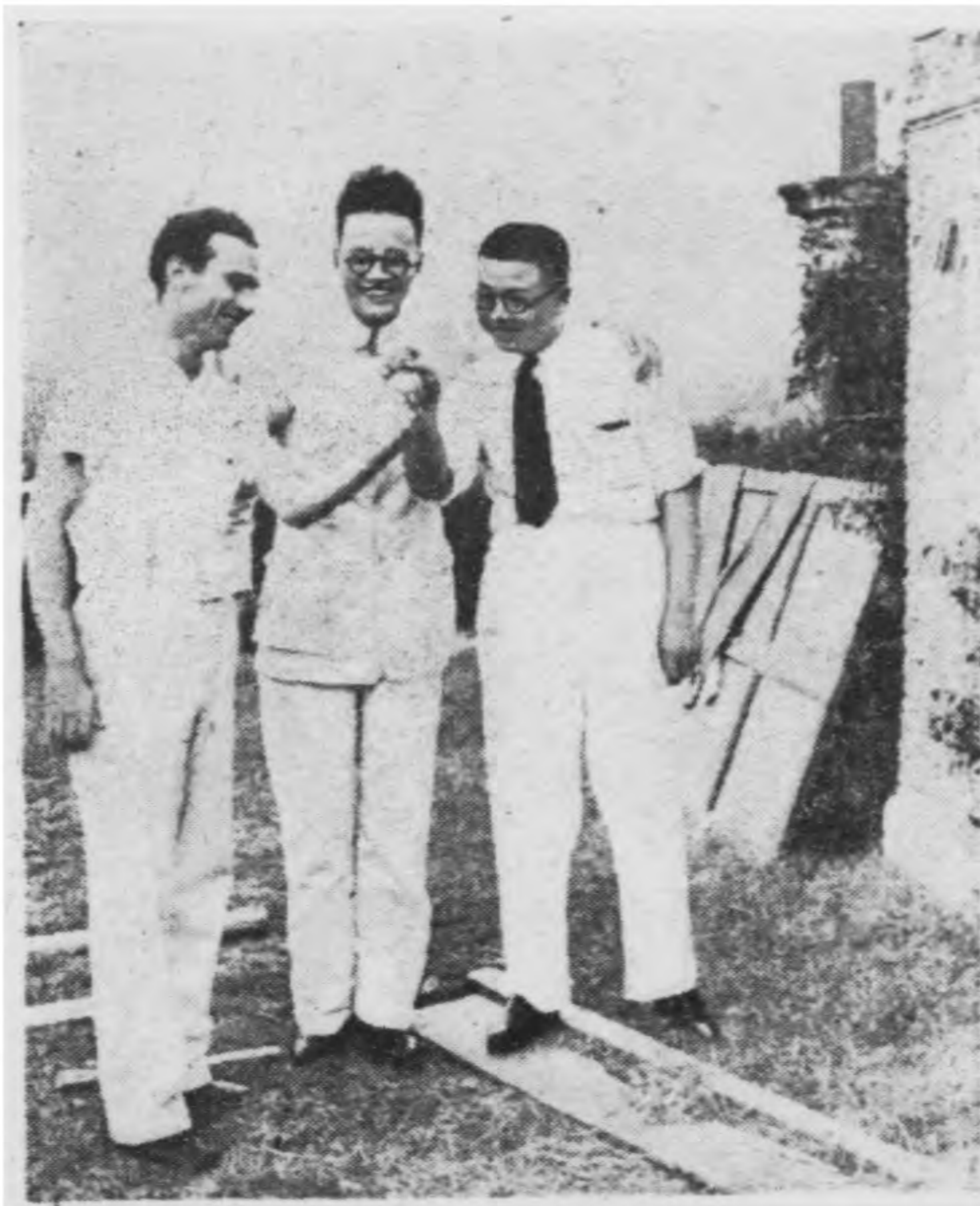
「在此次的戰事之後，紅軍主力部隊就集中在首都瑞金，準備作「長征」了。我被派在外圍上，以便轉移一個白軍縱隊底注意，那個縱隊是正出發來進攻汀州的。當這枝軍隊到達汀州附近時，我却溜了開去，趕往瑞金，和主力軍一同開始作長征了」。

項英。





鄧
 項
 毛
 王
 英
 發
 澤
 東
 稼
 蓆
 薈
 東
 英
 發
 (自左至右)
 一九三一年
 十一月攝於
 瑞金



斯諾(左)博古(中)李克農(右)

七 長征中的後衛軍

『當我們起初離開江西作長征時，我是紅軍第九軍團底總指揮，後來是和林彪所率的第一軍團在一起。我總是在側翼或後衛方面，以保護這行進中的隊伍。這是極艱難的工作，有時候我的部隊是一直剩下在後頭的。』

『到了湖南時，我們不得不佔領永明及江華二縣，使主力紅軍能夠通過，而我的部隊這一次就留下在後頭，不得不再趕快去追上那快速的行軍了。』

『我個人在長征中所遇的最危險地位，是有一次在湖南顏梢墟（譯音）。那條路是通往兩山之間的一道羊腸小徑的。我帶了四團人在後面，其餘的部隊都已經通過了。但是正當我的部隊走到這小徑邊時，國民黨底軍隊追上了我們，而且佔住了一個山頭，對我們突作奇襲，切斷了道路。我們這時真是進退維谷，但是都拚命地打仗，像猛虎似地，結果終於克復了那個山頭。我和七個同志都祇得用我們的毛塞槍來打仗，險險乎被俘虜了去。』

「在長征中，有好幾團的後衛部隊，都在後面被白軍切斷而陷入包圍；但是我的部隊雖然差不多經常地擔負着這任務，或是在後面或是在側翼，我在這些戰略運動中却都是成功的。

「經過湖南之後，我們到達了貴陽。當紅軍佔領鎮遠時，封鎖了吳奇偉五師兵的一個縱隊，我就是封鎖部隊之一。我把守着鎮遠底前線，把守了三天。白軍擁有巨大的進攻兵力，戰鬥是很劇烈的。我佈置了一營人在一座圓山底兩邊。當白軍推進到這一邊時，我們假裝退却，然後立刻迅速地由兩面夾擊，而將他們擊潰，我於是佔領了兩縣。

「我們在長征中最艱苦的戰鬥，一部份是在貴州。有一次在桐梓，我是殿後的，當我到達這裏時，白軍已經由三方面圍攔來了。我佈置了兩營人，佔定陣地，命令主力部隊都退却。退却完成後幾分鐘，白軍由西面前來攻城了。我和他們打起來，一團人便被切斷，雖然後來是逃出的。我本人都幾乎被他們捉住，我的衛隊連犧牲了十個人之後，我纔趁白軍正在吃飯時逃出。那一次若不是因為運用巧妙的戰略，我就要全軍被切斷的了。

「紅軍對於戰術及戰略的全部經驗，在長征中都利用到極度。特別是在貴州。因為處境的艱困，我們不得不運用許多的策略。我們的戰略始終是引誘並攪亂白軍。而當我們三面被包圍時，我們便作一次的正面攻擊，然後留下一小支英勇的部隊守住我們的陣地，同時主力

部隊迅速地撤退，抄往白軍底後方，使白軍陣線到了合圍時，他們圍在口袋裏的只有一個小的部隊，大家就祇好尷尬地面面相覷了。自然，這在那堅守陣地的紅軍小部隊，是需要最大的犧牲精神的。

『主力紅軍到了貴州底六片場，計劃着在那裏擊潰白軍。我被派帶領五連人往風山壩（譯音），那地方離六片場七十里，有三師白軍正經過那裏來增援。我的工作便是攔住這支白軍。我在兩座山頭上，每一邊佈置了一連人，都在白軍清清楚楚看得見的地方。我命令這兩連人，在山上各處繞着圈子走，使別人看起來當它是一支大的部隊，而吸引白軍底注意，我自己却帶了另外那三連人去襲擊後方。我們守這陣地守了兩天——這個時間是足夠我們在別處的主力部隊了——可是白軍底那些蠢軍官却送信出去（這信是被我們截獲的），說是他們「圍困住紅軍主力」哩！山上樹木很多，可是我的弟兄們都祇揀空曠的地方逗留，使人家能够看得見，因此連偵察的飛機都以爲我們是一個很大的部隊，人太多了，樹木下面的地位不够藏躲哩！』

『在長征中我最危險的經歷是渡過貴州的烏江，而且那時候剛在第五次圍剿之後，部隊底士氣都不好。有一天在六點鐘時，我忽然接到一個無線電報，說是到了早晨九點鐘，烏江

上面的大橋就要燬了。我那時距離烏江還有一百九十哩呢！……我的部隊便向烏江疾馳，但是到了第二天中午十二點鐘時，我們離烏江還有四十里路。別的人個個都以爲，即使是沒有橋的話，我們也應該立刻試行渡過江去；但是我反對這個辦法，因爲我以爲這樣一來，白軍會立刻集中攻擊我們的。因此我們並未試行渡河就退却了，因爲軍事委會又拍來一個無線電報，說是我可以按照當時的情勢，運用我自己的戰略。那時橋是早已燬壞了，主力紅軍也早已渡過了。我斷定白軍會從某一方面過來，因爲他們在那一方面有兩條防線的封鎖。帶着紅軍第九軍團底一團人，共計八連（一千五百人）。兩邊都是黔軍，另一邊是川軍，還有一邊是中央軍。對方總共約有六師或五師，計五萬人左右，……我這八連人是在烏江一條小支流底岸邊。我們渡過這小河，去迎擊白軍，然後我趕快又退回對岸，對那邊的軍隊加以重創。我們再在另一個地方渡過了河，因爲我以爲白軍一定也渡過了河，跟着我們。然而白軍並未渡河，我們便又碰見了他們，因此趕快繞到一座山邊去掩蔽。一師白軍跟着我們，……我命令我這八連人分散隊伍，以個人的游擊單位去從事攻擊，以便打退白軍。我的弟兄們死了一百人——白軍死了許多。我們不能再繼續這拚命的戰鬥了，我便率領弟兄們到另一座山去。但是，在這座山底那一邊，也有一師白軍，我却沒有知道——而且他們也不知道是我們來了！我

們突然襲擊，奪獲了一百支步槍。到這時候，大約有八萬的白軍都集中在這小河附近了，以爲他們將要獲得大的戰利品哩。我用計逃出了這困難的地位，但是沒法渡過烏江，因此我們祇好兜了一個圈子；在路上遇見三百個民團，就順便將他們繳了械。後來我們出發去渡河了。在我們要渡而未渡時，四團的白軍追上了我們，兩團從大定來，兩團從畢節來。我們打了整整一天的仗，我的弟兄們又有三百人打死打傷了，但是對方損失八百人。最後，剩下來的我這些部隊都渡過了河。自然，橋是沒有的，但是農民們幫我們將木板紮攏來，舖在河中的石塊上。河水是淺的，可是紅軍士兵大多數是從內地來的，自然都不會游泳。

『在所有的這些時候裏，我那一團人活像是一隻想渡河的老鼠——東跳西蹦，偷看張望，只想看看情勢如何。……』

『我們前頭，這時還有白軍在追着主力紅軍，因此當我們渡過烏江以後，我們就碰見國民黨追擊軍底後衛部隊。他們就大爲恐慌起來，以爲中了我們的計呢。白軍底長官們舉行了個俘捉我的大運動，並且懸着重賞，活捉我者賞洋十萬，擊斃我者賞洋八萬。……然而我始終跟在追擊主力紅軍的白軍部隊後面。』

『當我在烏江開始這整個的戰略運動時，我祇有一千五百人。可是不久，我這一團就擴

大到三千人以上，因為我沿路收了許多義勇軍——雖然我在作戰中的損失很重。這些人都是本地人。在長征中，沒有白軍士兵會加入紅軍裏來，因為紅軍裏頭的生活太艱苦，而且當時的情勢太危殆，他們是受不住的。

「在烏江的這些危殆日子裏，我常常對弟兄們演說，並且告訴他們，「我們彷彿是一隻猴子，在一條狹窄的裏戲弄着牛。這又大又笨的敵人，是行動不能敏捷的，我們對牠加以聰明的戲弄之後，就使牠現出十足的蠢相來了。我們是爲了自由而打着光榮的仗，任何攔在路上的蠢牛，都阻擋不住我們的」。

「在長征中士氣是很好的，紅軍底主力縱隊一直歌聲不輟，但是我部下的弟兄們，因爲經常地擔任着戰略運動，實在太忙而且太累了，是沒有功夫唱歌的。我的政治委員那時是何長工，一個法國留學生。他的身體衰弱，而且一條腿已跛，但是在我們任何最艱苦的環境下，他都從來沒有逡巡遲疑過。

「在長征中我差不多天天都要打一兩次的仗，而且有時候我們澈夜地移動着。我總是很瞌睡的，常常在吃飯的時候睡着了。有時候，我騎了一匹騾子，以便得到點休息，但在路上

這驢子却跑失了……

『我們的部隊休息了一些時之後，就前進到我本省雲南去。我被派攻擊滄水(譯音)。疾行了二百七十里，於兩日內抵達那地方，這時白軍還沒有趕到呢。白軍次日早晨開到了，但是我已佔據了各戰略要點，因此就擊敗了他們，然後回師與我們的主力軍會合。』

『都鎮(譯音)之戰中，我們不很順利。在這一戰之後，我便護送紅軍第一第三兩軍團及軍事委會。渡過了紀水河(譯音)，我佈置一團兵在第一線，而我自己第二線。指揮第一線的那軍官却犯了錯誤。我命令他據守到十二點鐘，但是他撤退得太早了，因此我祇得慘烈作戰，以免主力部隊遭受重大損失。』

『當我們在四月裏，到達雲南東川府附近時，我被派擔任前鋒，去攻取那個城。我們剛剛將這城團圍住時，我忽然從該城縣長及當地民團團長那裏，接得一封信。這民團團長是我好久以前的一個老朋友，他一曉得圍城的是我的部隊時，就決和我重續舊好。我送了一封回信給他們，要求縣長出來和我談判。他對這要求答應了，我們談判的結果是，准許紅軍開入城內。我們的頭一件行動就是將縣長底印信充公。用這印來寫了一封信給金沙江的民船船主，叫他們將所有的船隻都集中在某一個地點，以便保護他們勿受紅軍騷擾。』

「船主們就都遵照命令，集中了一百隻大船。同時我們還準備好另外一個計策：我將我的弟兄們都改穿了民團服裝，帶領他們到江邊去，假裝防禦紅軍的樣子。我的弟兄們就都走進船裏，毫不費事地渡過了江。我們於是用四連人佔領了對岸，爲主力紅軍守衛着這地方，等候他們到來。可是我的同志們並不知道我這改換服裝的計策，他們的斥候隊便報告道：「四連白軍已佔據對岸四川地界」。因此他們竟到另一地點去渡江！可是最後，他們發覺了正確的情勢，而且有一部份的軍隊開來了。我們的弟兄便保衛所有的這些人渡過江。渡江完畢以後，我們付了五千塊錢給各船主，將江上所有的船都焚燬掉，因此當白軍到達時，他們就毫無辦法渡河了。」

「在江對岸底爐口，我又被派擔任後衛的職務，並且有幾師的白軍追上我。我本想作一次祕密的襲擊，而在另一路白軍尚未覺察之前，擊潰了這一路的白軍，但是白軍却先進攻了我部隊中的六連人就立刻反攻這兩師兵，而予以重創。」

「於是我們進入羅羅區域，五六千的羅羅已經集中起來，想和我們打仗，而且他們早已從紅軍手裏奪獲了六七百支步槍。可是，當他們看見我的部隊和附近的軍隊打得那麼勝利時

。我們雖然人數很少，他們也不敢來攻擊了。當我們經過獯獯區域時，我這縱隊底前鋒和後衛是緊接的，因此我們既沒有打仗，也沒有損失。獯獯們是恨官軍的，我們和他們商妥之後，就給他們一些槍，而由他們來保護我們作長征。獯獯們從白軍那裏奪獲了許多槍，正如他們以前從我們手裏奪取一樣，一路上他們和白軍打着仗。苗族們和蠻族們也都攻擊白軍底前哨。

「在我們過大渡河時，何長工同志負保護後衛之責，因為我那時生着傷寒症，病勢很沉重，不得不躺在擔架上抬着。後來，因為這樣地需人抬着，太耗費寶貴的人力了，我便試騎騾子。當時在河底這一邊有六團兵，河底那一邊有二十團兵。白軍從兩邊夾擊，我們的部隊便陷入極困苦之境，一部份已被隔絕在山中，既沒有東西吃，又沒有水喝。這時我接到朱德和周恩來拍來的電報，叫我不惜用任何犧牲去攻取天全縣城，以轉移白軍視線而解救我們主力軍之困。我便將弟兄們都召集攏來，告訴他們，我們已受囑負擔這工作。我們便在更遠的地方渡過了河，而遵照命令進攻天全城。白軍在城裏雖然有三團的楊森部隊，我們却由後方突作奇襲，便攻下了該城，祇損失了幾十個弟兄。我們一佔領這城後，我便跌倒了，人事不省，有兩小時之久。可是我在長征中，祇生過這一次傷寒病。

「當主力紅軍離開四川前赴西北時，我的部隊落在他們後面有四五天功夫。我離開第四

方面紅軍也有四五天的路程。我被蠻族所包圍，和他們發生劇烈的戰事。我們爬到一座山上，繞到蠻子們底背後。纔擊敗了他們。因為到那時候，我們離開主力軍已經太遠了，我便加入徐向前所率的第四方面軍，作為他的後衛部隊。我和朱德及徐向前，一同在這區域裏度了一年，從一九三五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八月。我們在西康住了大約六個月，同時，我被派護送賀龍底第二方面軍。當這一軍到達四川時；後來便和賀龍一同通過大草原而進入甘肅南部。在草原中，我們不斷地被蠻族騎兵所攻擊。他們能在馬上開槍，槍法百發百中，蠻族們是很厲害的，和他們打仗真不容易。他們比白軍打得多，因為他們擅長埋伏及山岳戰，並且他們的士氣十分堅強。我和王俊（譯音）底部隊在成縣有過劇烈的戰鬥，後來和那個區域的騎兵部隊，也有過幾次的苦戰。

『在十二月「西安事變」發生以前，我駐紮在徽縣，和胡宗南打仗。後來我到豫旺壩去。在「西安事變」以後，我這一軍（第三十二紅軍），以及其他的兩軍，組成了「西征軍」第一縱隊，這是原來計劃要西進的』。

第八章 項英——鐵樣的指揮者，及其指揮

一 「鐵軍」中的純鋼

雖然我和項英在一起的時間很短促，他在數小時內所給予我的印象，却比認識了幾月幾年的人，還要鮮明得多。他在身體的外表上，是並不驚人的，其實是他看起來很像通商口岸中洋人那裏的一個「典型的苦力」。壯健而有肌力，他那矮矮的身材，上面是一個頭，從背端突將出來，像一座圓屋頂似地。他兩手的指頭是粗短而且胼結；他的嘴唇和鼻子是寬闊而且粗厚；他的牙齒，有幾顆已經落掉了，是不規則而且不美觀地突出着。但是他的笑容却是勞動中國底動人的笑容。

除了徐海東，項英是我在中國共產黨中所遇到的，唯一的高級軍政領袖之純粹出身於無產階級者。他有一點徐海東底那種易於衝動的性情，但是沒有徐底孩子般的豪邁；他有彭德

◆著者註：因為我自己並沒有會到項英，我請求愛特伽·斯諾許我借用項英底自傳在這部書裏，這自傳是他在一九三八年於漢口時，從項英那裏得到的。

懷底那種毅力和躁急，但是沒有彭底犀利和機智。像徐海東一樣，他是個「黨所造成」的人；他對於政治及軍事上所知道的一切，差不多全是在紅軍及共產黨底教導之下而學會的。

像他在下面這傳記裏所說的一樣，現在年已四十歲的項英，在十歲時就是孤兒了。他的父親，一個低微的薪給工作者，死後拋下了他的母親來養育項英和他的妹妹。他不得不離開了學校；他和他妹妹都做了紗廠工人，——後來便都成了共產黨。他的妹妹，他相信，是在大革命中死了的。

而且從項英自己這謙卑的故事中，我們清清楚楚地可以看出，當他發展着他那勞動組織者的事業時，他自己一定是，說句譬喻的話，生而復死，死而復生過一千次的。那時候他在中國的地位之重要，也許僅僅次於李立三吧。

關於項英自己的故事，這裏是無須多加描述的，但是當紅軍主力各部隊進行他們那現已世界聞名的向西北的「長征」時，項英却被留下來指揮紅軍底後衛部隊，並且將這些部隊努力結合起來；對於他的這一偉大事績，我們却不妨略加評釋。他所成就的是，能使他那小小的基本幹部，在連續被攻擊之中，絲毫不受到損失；這是從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七年中的事情。而這成就底本身，和那史詩般的「大旅行」比起來時，簡直是同樣地了不得的偉績。項英

底那些堅強的老戰士們，在這三年裏頭，是身歷了真正的地獄。他們不像主力紅軍各部隊那樣，可以隨意地由這一省移動到那一省；他們被派擔任後衛掩護及轉移白軍攻擊的責任，是被限定在相當狹小的作戰範圍內的。

項英底部下簡直沒有一個人希望會有勝利或復興的一天了，這是在一九三五年及一九三六年，隨便什麼人都可以想得到的。他們被軍隊包圍着，在數目上超過他們二十倍至三十倍。身上穿的剩了些破布；肚子裏通常祇有半飽，而且時常僅以希望來充飢；四面八方都被包圍住，而對着那似已註定的毀滅；他們是那麼慘酷地被追擊着，因此竟然有兩年之久，祇有在山中的森林裏他們纔覺得是安全的，而且即使是在那裏，他們也還不敢脫去他們那破爛的制服來睡覺或洗澡，深恐要遇到突然的襲擊，——這些長壽的「殘餘赤匪」們所忍受的艱苦生涯，以上便是一幅粗略的圖畫。有好幾百個的弟兄和官長，都打仗打死了，或是因生病和吃苦而死亡了。可是這小小的部隊並沒有屈服，他們拒絕繳械，始終保持着它那革命的忠誠和團結，一直到底。對於信奉一個偉大主義的任何地方任何種族的人，這是個何等的教訓啊！

『我們軍隊裏所剩下來』，項英告訴我說，『差不多是純粹的鐵了』。真是，純粹的鐵，鍛鍊成純粹的鋼的。而且，這支軍隊是從那著名的「鐵軍」中，產生出來的寶貴蒸溜物；

舊紅軍底第一批幹部人物，原都是從「鐵軍」中產生出來的。

依我看來，這對於中國實在是很幸運的，就是：這些具有如此偉大的戰鬥情緒的人，在南京所進行之無數的（可是幸而無效的）「殲滅討伐戰」中，居然並沒有全部被消滅掉。要是這樣的事發生了的話，我們就不禁要詫異：即使還有什麼人時，今天究竟誰會被留下着。來領導這長江下游一帶的民衆呢？因為，中國政府底主力部隊早已撤離了東部諸省了，如今中國要動員這廣大區域裏的民衆來作持久抵抗，其希望所寄託者，正是這會遭追捕的項英，以及許多像他而他年輕得多的人。

二 項英與「新四軍」

去年（一九三七年）一月，政府最後決定准許項英底部隊改編為新四軍，葉挺將軍，「南昌暴動」底共同領導者之一，及張發奎將軍底「鐵軍」前副軍長，被任為新四軍軍長，而項英則被任為副軍長。話立刻傳開去，說項英是在動員部隊去打日本人了。這新聞傳達到許多的鄉村和鎮市裏，過了幾個星期之後，農民們就開始跋涉長途，從老遠的地方步行而來，響應項英底號召。有好些人帶了他們自己的槍來，將它們從內戰以後所埋着的地方掘出來。有些人有點錢和食物的，帶了他們的錢和食物來。工人們從上海逐漸地投奔過來，因為他們至今還記得項；而年輕的學生們也都設法來參加這個「戰爭裏的戰爭」，就是項英在被佔領區域內，開始領導着去抵抗日本人的。但是有一個長久的時候，這些是新四軍所得到的唯一的幫助；因為中央政府是全神灌注在應付別的要求上，正在遠處西部的主力陣線上作戰。

項英底部隊很快地由五千人擴張到一萬人，兩萬人了；到了一九三八年八月底時，他們

的數目就已經有四萬人。身體壯健而情緒熱烈的義勇軍，是並不缺少的，但軍器子彈以及藥品，却嚴重地缺乏。並且在新四軍控制之下的區域裏，民衆們所需要而嚴重地缺少的，是已製成的物品，農業用的器具，以及各種的小工業，與能製造這些東西，而使鄉間物品市場穩定的，熟練的工人們。

『我們的最大的困難』，項英告訴我說，『是缺少武器。我們需要步槍，手榴彈，炸藥，機關鎗，及輕砲等。農民們捐助了許多步鎗給我們；早晚我們會從日本人那裏，奪到更多的。但是我們需要格外迅速地將民衆武裝起來。我們需要錢來立刻購買武器；而且我們需要錢來設立我們自己的流動的兵工廠。我們這一軍的人數已經差不多有三師多人，我們從政府所得到的津貼還不够給養一師人。但是我們不能希望政府給我們以更多的錢，它自然是須先注意西移的主力部隊底需要的。我們必須號召民衆們自身，尤其是被佔領區裏的民衆們，來給我們以更大更大的幫助。我們現在是爲着他們在打仗啊，因爲一切的中國人現在都聯合起來了』。

項英及新四軍，對於「中國工業合作運動」底努力，是寄託着極大的希望的，這運動是一個政府計劃，現在正在江蘇福建浙江等省裏，從事於設立數百個小規模的流動工業。這些工

業能够在内地中，供給游擊部隊以必需的工業根據地，同時並能以工作供給無數失業的難民們；而且假如能在一種廣大的範圍下設立起來時，它最後也許就能完全改造過中國的鄉村經濟，而使其適合於流動戰爭及持久抗戰的需要，因為這戰爭是以內地的城市及鄉村為根據的。新四軍和工業合作協會都已發出徵求熟練工人，機器，及金錢，以建立這種戰時工業的呼籲了。

因此，在它努力和光陰競賽，而使鄉村民衆準備作長期抗戰時，新四軍是面對着鉅重的困難的。可是其實呢，它們比這些久經磨練的戰士們在過去所遇到而克服的困難，並不更其不可制勝。日本很可以暫停一下而反省反省，她結局是否具有充分的物質和精神的力量，來摧毀這一革命的軍隊，而這軍隊是自從她佔領了南京之後，就每個月愈長愈堅強的。

以下便是項英在漢口時，對我所說的自傳。

三 項英自傳

——一九三八年向斯諾所述

我在一八九八年，生於湖北武昌，家裏是貧苦的。我父親是一個店舖裏的夥計，當我十歲時，他就去世了，拋下我的母親窮苦無依，要撫養兩個孩子，我及我妹妹。

我的教育是在初等小學讀了四年書，以後就不得不出去做工來養活我母親。我被送往一家紡織廠裏去當學徒，經過三年的苦工，我到了十五歲時，便成爲一個薪給工人。我妹妹也做了紗廠女工，而且後來加入了共產黨。我自從一九二七年以後，就沒有看見過她；也許她早已死了吧。她是受了我自己的奮鬥底影響，參加過偉大的武漢勞工運動，後來我們就分離了。

我在工廠裏挨打受虐待，並且因爲工廠的待遇很壞，我是傾向於反叛的。我能够讀書寫字，而且比大多數的工廠工人們，多知道一點。在俄國大革命時，我是十九歲，這件大事的

消息使我非常感覺興趣。我那時候對於共產黨馬克斯主義，是什麼也不知道的，但是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關於革命的宣傳很多，而那些革命的口號都使我感動。

在我還沒有和共產黨發生任何關係之前，我就想將紗廠的工人組織起來，從事於改良待遇的鬥爭。我在一九二〇年，領導了武漢頭一次的紡織罷工。在那一次的罷工以後，共產黨就注意到我了。我第一次是從一個智識份子那裏，聽到了馬克斯主義；這人跑來和我談話，而且要 and 工人們聯絡。他對於我很有點影響。可是後來他加入了國民黨，就不再在我的生活裏發生關係了。

當共產黨員們和我接觸了時，我就喜歡他們的綱領，答應和他們一同工作，來組織武漢的工人階級。以後不久我就離開了紡織廠，被派往組織鐵路工人，而開始去執行這任務，在陳丹邱（譯音）和董必武底指導之下，這兩人當時都是共產黨領袖。我組成了武漢底第一個鐵路工會，而擔任這工會底書記，會員都是平漢鐵路底工人。

1 漢冶萍的一個礦工

此後我到大冶去，在鐵礦工人中做工，同時也在漢陽和萍鄉做着組織上的工作。「漢冶

「萍工會」就是第三個組織成立的工會。第二個組成的工會是，離開漢口三十里路，孫家集地方的機器工人聯合會。這三個工會就宣佈了一個罷工，來要求改良待遇，結果湖北的督軍（蕭耀南）下令封閉工會，並逮捕工會各領袖。但是我們共有七千個工人，都是武裝地組織的，由前進的漢陽鐵廠的鋼鐵工人們領導。經過五天之後，鐵礦工人底主人們驚恐起來了：所有的鑄鐵爐都無人管理了。冷了的鋼鐵刺入他們心裏，恐嚇着他們燬滅即將來臨。漢陽鐵廠是第一個屈服下來的。這在中國是頭一次的罷工大勝利，從這個時候，各種的工會就很迅速地增加起來了。

武漢底各工會這時就聯合組織了一個總工會，由我擔任書記。一連串的罷工，差不多都是成功的，掃蕩於華中。烟草，電力，及紡織工人們，尤其是獲得巨大的利益。到了二九二三年，武漢已經成爲工人階級運動的中心點了。

我們的最巨大最有力量的工會，是在平漢鐵路工人中所組織的，並且由於這個工會，地方的工人們也開始受到影響。起先，各鐵路工會都祇是地方性的，但是我們決定將這些工會聯合起來，組成一個總會，最後就在河南鄭州，召集了一個會議，各地方的代表全都出席參加。在這時候，吳佩孚是華北最有勢力的人物，他是把鐵路看作他自己的產業的，當它們爲

他的軍事機構底一部份。自然哪，他是反對這些工會的。當他知道了我們開會的消息時，他便派了兵來捉我們。軍隊來到之後，就在我們的四周佈防包圍，想要解散我們，但是我們抵抗了。在那天夜裏，當我們正在開會時，他們就來攻擊我們。

因為這次事件的結果，我們便在鐵路上宣佈了一個總罷工，參加的工人共有二萬名，從北京一直到廣州。這一種重大的壓迫，最後使政府不得不請求工人們，派一個代表前去開談判，而我便被選中了。第二天，當局想強迫工人們回去做工，但是他們這企圖終於失敗。我於是被捕，幽禁了好幾天，可是這事情更加强了工人們底決心。最後我被釋放了。罷工一直繼續到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這時政府就開始用武力來壓迫工會。在鄭州約有四十個人被殺，在武漢和別處，被殺的人更多。工會領袖們都祇得躲藏起來，以保全他們的性命，有一些時候我就躲在武漢，避免被捕及處死。此後有一些時候，勞工運動完全被擊碎的了。

同時，國民黨和C.P.之間的協商正在開展中。一九二四年，國民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我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底委員。然而在北方，反動的軍閥們對於勞工，已經到處在實行恐怖的攻擊了，我們的領袖們就續有在武漢被捕的。於是我在這一次的鬥爭中，被任為共產黨工人部底書記，而前往上海。那時候李立三也在上海組織着工人們，他的區域是

在楊樹浦一帶，亦即北區。我所主持的是滬西，雖然受着極猛烈的壓迫，我們的這工會運動却很迅速地成長起來，因此到了一九二五年二月時，我們便能够宣佈一次的總罷工，而共有工友十萬人參加。我們的工運也得到了復興，武漢地方的吳佩孚反動勢力不能夠消滅我們；於是有一個短促的時期，我被調回武漢去。但是五卅運動在上海發生了，英警開槍擊斃了幾個學生工人，他們是爲了對罷工的紡織工人表示同情，而在舉行着反對日紗廠主人的示威的。我就回到上海，去領導一個總罷工。我們必須和強烈的壓迫鬥爭，我們的工作便祕密起來。李立三離開上海了，我就成爲留下來的，工人們組織方面的領袖，從五卅運動的時候起，一直到北伐的時候止，勞工是日漸地有勢力起來，而在奪取上海之役達到其頂點。

後來我回到漢口去，在那裏做了五十萬工人——湖北總工會——底組織部書記，各種工業的工人都組織起來了——機器工業連同手工業。此外我還擔任指揮漢口的工人糾察隊。

約有四千到五千之間的工人，都組織起來，成爲糾察隊，他們總共約有一千支槍。有些槍械都是由葉挺給我們的，他那時候是第二十軍底軍長。我們工人們就和葉挺一同統治着漢口，而當夏斗寅在一九二七年四月裏叛變時，我們便動員出來維持秩序，而葉挺則被派往壓制叛變。這時候，唐生智有兩師人在漢口，但是他怕和我們衝突；他是在坐觀葉挺和夏斗寅

作戰的結果。張發奎底第四軍那時候也在漢口，——不過祇是一部份——他們的政治立場如何，唐生智也不清楚。我們雖然祇有一千支槍，可是在組織方面，地位却非常堅強；我們單單在武漢的工會，就有會員二十八萬人。假如我們早就宣布總罷工時，我們是能够把更多的人武裝起來的。

但我們的弱點是在於，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太遲緩了。那時候士兵們是沒有什麼政治智識的；我們早就應當對唐生智底部隊進行活動，可是我們並沒有這樣。陳獨秀是，既反對在軍隊裏做政治工作，又反對武裝工人們的。那時候他所主持的政策，對於我們結局之遭受取締，是應該負責的。因為真正統治了漢口一個半月的，是糾察隊；而唐生智是直到我們奉陳獨秀之命解除了武裝時，纔對我們採取行動的。在國共兩黨最後的分裂之後，（在共產黨員被逐出國民黨之後），陳獨秀甚至在那時候，還是怕來領導作任何的反抗。

我後來病了，七月之後我有兩個月不能夠離開武漢——在這一時期中，我始終是躲藏着。工會全都被取締了，我們的一些領袖都被捕殺了。八月裏，賀龍和葉挺在南昌領導了一次暴動。以後不久，我便逃往上海，黨要在那裏把各工會改組一下，以進行罷工的行動。但是白色恐怖已經極厲害，在新情勢之下要動員工友們，事實上很困難。在一九二八年，我被任為

江蘇省黨部底書記，以後不久即被派往莫斯科，任C. I.（共產國際）第六屆代表大會的代表之一，在該會中我被選為監察委員。回到本國後，我在黨的總部裏工作，一九二九年擔任（共黨）全國總工會底主席。（李立三那時候是政治局底最有勢力的人物，而維持他這地位直到一九三〇年）。當彭德懷佔領長沙，以及國民黨隨即克復長沙之後，政治局是改組了，我就被派往江西去。

2 留守江西的「孤軍」

在江西，我擔任着「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底主席。這是剛在第一次圍剿失敗之後。在這之前，我特地從上海到武漢去，參加在武漢所召集的總罷工，（由李立三領導的）但是這一次的嘗試，因為紅軍長沙戰役的連帶關係，是失敗了，失敗之後我便進入江西去。

在江西我參加過許多的戰鬥，直到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時，我被選為副主席。這個代表大會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召開的，這天是十月革命的週年紀念日。（據項英說：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原來是預定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七日召開的，但是因為軍事情勢的關係，代表們不能如期趕到江西，因此就展延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一了）。

毛澤東被舉爲「中國工農蘇維埃政府」底主席，我爲副主席。朱德被舉爲「革命軍事會議」底主席，及「工農紅軍總司令」。直到那時候，毛澤東都是擔任着軍事職務的，就是在後來，直到一九三三年，他也還是化了大部份的時間在前線，而我則留在後方做着政府底代理主席。當毛澤東回來時，我便做着「軍事會議」底主席，代理朱德。一九三三年一月，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朱德回來了，就留下在瑞金，因爲第五次圍剿這時正在開始。

毛澤東在那時候成爲所有各部的頭腦。從這時起我便擔任了各部底部長，包括勞工部，土地部，財政部，研究部等等。到了一九三四年，決定將主力軍由江西撤退，朱毛便往西去，留下我來指揮江西的黨部及軍隊。我做着我們在江西的這支後衛軍底領袖，直到一九三五年五月；那時纔最後被迫退往福建江西廣東底邊境，以武夷山脈爲根據地。這對於我們，是可怕的艱苦時期之開始，而這時期繼續了兩年半之久。

從那時候，我們便和主力部隊失去接觸，我們關於外界的消息也就一天比一天零碎了。我們的一些無線電機，不是遺失掉就是毀壞掉；而我們的交通，因爲被白軍所封鎖，是狹隘地受着限制的。在方志敏被殺之後，這個區域裏剩下來的軍事指揮者，就祇有我和陳毅兩人

了。有許多次，我們對於我們的未來，以及復興的可能性，都感到絕望了，但是我們始終不肯屈服，雖然南京軍隊給了我們無數的利誘與威逼。有鑒於我們所處之地位，我們便化整爲零，根據着最多山的區域，來分成小的游擊部隊，而利用這些新的戰術，繼續打了幾次勝仗，並且奪獲了充分的武器及軍用品，來維持我們自己。但是逐漸逐漸地，我們的地位一天比一天嚴重了。有兩年之久，我在夜間從未脫過衣服睡覺，我的弟兄們也是如此：我們不得不準備好，一接到幾分鐘的警告，就要開始行動的。我們不能够在鎮市裏或鄉村裏睡覺，祇能把山中的森林作爲我們的臥榻。我們熟悉福建江西邊境的各山，一步一步地認清楚，每一個角落都知道：於是我們便矯捷強壯得和野人們一樣了。

有許多次，白軍距離我們紮營的地方祇有幾里路，而走近來要捉拿我們。在這三年的「捉迷藏」式游擊戰爭裏，我最危險的一次是在一九三七年五月間，（西安事變發生，據傳國共「協定」成立的五個月之後），陳毅和我在一座山底山脚下休息。有幾個共產黨裏的奸細，帶引了一營的白軍，到我們休息的地方來，想包圍我們。在他們的包圍剛要完成之前，陳毅帶了他的四個衛隊逃走了。但是我，因爲離開得遠一點，沒有聽見那警報，等到覺察時已經來不及了。我看見政府底軍隊走近來，就藏身在一些長的草裏。政府軍隊爲了尋覓我，正走

到離我躺着的地方祇有十米突，而且正在很仔細地檢查那地方時，忽然天下起雨來。這是一場可怕的傾盆大雨，並有很劇烈的雷響閃電；因為雨下得太大了，兵士們都去找藏身的地方。我便趁他們混亂的時候，從草裏匍匐地爬過去，化費整夜的功夫逃出了重圍。那次一共有四營人，圍圍將這座山圍住。我自己的部隊還離開有一些路，我是親自走往那裏，帶了幾個衛隊和陳毅，去偵察白軍的，却不料遇到了這樣的一次危險。

在這些艱苦的年頭裏，我們從來沒有充分的東西吃。要不是因為農民們底幫助，我們早就要餓死了。他們總是幫助我們，並且給我們足夠的米來適應我們的需要。我們穿的都是破布；有三年之久，我沒有得到過一件新衣服，祇是穿着我的棉布制服。我們不斷地移動着，並且不能夠在任何地方，建立起一個根據地來。我們的軍火越用越少了，我們的槍械越用越奮而且越壞了。我們對於我們的子彈是很仔細的。假如一個士兵有二十發之多，那就認為是很了不得了。我們除非有確切的把握，能夠換到好幾顆的子彈，是決不妄發一鎗的。我們常常兩天或三天，得不到一點食物吃，有幾次甚至比這時間還要長。經過了差不多二年的這種生活之後，戰爭中的無論什麼磨難，都嚇不倒我們的了。

3 新四軍之誕生

西安事變的結果是，國民黨軍隊和西北共黨部隊間的內戰終止了，但是這休戰對於我們却還不發生影響。南京方面對於我們的戰事從來沒有停過。實際上是，反而增加起來了，因為這時候南京軍隊能用全副精神來討平我們。最後的一次大圍剿是在一九三六年開始，和進攻西北的準備是同時的，到了一九三七年，經過西安事變底間斷之後，又重新開始了。有從三十師到四十師的軍隊來從事這殲滅的工作，其中包括張發奎，余漢謀，熊式輝（江西省主席），陳儀（福建省主席），以及許多比較地不著名的將領們底部隊。他們加緊對武夷山的封鎖，開始遷移鄉村居民，燒去森林，而想佈下陷阱來捉住我們。那時陳調元在浙江，他是領導這工作的。他們決意消滅我們，不願有像西北方面那樣的「休戰」。因為我們是南方各省中最後的共產黨部隊，他們不願我們再留下在那裏，也不願有蘇維埃時期的任何痕跡。我們不能夠從朱毛那裏得到任何的消息或指示，可是最後當我們聽到西安事變已經解決了時，我們便發出一篇宣言，要求停止戰事。但是這要求被忽視了，圍剿便繼續下去。

當我們和主力紅軍分手時，那時候我的部隊約有一萬人——三千正規軍，七千「紅保衛隊」

，即地方上的義勇軍。此外我們約有二千名從事游擊的非正規軍。我們所有的槍總共還不到一萬枝。到了三年游擊戰爭的結束，在瑞金被佔領之後，我們的部隊已減少到大約五千人，一切都計算在內，而槍則共約三千支。我們的游擊區域，有許多居民都撤移了，我們的農民保衛隊就散開，解散，或被殺了。但是剩下來的這三千人，早已成爲無數次大小戰爭中的老練戰士；他們都是堅強的勇士；而且差不多每一個人都能够率領部隊作戰，像官長一樣。

直到蘆溝橋事變發生後，我們所受的壓迫纔減輕起來。我們認爲這是我們的一個機會，於是就發出了一篇宣言，主張建立統一戰線，並且要求給我們一個機會去和日本人打仗。可是，直到八一三上海戰事爆發以後，這一呼籲纔得到響應。江西省主席熊式輝對我們的態度不像以前那麼強硬了；這時候江西的軍隊，一部份已在動員中，準備調往上海去，熊式輝恐怕我們會在江西搗亂他的後方。他起先想派幾個共產黨裏的漢奸到我們軍隊和游擊隊裏來，要改組這些部隊而率領他們上前線去。這個計策失敗了之後，他結果便不得不來和我接洽。可是我直至接到他所送來的，一封由何應欽將軍擔保並由共黨認可的書面通告之後，纔答應和他談判。熊氏派了一部汽車，到我們區域底邊界來接我，我便去拜訪他，並且拜訪了何應欽。從那一時節起，就由博古（那時是在南京）來接手談判了。我從江西到陝北去，在陝北接

到了將我們的部隊改編為新四軍的命令，由葉挺擔任軍長，我自己擔任副軍長。十月裏一個試辦的協定成立了，但是我的部隊還保留着他們的武器及指揮權，直至那一年的年底。等到我從陝西回來，帶來了黨底指令之後，新四軍最後纔正式成立，時為一九三八年一月。我們於是從我們的舊根據地，向北移動到長江下游的目前這區域，來開始對日人進行游擊戰爭。

在我們那些劇烈地艱難和困苦的歲月中，我們的幹部是從沒有改變過他們的意志的，而且從沒有放棄了希望。他們從沒有捨棄過對於共產主義的信念，他們祇聽從着黨的命令。我們的戰鬥員，大部份都是農民。我們這支軍隊，經過了這樣不斷的戰鬥之後，現在剩下來的，差不多是純粹的鐵了。意志軟弱的人和漢奸們，都已經自行淘汰了。我們這新四軍無論在政治上及軍事上，都是江西老戰士中的頂兒尖兒！

第九章 蔡樹藩——反叛的漢治萍礦工

一 中國勞工運動的元老

我第一次遇見他是在網球場上，就驚異於他的拍球方法。他作一種跳蛙的姿態蹲伏着，沒有一個球能逃過他的球拍。他將球回擊過來，快得像閃電似地，直抵他知道你不願意他拍過來的地方。在拍球的時候，他老是細着臉兒；他拍法像他臉兒一樣地沒變化。實在是，他似乎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沒有改變過這種表情，祇除了偶爾聳起一邊的眉毛，微微帶點挑戰的神氣，或是朝你閃電似地一瞧。這是個愉快，聰明的，而眼睛老是在警戒着的臉兒。

身材瘦小而強壯，人民委員蔡樹藩曾經受過九次的彈片傷，並且喪失了一隻手臂給十九路軍，懲罰他底大胆從望遠鏡去窺探敵軍。在加入紅軍做人民政治委員之前，他做過漢冶萍礦工底領袖。這批礦工是以他們那反叛的勞工運動而著名，這運動在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二年，當它剛纔開始的時候，就是由共黨所組織的。像大多數從「兩湖」——湖南及湖北——來的叛徒們一樣，（這班人就是漢冶萍底員工）。蔡是坦白，直爽，長於批判而且性情躁急的，

雖然他的臉兒老是細着。在做礦中童工時，他就從共產黨底教科書裏，學會了讀書和寫字。他現在還祇二十九歲，却和中國底兩個最出名的無產階級領袖，密切地一同工作過，——一個是李立三，一個是項英。而且他是發軔於「社會主義青年團」，那個曇花一現的團體，差不多一組織成立，就被共產黨青年團，在一九二三年全部吸收了去的。

李立三底漢冶萍礦工們後來是造成了紅軍之最初的幾個部隊的。當蔡樹藩把漢冶萍和這些礦工們的故事告訴給我聽之後，我對於「左派主義者李立三」之自以為能在一九三〇年，用他的無產者們來征服全中國，就不以為奇了。——這是李立三底一個激烈念頭，爲了這個念頭，他終於被削去在共產黨中的領袖地位，而被送往莫斯科再多研究些馬克斯主義；他至今還在莫斯科。有了幾十名行動迅捷情感熱烈的兩湖礦工，如蔡樹藩這樣的人，帶着網球拍和他那百發百中的反手打，我想我自己也會絕不躊躇地去試幹如此的征戰吧。

『我去年在保安，和斯諾同在一個院子裏住了一個月』，當我被介紹給他時，這個細着臉兒的無產者說。『我們總是每晚玩撲克的，所以我們不賭攤牌輸贏』。

『我敢信無論你輸掉的是什麼，總不會輸掉你的「臉」的』，我說，勉強地想取笑取笑這位「撲克臉兒」（按即細着臉兒的意思）。

於是我想起來了，那位斯諾是很喜歡蔡的，而且曾經和我談到他。除了別的許多事情之外，他做過派往莫斯科的中國勞工代表，並且在大學裏當過學生，他到現在還有一個俄國老婆在那兒。

蔡並不是個哲學型的人物，他對於他那隻手臂似乎是不很高興的。當我們從網球場裏沿着河回去，他和我一同走着時，他很有點抑鬱地說道：

『我要想到上海去，去裝上一隻新的手臂。你知道，我也許是不一定需要將這手臂割去的，因為假使不是項英急着要我回到軍隊裏去工作，我就不會不耐煩等候創處復原了。』

『我能用一隻臂膊騎馬、打網球，和游泳過河，而且我能够很便當地寫字和捏筷子』，他熱切地說。『但到底這總是兩樣的。我有一點兒失去均衡，有些偏到右邊去，你知道』。

『可是，那在如今倒要比傾向左面時髦呢，不是麼？』我安慰地獻議道。

但是蔡對於裝一隻新手臂的事，確實很認真，雖則他到一個城市裏去將這手臂裝起來，對於他自身的危險很大。他的確曾經爲了這個目的，開始動身到上海去，在大雨中一路步行到西安。但是那時候，因為對日抗戰，鐵路已經拆斷了，他就不能夠通過，戰爭之弄人也是如此。

蔡樹藩現在是蘇維埃的內政部長，他詳細把各蘇區的情況講給我聽。於是我要求他告訴我，關於他自己的一切，他答應了。

我對於他的故事很感興趣，因為這故事講到中國勞工運動之最早的騷動，而且勞工運動之在中國，完全是成熟地從共產黨底頭腦裏跳出來的，極似彌納伐 (Minerva) 之從左扶 (Jove) (註) 頭裏生長出來一樣。中國勞工之基礎的政治力量是在於礦工，鐵路工人，及海員們，因為紗廠工人底運動是直到一九二五年纔開始的。漢冶萍，處於武漢附近，是中國冶鐵工業之中心，而漢冶萍礦工聯合會即為中國四大主要工會之一，其他的三個是鐵路總工會，海員工會，及廣州工會。

中國勞工運動是在一九二二年，以香港海員底罷工，及漢冶萍工礦底罷工（蔡樹藩是參加這次罷工的）開始的，雖然中國第一次的罷工是在一九二〇年發生於長沙，為無政府主義者所組織。當平漢鐵路工人在一九二三年罷工以後，中國底勞工運動就能够站得住了，而在

註：彌納伐是古希臘神話中智識與文藝之女神，左扶即周比特 (Jupiter)，是希臘神話中之主神，即

一九二五——二七年的時期，營各通商口岸的工廠工人都加入之後，這運動便發展得異常廣大。

一件頗有興趣的事情：是營漢冶萍各礦在一九二五年閉歇（一半是因為勞工運動底聲勢強盛）時，簡直是把十萬個自由的無產者，早已由共產黨領袖李立三所訓練過的，都供給與革命軍事。在共產黨領袖葉挺部下的最初幾隊紅軍，就大半是由這些漢冶萍的叛徒們所組織成的。還有一件有興趣的事情，是中國的資本家們在一九二七年以後，是那樣地害怕武裝的無產階級，他們竟不但將以前所有的武裝工人都開除，還甚至將大多數身體健全的工人都開除掉，並且改用女工和童工來代替。這種情形在上海亦然。

二 漢冶萍礦工運動

以下便是蔡樹藩所說的故事，關於漢冶萍的礦工運動，以及在一九二七年，爲了要符合右派陳獨秀底路線，（可是這路線不久就轉向極左，而與李立三底羣衆暴動政策合流了）工人們之被解除武裝：

『我是從中國的勞工階級來的。我的家庭是湖北的礦工。我的父親和一個叔父在漢陽，安陽，和大冶的礦裏做工，並且也在別些地方的礦裏和兵工廠裏做過工。我的祖父是一個貧苦的農民。』

『我是在一九〇八年，生於湖北底漢陽縣。三天之後我家裏就遷往安源，這是萍鄉縣裏的一區，在那兒我父親和叔父是在安陽礦裏做工的。我在學堂裏祇讀過兩年書，後來在十五歲時我自己就進礦去，先做了三年的徒弟。直到那時候我沒有做過什麼特殊的工作，我的父親力能養活一家人，雖然我們是八口之家，除了我父親及我之外，還有我母親，兩個弟弟，

和三個妹妹。

「我做工人賺三塊錢一個月，從早晨六點鐘做到晚上六點鐘。這是在漢冶萍礦裏，我的工作是在馬達，抽水機及運煤車等等。大多數的工友們都是年少的，大半是從十四五歲到二十三歲，其中有些人過着很困苦的日子，甚至賺不到三塊錢，而且他們假如做錯了事情，他們的工資就要被扣去。可是，平均的工資是每個月六七塊錢。」

「那時候的漢冶萍，一部份是屬於私人資本的，盛宣懷是最大的股東；一部份是屬於政府。它現在是屬於日本人的了。這個礦是中國最大的鐵礦，單單在安陽一段裏，就有一萬三千個工人。至於在整個漢冶萍礦區裏，——安陽鐵礦祇是它的一部份——共總是有十萬以上的礦工，其餘的兩個礦就是漢陽和大冶的鐵礦及製鐵所。」

「在一九二一年，毛澤東到漢冶萍來，組織了一個工人俱樂部。這便是礦中勞動組織底開始。他逗留的時期極短，祇談到點概括的政治鬥爭觀念。後來，李立三（他那時候叫做李能佐）來了，在一九二二年開始給工人們設立了一個補習學校。起先這個學校祇有約摸十個人。以後，約有九十個人加入了。我是在這學校一九二二年一開學的時候就進去的。我們那時並沒有書本，祇有一些油印的講義。這些講義是說到工人們，爲了要獲得較高的工資，對

於資本家所進行的鬥爭。從這些文字中，礦工們學會了讀書和寫字。當時祇有兩個教師，李立三和蔡正羣（譯音）。兩人都是共產黨，雖則蔡後來是背叛了。學校不久就擴大起來，從其中發展出一個巨大的「安陽工人俱樂部」來，這俱樂部便向僱工們要求增加工資，起初時，這俱樂部祇有幾百會員。但是當我們第一次的罷工勝利之後，每個工人都加入了。

「我們在一九二二年的罷工，在礦的歷史中還是破天荒第一次。於這次之前，工人們是從來不知道有這樣的一種方法的，因此當他們發現了罷工底用處時，他們都是又驚又喜。可是，祇有年輕的孩子們是加入這罷工的，年紀大的人都比較地守舊些。所有的青年人都很激烈，並且站着做糾察隊，不讓老年人們進礦去。在起初的時候祇有幾百人加入這罷工，但是後來更多更多的人都動員了。我們組織了一個宣傳隊，到工人們底宿舍去，和他們進行談話，要求每一個人加入到我們這裏來。運氣好得很，我們竟然說動了那個專管放汽的人，使他一直罷工下去；於是因為沒有汽笛響起來叫大家去做工，就沒有一個人去了！我們同時也派代表到資本家那裏，對他說道：「假如他不接受我們的要求，我們就要長期罷工，並且還要毀壞這個礦。你知道，祇要抽水機停止一天工夫，全部的礦就都要給水淹沒的」。資本家就答應了我們所有要求，罷工一共祇繼續了三天。這個罷工是李立三領導的，和蔡正羣一同。

徐海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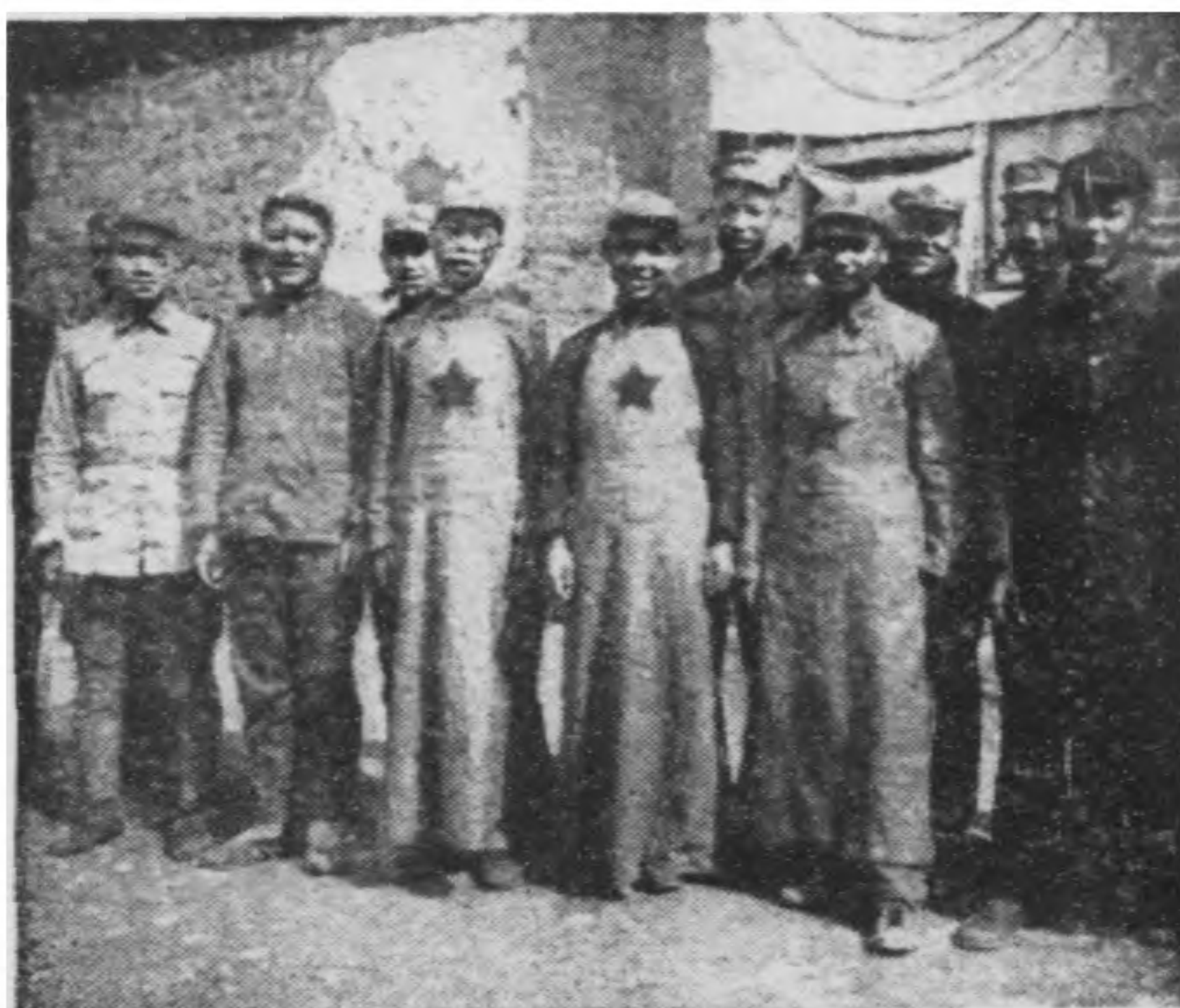
• 延安
全景





蔡樹藩。

延安工廠工人。



另外還有幾個別的工人領袖。都是共產黨。其中一個是朱紹連（譯音），這人在大革命之後被捕，背叛了黨，可是仍然被槍決了；一個是朱景唐（譯音），他現在還在黨裏工作。——一九三〇年我在上海看見過他；還有一個是李德平（譯音）——我不知道他現在怎樣了。我自己是幫着組織罷工中的宣傳隊的。

「罷工之後，工資都增加了，星期日休息也規定了。我們而且還得到一些錢，作為意外事故及生病之用。在這時候，礦裏有六七個德國人做稽查，他們慣於用手杖來打工人們，並且爲了極細微的過失就開除我們，到了罷工之後，他們就再也不敢打一個工人了。在世界大戰之前，礦裏一共有四十個德國人，工人們因爲他們有特權地位，對他們是很厭恨。自然，我們也同樣地厭恨那些中國工程師。」

「一九二二年的這罷工並不是中國勞動者底第一次罷工。大約在一九二〇年時，無政府主義者就在湖南的長沙紗廠領導過一次罷工。可是我們這次的罷工，是勞工運動底極重要的發端，因爲它是獲得勝利的。在罷工後，所有的礦工們都興高采烈，開始組織了許多夜學校，補習學校，和讀書會等。我們還開始建築了一個工會會所。安陽在那時候就被稱爲「中國的莫斯科了」。

「我們原來的「工人俱樂部」是稱爲「安陽礦工俱樂部」。一直到大約一九二四年。當平漢路大罷工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開始，有許多鐵路工人被殺時，我們在漢冶萍的人就發動了一個總罷工，以表示同情。所有的十萬工人都參加，我們就將俱樂部改爲工會，建立了「漢冶萍工人聯合會」底總會所，包括大冶，安陽，及漢陽三礦。

「以後，湖南發生了許多次的內戰，礦中的經濟狀況變得十分困難，工人們都得不到經常的工資，因此他們常常做破壞工作，並且向礦主們提出了許多要求。於是盛宣懷底兒子帶了兩團（大約一千人）兵到礦裏來，開始用一種不同的口氣，來和工人們開談判。我們工會的領袖是陸成（譯音），一個共產黨。他是個學生，不是個礦工，但因爲他是代表工人的，資本家對他優待。他雖則是個共產黨，却很信任這些資本家，但是最後談判破壞了，我們的要
求一條也沒有允許。安陽底整個勞工運動不久就失敗了。

「兵士們在礦的附近駐紮下來，工會被封閉了，學校也都被封閉。工運中的領袖們全都逃走，而且沒有一個積極的工人能再逗留下去。大約有十個人被捕，五十個人逃往長沙。我也只好逃走了。我在一九二三年即已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這個團體後來簡直全部歸併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從此以後中國就沒有社會主義青年團了。在那時候我們的罪名都是「

過激派」，不像現在的工人們那樣，都被指為「共產黨」。那些兵並沒有打我們，因為在他們還沒有抓住我們的時候，我們就都逃走了。

「在軍隊被調來之前，我們所裏是有警察的。可是，這三百個警察都毫無用處，因為他們雖然都是武裝，他們的人數却太少了。再則，警察都同情罷工的人，因為我們能够使得工資增加，雖則他們並沒有參加我們的第一次罷工，——其實是，他們從來沒有罷工過。兵士們對於這運動却是不同情的；他們都是傭兵，祇知道服從命令而已。

「李立三在漢冶萍住了三年，約在一九二四年纔離開到上海去。他在工人中間有很大的勢力，在那時候，工人們對他是簡直比對毛澤東還要愛戴哩。他是學生，但却是無產階級底一個極好的領袖，並且是一個非常地能使人信服的煽動者，凡是聽過他演說的人差不多個個都會受他的影響」。

二 黨的創立

「中國的勞動者是向來不保守的。一直從開頭的時候起，無產階級就是歡喜激進的領導的。在我這個區域裏，「社會主義青年團」大約是在一九二三年底改變爲「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直至一九二三年年底，我們還沒有共產黨，那時共產主義青年團祇有四百個人，都是從十六歲到二十三歲的青年勞動者。到了一九二三年的年底，纔有幾個共青的團員，發起組織了共產黨，和幾個年紀大一點的人一起，統共祇有一百個黨員。共產黨在礦裏最發達的時期，是一九二五年，約有黨員三百人，而青年團則約有五百人。

「我們實在是沒有真正的黃色工會的。資本家們除了用暴力之外，並不知道有任何反對工會的方法，有一個時候，總理部的職員和工程師們，想組織一個俱樂部來對抗我們的工人俱樂部，但是後來這兩個組織，不但不互相鬥爭，却反而攜手合作起來！他們那團體有一次曾經罷過工。我們就援助他們，因此有了良好的關係。他們祇能夠得到六百個會員，而且都

是工程師及職員等；他們那邊是沒有工人的。這個團體底目的是要談判增加薪資，但是礦工們並不怕他們，因為礦裏沒有這些職員，仍舊能够照常生產，祇要工人們肯繼續做下去。他們就不得不請求我們，對他們的罷工加以援助，這我們是答應了；可是即使如此，他們也還是沒有達到加薪底目的。

『那時礦務極爲發達，每月能够出產五十萬噸的礦砂，各色各樣的種類都有。德國人每月可以得到一千元到二千元之薪水，這事情是使得工人們極憤慨的。他們在一九二三年都走了——我不知道是爲什麼；他們不是被工人們趕走的。』

『當我到了長沙之後，黨要我回到安陽去，因此我就回去，把工會從新建立起來，維持了若干時候，在被捕的十個人中，祇有一個人被處死，但是我們計劃着要舉行一個示威，來反對這件事情。然而，那時候的形勢似乎太嚴重了，不適用於有這種行動；而且其餘的九個人也都放了出來。因此罷工並未實現，當局下令要捉我一家的人，因此我祇得再逃走，和另外的幾個工友們一起。我父親是個窮苦的工人，但他是年老而且守舊的。他會想阻止我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但是後來他也同情起來，連自己都加入了工會。這次就是我看見他的最後一次，到現在有十年之久。我不會聽到過家裏的消息，我也沒有寫什麼信給他們過。』

「此後我就沒有再回到安陽去過，但是後來我聽見說，到了一九二五年，那邊的勞工運動完全失敗了，礦關閉下來，工友們都被趕走，漢冶萍所有的三個礦區都閉歇了。我猜想總是因為缺少資本的緣故，因為後來這些礦都買給日本人。它們在一九二五年以後，從沒有復開過，祇有一小部份還在開採，僱用的礦工不過幾百個人。」

「在這十萬個被棄失業的漢冶萍礦工中，許多都加入了紅軍，當彭德懷在一九三〇年路過安陽佔領長沙的時候。在這之前，有好些人參加了一九二五年的大革命，被殺者甚多。有一個時候，在國民黨第四軍葉挺部那一師裏，幾乎所有的兵士都是漢冶萍礦工，當圍攻武昌之役，許多人都戰死了。在一九二七年領導南昌暴動的，就是葉挺部下的這漢冶萍無產階級。假如礦沒有關閉下來的話，是不會有這種自由的無產階級來參加革命行動的，而且也許那時候不會有紅軍運動吧。這些工人們大半都被殺死了。但是在林彪底第一軍團裏現在還有許多，他們本來是在葉挺部下的。這些工人們都集中在陳賡所率的第一師裏，這一師是從未被白軍擊敗過的；但是因為這些年來變遷甚多，我恐怕在原先的漢冶萍工人中，現在剩下來的已沒有多少人了。」

「我再到長沙去，由長沙往南昌，在那裏我是要去當兵工廠裏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工作。」

一九二六年間，我被方本仁底省軍所拘，但是因爲他們找不到對於我的證據，過了幾天就釋放了。不久，國民黨的軍隊到達南昌，許多工人都加入了。可是，我仍舊留在後面爲黨工作着。我在一九二七年由共產主義青年團改入共產黨，那時我是十九歲。

『此後我就到武漢去，在那裏繼續做着黨務工作，地點是夏口的工業區。當我聽到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的消息時，我便計劃將我們的槍枝帶走，將它們埋藏在地下。在六月裏我被唐生智所捕，和我一同被捕的還有三個女人和另外五個男人，但是那些槍永遠沒有被他們發覺。到現在十年之後，它們還在那兒的地下，——十支來福槍和六支手槍。可是，我們不久就被釋放了，因爲沒有對於我們的證據。在夏口共有六個工廠，一個是絲廠，兩個紗廠，兩個麵粉廠，還有一個是日本人開的化學工廠。我們這個工會裏會員雖多，一共却祇有十支槍！』

四 中國工人之被解除武裝

『那年四月裏，在上海就有許多工人被殺。當武漢的工人們聽到了上海工友們被殺害的消息，他們立刻召集了一次罷工。那次的盛大集會，共有十萬以上的人，從早晨六點鐘一直開到下午五點鐘。我也是出席者之一。』

『起初，在漢口祇有四五個工人領袖被殺。做着公開工作的共產黨們，都逃跑到壽昌或莫斯科去了。在四月之前，中國的許多工廠工人，都有完備的武裝。後來却全被南京政府解除了。例如在武漢，工人們有一千多支槍，但是陳獨秀（共產黨底領袖）自己命令他們將這些槍交出給國民黨。可是沒有一個工人情願繳出他的槍，因此他們都十分憤慨。一到他們交出了他們的武器時，許多人就被捕了。大約在五月或六月裏，殺害即開始。也就是直到工人們交出了他們的武器之後，行刑纔動手的。對於工人及共產黨的殺害，三個地方差不多同時開始——武昌，漢口，漢陽，以及平漢線上的小站新安。每天總有十個二十個或三十個人被執

行死刑。被殺者共達數百人。我們的伙伴中有幾個是在開會之後就被帶出去槍決了的。工人們計劃着一個大罷工來反對這事情，但是失敗了。他們想抵抗這種反革命，但是毫無辦法。這些殺害都是由唐生智底軍隊做的，何鍵是這軍隊底一個將領。

「這時候有許多女人被殺。在各紗廠裏，大部份的工人都是女子和女童。這些女人和小姑娘們都極活潑而且勇敢。從夏口到漢口有十五里路，但是她們居然用纏着的小腳，走到那裏去開會。我發現：在鬥爭中及罷工運動中，女子們總是比男子們更積極，尤其是在組織宣傳隊及集合開會時。對於這種的特殊工作，女子們總是居於領導的地位。她們常常是和男子們一般地強壯，而且因為所得工資較低，所受壓迫更深，她們都成爲極其革命了。她們在革命中活躍的領導，直到現在還是極重要的。在國共分裂以後，武漢的資本家們就不招收壯健的男子，而招收婦女及兒童，去到他們的廠裏作工，因為他們可以付她們更低的工資，並且阻遏革命的行動較爲容易。這些資本家們同時開除了所有勞動的女革命者，收用了一些新的姑娘們，都是無知無識的，新從鄉村裏出來的。

「你問我擊破中國勞工運動的是什麼？——在那時節，勞工運動是由陳獨秀主持的，他却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他不信賴工會底權力。我們那時候有許多支槍，但陳獨秀却要

將它們都交出給國民黨，而且居然這樣地做了。這是個絕大的錯誤。他並且反對爭取經濟上的利益，因為他說工資之增加會給工人們以良好的生活，而他們的革命情緒就會減少了！因此就決議，我們的口號喊得太高了。黨是害怕破裂了和國民黨的聯合陣線。

「那時一般地說，工人們是不懂得革命底性質的。他們曉得革命的意思是要打倒北方的軍閥和帝國主義，實現八小時工作制，增高工資，獲得較進步的生活，與集會和出版雜誌報章的權利，以及去得到人民的種種自由。但是對於他們，革命一大半祇是一種經濟的鬥爭，就連我自己，在那時候也不能夠清清楚楚地瞭解革命底性質。」

「雖然工人們是被指為，要共產黨為工人而奪取政權，但這話祇是一句謊語及託辭而已。當革命工作發展到了一九二七年的時期，工人們就要求較好的工資，而農民們即要求土地，因此國內的資產階級害怕起來，便背叛了革命。其實是，工人們底經濟要求，以及農民們底要求土地和推翻封建主義及帝國主義，祇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一部份而已。」

「然而，工人們已感覺到他們那偉大力量底範圍，並且知道資產階級是畏懼他們的了。他們以為資產階級背叛底真正原因是，資本家們對於工人們的畏懼，因此他們不情願交出他們的武器。但是共產黨總部下命令要交出它們，因此他們祇好不加反對地照辦了。當夏斗寅

底軍隊在七月間開到時，工人們是準備和他作戰的，但是這計劃並未實現。

『那時候工人們充分地意識到他們是國民黨革命中的重要力量，而無產階級是這革命底領導者。武漢工人們對於他們自己的力量，具有極大的信念，並且以爲他們能夠對抗夏斗寅底軍隊，因此不願意繳出他們的武器。這些工人過去在南府（譯音），都曾在項英部下受過相當的軍事訓練。約有二千人曾在那裏受過三個月訓練。項英是要和夏斗寅部隊作戰的工人們底領袖，但是在大會中陳獨秀底路線佔了優勢，因此戰鬥沒有發生。工人們本來早已開始出發了，後來又接到停止的命令，就都回了轉來。（項英是個湖北人，他後來加入了紅軍，在長征後仍留在江西）。』

『在那時候，工人們是不但不害怕，而且都高興加入共產黨的。夏口地方共有幾百個黨員，可是我不知道全縣一共有多少』。

五 長征前後

「八月間我動身往莫斯科。當我到了俄國時，我便進了東方大學，研究中文及自然科學。當我參加共產國際在一九二八年開的第六屆代表大會時，我已經修畢了一學期的六個月學程。後來我轉學到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這大學原來是稱爲孫中山大學的，在那裏我也讀了六個月。徐夢秋和我同個時候在那裏。此後我在列寧學院研究了九個月。當我在列寧學院的這個時期中，中東路事件發生了，許多張學良底兵都被蘇聯所俘獲，因此我被派去和他們一同作工。在這之後，我回到列寧學院，讀畢了我的課程。」

「在莫斯科的第五屆國際勞動大會裏，我是二十個中國代表之一。會開過之後我就在一九三〇年動身回國了。我回來時一路並無困難。」

「到了上海，我在全國總工會底總部裏工作了兩個月，後來就請求到江西去。我先到香港，然後到汕頭，於是開始步行往蘇維埃區域去。這使我感到很大的困難，因爲沿路多山，

而我生平又沒有多走過路。我向來是在工廠裏挨擠之中工作的。有時候。我們在路上要經過一些土匪區域，但是這些土匪對我們都很好，給我們東西吃，還派人護送我們。從我離開香港的時候起，約有一個月，我纔到達福建的蘇區。當我們到了邊界時，羅炳輝來歡迎我們。我們就在福建蘇區住了兩個月，然後被送往江西的中央蘇區，有一個衛兵保護我們去。

『在江西的蘇區裏，我起先是在工會裏擔任一個職務，後來加入羅炳輝底第十二紅軍，任政治部主任。這支軍隊在打了幾仗之後，改編到第一軍團底第一師裏去了，但是仍舊由羅炳輝指揮。在國民黨的第二次圍剿中，我參加戰事，曾被飛機炸彈炸傷。』

『我的第一次受傷是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在廣昌地方。朱德毛澤東底軍隊已經撤退了，當飛機來丟炸彈時，我正在後衛的部隊中，但是祇好繼續我的工作而不能夠躲避。我受了九處的彈片傷，但是後來在一陣昏迷之中走了一里路，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看護們用碘酒來治我的傷，但是我直到第三次圍剿開始時纔復原。醫院是沒有的，大半的時候我都是被看護們用擔架抬。然而我仍舊能夠參加第三次圍剿的戰事，並且參加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

『在一九三三年七月裏我又受了傷，是在福建連城縣朋口和蔡廷楷作戰，當時我是紅軍

第七軍團底政治部主任。那次我是和周亮平所率的第十九師在一起。蔡廷楷底部隊是在朋口，我們在連城。我們的軍隊不能夠前進，因此周和我就一同率領了一部份的部隊到朋口去襲擊。我是兩隻手拿着一個望遠鏡正在看着。剛巧我正要放下這望遠鏡，把左手移動了一點點時，一顆步槍的彈子就從我的左臂穿過去。這個傷是不怎麼壞的，但是醫院和醫務人員都並不好。也許我的喪失我那左臂，並不是必需的吧，但是那時候迫切地需要我趕快好起來而去加緊工作，因此項英（他那時候是軍事會議底主席）就勸我將左臂割掉。這是因為當時正在組織紅軍新第九軍團，歸羅炳輝指揮，需要我去做政治部主任。

「長征在一九三四年十月間開始。在貴州我改爲擔任軍事會議底政治主任；當我們到達陝北時，我被任爲內政部及司法事務部的部長。

「長征對於我是並不艱難的——它差不多是和其他的軍隊生活一樣，祇是我們都永遠得不到休息。我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冒險經歷，祇除了有一次在長征開始時。我們這軍團底總部突然被襲擊，羅炳輝和我祇好趕快騎上馬逃走。當我們的弟兄們開始抵抗時，我們就回轉來

了

「去年當紅軍渡過黃河時，軍事委員會命我召集游擊隊員成爲一軍，因此我組織了第三十軍，由顏洪元指揮。後來，我回到保安去，因爲生病，被迫休息了幾個月；於是到了延安來」。

第十章 中國共產運動年表

一 共產運動之抬頭

一九一八年——「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為中國社會主義路線之第一個團體。

一九二〇年五月——「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爲「共產主義青年團」之一支部。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孫逸仙復活「中國國民黨」，改稱「中國國民黨」。

一九二〇年——中國之第一次勞動罷工，發生於湖南長沙一紗廠中，爲無政府主義者所主持。

一九二一年五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創立。

一九二三年——中國共產黨決與國民黨成立聯合陣線。

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平漢路大罷工，爲中國勞工運動第一次之軒然大波。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至三十日——國民黨開「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在此次會議中，該黨擬

照俄國共產黨組織辦法，全部加以改組，並准共產黨加入爲黨員。

一九二四年五月——廣州黃埔軍官學校創立，由蘇聯顧問指導。

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中俄協定」（即「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成立，國際平等之基礎肇始。

二 一九二五——二七年之「大革命」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五卅事件」，英人在上海對示威學生開槍，引起中國革命活動之巨大潮流。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打倒北方軍閥之「北伐」開始。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日——「武漢政府」成立，共產黨員及國民黨員共同參加。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共產黨員周恩來所領導之上海工人。於本日攻下上海。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南京政府」成立。「清黨運動」開始，共產黨員及上海工人，在上海被殺者數千人。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湖南長沙發生「許克祥大屠殺」，軍閥許克祥對革命的農民及工人進行大屠殺，以免土地被農民奪取。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共產黨與國民黨「分裂」，國民黨與第三國際斷絕關係。

三 蘇維埃革命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張發奎部「鐵軍」發生「南昌暴動」，由共產黨員領導，並由是成立中國紅軍，唯當時僅稱「農工革命軍」。

一九二七年八月五日——中國共產黨為武漢國民黨所排斥。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席上，陳獨秀被取消總書記職，並採取新路線。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七日——彭湃在海陸豐組織第一個「中國蘇維埃」，該地為廣東省廣州附近之東江區域。至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九日，經劇戰後，此蘇區被殲滅。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二日——「秋收暴動」發生於湖南，由毛澤東領導，結果遂由農民礦工及叛兵編成「農工第一軍第一師」。這支一千人的軍隊在一九二七年冬季爬上了井崗山，而守住此根據地至一九二八年秋季。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第一個永久的蘇區政府建立於湖南茶陵。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廣東公社」，共產黨員奪取廣州。共三日。

一九二八年——賀龍開始在湖南洪湖區域，組織一支新的紅軍。這支紅軍經過許多次的否運之後，建立了「湘鄂蘇區」，擁有人口一百萬。蕭克所率「紅軍第六軍」，於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抵達，與賀龍之「第二方面紅軍」結合。

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湖南農民發生「湖南叛變」，由朱德領導。

一九二八年五月——朱德往井岡山，會見毛澤東，合編部隊為「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政治委員。

一九二八年七月——彭德懷在湖南領導「平江暴動」，並加入蘇維埃，任「紅軍第五軍」軍長。

一九二九年——羅炳輝在江西領導民團作「吉安暴動」，並加入紅軍，指揮「紅軍第十二軍」。

一九二九年——本年初，湖南及湖北蘇維埃均成立，並擴充及於安徽，至一九三〇年底，已包括十縣地方，共有人口一百萬，稱為「鄂豫皖蘇區」。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第四方面紅軍」成立，由徐向前指揮；而張國燾任蘇區政府主席，轄有人口二百萬——為鄂豫皖蘇區最光大時期。

一九三〇年——黃公略所率之「紅軍第二軍」成立。（黃氏後來作戰陣亡）

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七日——彭德懷佔領長沙。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一年一月——紅軍擊敗「第一次圍剿」。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九日——「第二次圍剿」開始，不及一月亦被紅軍擊敗。

一九三一年七月至十月——「第三次圍剿」，亦擊敗。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一次「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本屆會議中成立「中國蘇維埃共和國」，並選舉第一次「中央蘇維埃政府」，毛澤東任主席，項英及張國燾任副主席。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二十六路軍」（以前爲馮玉祥部「國民軍」）之「寧都暴動」，該軍加入紅軍後，成爲「紅軍第五軍團」。

一九三三年四月至十月——對蘇區之「第四次圍剿」，仍被紅軍擊敗。

一九三三年五月——徐向前張國燾領導下之「川陝蘇維埃」成立。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第四方

註：我對於決定這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正確日期，遇到最大的困難。這個日期常被指爲一九三一年十一

月七日（俄國「十月革命」的紀念日），但是在我所談過的人裏，差不多個個都告訴我說，十二月十

一日纔是正確的日期——這天是廣東公社底紀念日。似乎大會底日期原定十一月七日，後來因各

地代表不能如期趕到，因此決定以後的這個日期。本屆大會中所採用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

，其日期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N.W.

面紅軍將其根據地由鄂豫皖轉移至四川，於一九三三年五月，組成「通（江）南（江）巴（中）蘇維埃」，包括上述之三縣，共人口一百萬。這蘇區不久即改組入「川陝蘇維埃」內。

一九三三年十月——一九三四年十月——「第五次圍剿」，結果為第一方面紅軍開始自南方的蘇區退却。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

一九三五年六月——第一方面紅軍在「長征」中與第四方面紅軍，會合於四川懋功縣大惠地方，此後紅軍第一及第三兩軍團即在毛澤東與彭德懷率領下，向西北進發，而朱德與羅炳輝則留下來，和第四方面紅軍在一起，並在西康度過以後的幾個月。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六日——第四方面紅軍向北方之長征開始。毛澤東之縱隊於一九三五年十月到達陝西。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第二方面紅軍由湘鄂蘇區開始其長征，於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在西康與第四方面紅軍會合。

一九三六年二月——第四方面紅軍在西康之六七縣中，成立「少數民族特別獨立政府」，共約人口二十萬。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四日——第二及第四方面紅軍，以及朱德與羅炳輝部隊，開始由西康往西北之長征。

一九三六年十月——紅軍全體各部隊，於甘肅會寧，作第一次之大聚會，是時第二第四方面紅軍，及朱德羅炳輝部隊，已結束其長征，而在甘肅與第一方面紅軍會合。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發生。國共合作之「統一戰線」時期由此肇始。

一九三七年二月——長期內戰中之最後一仗：第四方面紅軍與甘肅之回族。

四 在統一戰線下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至十月十五日——各前蘇區舉行民主的新選舉，放棄蘇維埃的政府形式，而開始普遍的民主，前「中華臨時蘇維埃共和國」撤廢，改爲「陝甘寧邊區政府」。

一九三七年八月——共產黨軍隊開入山西對日抗戰。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統一戰線」宣言公開發表。根據統一戰線之條件，紅軍改編爲「第八路軍」，由朱德指揮，作爲國家正規軍之一部份。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四日——第八路軍在山西平型關大勝日軍，爲中國抗戰後之第一次大

捷。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新「冀察晉邊區政府」成立。爲在此北方被佔領諸省中，建立於日軍陣線後方，而由共產黨員控制之地方政府。

譯者後記

本書剛排好時，斯諾夫人又寄來兩篇新著，「王震——戰鬥的湖南鐵路工人」及「董必武——三次革命的元老」，她在信裏說：「我給這本書又寫成了兩章，這便使得本書確實完全了——關於中國革命的每一個事件，差不多都講到了」。作者於百忙中趕寫了這珍貴的兩章，使本書得以成爲「全璧」，其熱誠與厚意實可銘感；但是譯者所無任歉疚的是，因爲預約及出書期限的關係，出版處不能再多耽擱時日，而我譯好這兩篇又需要相當日子，因此在初版中，這兩篇是無法排入的了，祇好等到再版的時候再增訂進去。此外還有斯諾夫人最近寄來的，極好的一章，「張純青——模範的青年政委」，也因爲篇幅太長，排印不及，同樣無法刊入，也祇好到再版時加進去了。對於作者及讀者，我們謹致十二分的歉忱。（對於讀者，爲補償起見，以後出增訂本時，我們打算另定優待辦法，現在先順便提及。）至插圖仍爲十六頁，但因若干圖已放大，故所容圖數祇得酌減了。

又關於本書之終得出版，許多朋友們底熱心幫助，是譯者所永遠銘感的，敬在此向他們道謝。

華侃又記 三月二十四日

二十八年四月十一日再版

西行訪問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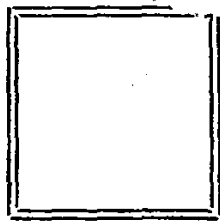
(全一冊)

每部定價一元六角(布裝本)

原著者 Nym Wales

譯者 華侃

印行者 譯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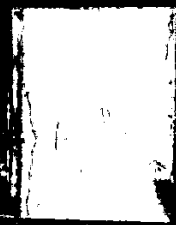


特約經售

獨立出版公司
上海愛多亞路一六〇
光明書局
上海四馬路二九六號
西風代辦部
上海霞飛路五四二號
霞飛市場內四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本書此頁均蓋有譯者版權印鑑如無此印鑑即係翻版請向本社舉發



Vertical text or markings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appearing as a faint line of characters.



A small, handwritten mark or symbol in the lower-right quadrant of the page.

